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佩雷斯传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 引 子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曾在巴勒斯坦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公元前960年前后，犹太人统一的民族国家——希伯来王国在耶路撒冷为他们的上帝——亚卫建造了气势恢弘的圣殿，把巴勒斯坦称作神明赋予他们的“应许之地”。

然而，从公元前930年开始，盛极一时的希伯来王国开始衰败，相继为亚述、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大帝国所侵占。公元135年，罗马皇帝在残酷地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后，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并将犹太人逐出巴勒斯坦，结束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历史。

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有些与当地民族融为一体，但大多数却没有。在中世纪黑暗的岁月里，欧洲各国统治者和教会不时在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对犹太人实行歧视和迫害。歧视造成对立，对立使犹太人顽强地保存着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期望有一天神明能解救他们，使他们重返故土，获得自由。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在法律上得到“解放”，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很快就显示出其虚伪性。1894年，在当时最“民主”的法国发生了诬陷犹太青年军官德雷福斯为德国间谍的案件，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迅速掀起了一场反犹太主义的狂潮。

面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住宅被焚烧，面对大批犹太人遭到屠杀，那些过去沉湎于自由、民主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奥地利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出版了《犹太国》一书，认为摆脱犹太人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犹太国》一书强烈地吸引着欧洲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成了许多犹太人的信仰。在1897年于瑞士巴塞尔召开的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通过了《巴塞尔纲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

犹太人一批又一批地返回巴勒斯坦。他们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辛，排干沼泽，建起良田，要以回归自然的精神重新耕耘祖先曾经耕种过的土地。受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人聚集在一起，建起了集体劳动、人人平等的社会组织基布兹——希伯来文“聚合”之意。一位叫本一耶胡达的人还创造奇迹，使几乎已经死亡的希伯来语成为今天以色列的正式用语。反犹太主义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反犹太主义符合逻辑的反抗。

犹太复国主义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也注定要导致悲剧。从公元7世纪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已在巴勒斯坦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生活了1000多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成功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失去自己的家园，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治这一地区的英国殖民者实行“分而治之”、挑动民族仇恨的政策，阿犹之间的民族矛盾最终兵戎相见，达到了难以愈合的地步。1948年，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在战火中诞生，原本应当成立的阿拉伯国却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引发了几十年阿以对峙和战争的局面。

本书要讲的西蒙·佩雷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以色列政治家……

## 佩雷斯传

## 第一章 来自基布兹的青年

1923年8月21日，西蒙·佩雷斯出生在波兰小镇维什涅瓦（今属白俄罗斯）。像20年代东欧各地的犹太小镇一样，维什涅瓦的170户居民虽然不富裕，但镇里却充满“犹太文化”的色彩。

说起“犹太文化”，人们不免要想到那些身着黑色传统服装，过安息日时不生火做饭、不点蜡烛和不乘车外出的正统教徒。佩雷斯的父母可与正统教徒无缘，除了只吃被称作“卡什”的犹太食品和节日期间到犹太会堂聚会外，在他们的身上几乎没有犹太教的气息。至于小镇上的“犹太文化”，则更多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佩雷斯一家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掌权前就决定移居巴勒斯坦，只不过他的父亲在1931年早走一步，而他、母亲和弟弟戈松两年后才前去团圆。

在巴勒斯坦贝尔福小学读书时，佩雷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好学生。他好像对许多门功课都心不在焉，成绩自然也无可夸耀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放弃了送他上中学、上大学、当博士的企望，送他进了一所商业学校，觉得学点儿有用的本事就可以满足了。

佩雷斯在商业学校的学习情况不难想象，但在这一期间他加入了工人总工会所属的劳动青年运动组织，从而成为他人人生道路一个转折点。

按照希伯来语的发音，劳动青年运动被称为“哈诺尔豪伍德”，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成员适应基布兹的生活。

基布兹，即集体公社，80年代一位中国学者在访问以色列后把它称为“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他描述说，到了基布兹，“就像到了家。金钱在这里失去效用。所有的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社员所公有。大家在一起劳动，衣、食、住、行、学习、娱乐，都由公社免费提供”。不过，30年代的基布兹成员还仍是荒芜贫瘠土地的开拓者。他们住帐篷、吃粗粮，白天在荒山上劳作，“晚上累得连手指都动不了”。不经过训练，从温馨家庭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的确很难经受得住这种类似于军营的生活方式。

在那个强体力劳动是生活资料唯一来源的时代，佩雷斯这个不爱好体育、身体有些虚胖的青年人似乎毫无取得社会尊重的可能性。但事实不是这样。劳动青年运动的负责人艾尔哈南·伊沙很快就发现了佩雷斯的演讲和组织能力，经他推荐，本谢曼青年村寄宿学校答应向佩雷斯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使佩雷斯终于走出了他早已厌倦的商业学校。

在本谢曼青年村，佩雷斯成为劳动青年运动机关报《论坛》的撰稿人，写作天才得以表现出来。不过他也很注意使自己创造一种能吃苦耐劳的形象，每天设法只睡五个小时的觉，这在其成年后竟成为习惯。他还很注意晒太阳，以免和那些脸上黑里透红的青年伙伴产生巨大的反差。佩雷斯成名后，人们发现他乘车总爱坐在有阳光的一边，从未见他游过泳，他却脸色微黑，可能都和他这一时期养成的习惯有关。

在本谢曼青年村学习期间，他还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索尼娅·戈尔曼。索尼娅是木工技校一位教师的女儿，身材削瘦，脾气随和，文静中透出一股迷人的魅力。不过，佩雷斯后来与索尼娅结为终生伴侣却没有太多罗曼蒂克式的渲染，寄宿学校中男女同学夜间一起值勤巡逻，成立学习小组和文艺小组共同探讨问题，都可以说是这对夫妻得以结合的鹊桥。然而，有两

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佩雷斯和索尼娅曾在一个学习小组里共同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佩雷斯在与前苏联领导人会谈时还不止一次地“引经据典”，为自己的看法寻找“理论根据”；二是两人曾在一个文艺小组里一块儿学弹吉他，以色列建国前夕夫妻双双被请进“专家小组”，投票使《哈蒂卡瓦》（希伯来语“希望”的音译）一曲成为以色列的国歌。

在寄宿学校里，佩雷斯的演讲、分析和组织能力崭露头角。但在知情人眼里，本谢曼青年村这块天地对他来说还显得太窄。1941年8月，佩雷斯从寄宿学校毕业后来到下加利利地区的吉瓦基布兹实习，他的活动舞台似乎宽了一些。

对许多同学来说，能到吉瓦基布兹实习是件惬意的事。在完成原始拓荒数年后，吉瓦基布兹盖起了整齐的新房子，山坡上所栽的树已形成绿荫，这对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来说真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佩雷斯在吉瓦基布兹却没有闲暇。白天，他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在常人看来几乎使尽了全部可使出的力气。到了晚间，他又出现在劳动青年运动吉瓦基布兹支部的活动室里，联络附近各基布兹支部的青年人共同举办研讨会、演讲会、辩论会、舞会、演唱会和其他娱乐活动。从事青年活动有时是有危险的。夜间外出进行联络活动有可能遭到不明身份的暴徒的袭击，但这并没有挡住佩雷斯的活动，即使单人外出也是这样。

遗憾的是，佩雷斯的积极工作并没有在青年人中提高自己的威望，相反却遭到一些非议。多年后，他自我解释说，许多人把他看成了那种总要“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凡事总是“求多和求快”。佩雷斯内心对这种指责是不服气的，认为这“扭曲了”自己的善行善意。不过，佩雷斯也没有公开站出来反驳对自己的非议。究竟这是由于他个性怯懦而不愿参与争论，还是想时间来证明问题，他没有讲，别人也不好作出结论。

要说“行在时间之前”或“行在他人之前”是一种过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争议。后来佩雷斯担任了政府的运输和邮电部长，提出引进电话磁卡技术以取代投币式电话，又遭到“行在时间之前”的非议。访问法国时，他向主人询问电话磁卡是在哪里生产的，回答使人吃惊的是：产品是以色列吉瓦基布兹制造的！佩雷斯回国后，风尘仆仆地赶到这个青年时代曾劳动过的公社。他发现，过去的牛棚已为现代化的厂房所替代，社员们在里面不仅制造磁卡，还生产其他电气产品以供出口。佩雷斯一定会因为信息不灵而提议要从国外引进磁卡电话技术而感到惭愧，同时也未必不沾沾自喜，过去指责他“行在时间之前”的吉瓦基布兹社员，如今也已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佩雷斯年轻时另一个遭人非议的地方是口气太大，话题很少涉及吉瓦基布兹的发展，动辄讲未来犹太国的事情。别的人要是被任命担任某一公职，不论是否出自内心，总要说一句“服从组织的决定”，佩雷斯可不是这样。他在辩论会上曾说过：“野心并不是贬义词，我崇拜那些不掩饰自己野心的人。”这种话可能出自真诚，但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里公开讲出来，总会招致非议。

1942年9月，佩雷斯结束了在吉瓦基布兹为期一年的实习生活，投身在加利利海旁的高地上创建阿鲁莫特基布兹的工作。在这里，他与索尼娅结了婚，妻子从此成了他在坎坷政治生涯中最忠实的支持者。

创建工作所付出的辛劳是无法用几句话勾画出来的。起早贪黑、千辛万苦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也没忘了组织好劳动青

年运动支部的活动，基布兹的负责人把他看成是支撑公社大厦的一把好手。

夏日里的一天，阿鲁莫特基布兹的社员们没有下地干活。他们把帐篷内外打扫干净，摆直石砌路边的石块，穿上了只有安息日才穿一下的干净衣服。这是因为，犹太代办处移民安置部的负责人列维·艾什科尔将要来此视察。

1929年建立的犹太代办处，事实上已经成了30—40年代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政府”。代办处向世界犹太人募捐，从经济上支持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基布兹自然也就成了受资助的主要对象。犹太代办处负责人本—古里安的名字在各个基布兹可谓家喻户晓，如果他还不能被称作神，至少也被看作是神的使者。

中午时分，艾什科尔乘车来到阿鲁莫特基布兹。夏日的巴勒斯坦，气温高达摄氏40度。艾什科尔衬衣已经湿透，手中拿着一条毛巾，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孩子们，”艾什科尔一下车就大声对基布兹年轻的社员们说，“好热呀！这儿什么地方最凉快呀？”

青年们哈哈大笑，眼睛瞄向附近的一口已经干涸了的古井，异口同声地说：“您打算下去吗？”

“为什么不？”艾什科尔笑得眯起了眼睛，“只要能解暑，我想钻到地心里去。”

古井不知是何年何月开凿的，井口极大，还有盘旋的台阶通向井底。艾什科尔带头，在三位基布兹领导人的陪同下小心翼翼地 toward 井底走去。井底的气温确实比地面低。没等三位基布兹领导人开口，艾什科尔直率地向他们提出了要求：“我需要调西蒙·佩雷斯到劳动青年运动秘书处工作。”

三位基布兹领导人都愣了：艾什科尔认识佩雷斯吗？如果认识，佩雷斯就在欢迎人群中，两人为何不打招呼？事实上，艾什科尔的确不认识佩雷斯，但劳动青年运动的报告已使他对这位青年人有了全面的了解，他来阿鲁莫特基布兹的目的就是要调佩雷斯去特拉维夫的劳动青年运动总部。三位基布兹领导人确实有点儿舍不得让佩雷斯走，但却不能抗拒艾什科尔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人物的要求。基布兹的大多数社员都没有想到佩雷斯这么快就步入了仕途，但至少佩雷斯想到了这一天，他还想到了……

佩雷斯来到特拉维夫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大量逃脱希特勒屠杀的欧洲犹太人再也不愿返回他们的出生地，纷纷乘船向巴勒斯坦涌来。大量移入犹太人不仅造成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而且也使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感到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下令以武力阻止犹太移民“非法入境”，英占领当局与犹太代办处的矛盾也急剧激化。

以何种方式建立理想中的犹太国？如何处理犹太人与英国巴勒斯坦占领当局的关系？这些问题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元老哈伊姆·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此需要拿到1946年底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22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来解决。以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艾什科尔为首的巴勒斯坦工人党积极组织代表的选举工作，佩雷斯到特拉维夫不久就被吸收到这一工作中来。

艾什科尔指定佩雷斯负责工人党专职干部的代表选举工作，这使他有可能会陪同党的领袖到各个支部去进行动员活动。佩雷斯最企望的是能有机会同党的领袖本—古里安进行交谈，但有几次两人在一起时，本—古里安都没有开口，这使佩雷斯颇感失望。

一次，佩雷斯陪本—古里安乘车前往海法市。车子进入海法郊区时，本—古里安突然把头转向佩雷斯，说：“你知道吗，托洛茨基算不上是一个国务活动家。”

托洛茨基，俄国犹太人，苏俄建国时期的红军总司令，后来的“第四国际”领袖——“算不上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佩雷斯对本—古里安突然谈起托洛茨基感到疑惑，但也感到兴奋。本—古里安终于开口与他谈话了，他连忙问：“为什么？”

本—古里安颇带有一点儿振奋情绪地解释说：“不战不和是什么样的政策？要么你决定实现和平，同时付出必要的、巨大的代价，要么你决定把仗打下去，同时准备承受战争带来的危险。只有列宁才明白这个道理。”

本—古里安显然指的是1917年至1918年苏俄与德国之间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当时，强大的德国向刚刚诞生的苏俄政府提出了苛刻的和平条件，托洛茨基在苏俄无力继续打下去而又不情愿接受德国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荒唐地提出了“不战不和”的主张：一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一方面又拒签和约，结果被列宁痛斥为“把战争当儿戏”，“空想能拖延和平”。对于俄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佩雷斯是清楚的，所存疑问是：本—古里安为什么要引述这段历史？他的脑子里在思考什么？

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后，佩雷斯才领悟到本—古里安头脑中所思考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想到我能有亲眼目睹本—古里安下令开战，同时又采取措施实现和平的那一天。”新生的以色列国必然是在血和火的历程中诞生，这件事佩雷斯没有预见到。那么，他是否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又与本—古里安这位“现代以色列之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呢？

从海法返回特拉维夫的路上，本—古里安又是一言不发。但几天后他指示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夏里特说，在选代表参加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问题上，“不能光选可靠和值得信任的积极分子，还要有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

看来夏里特已理会到本—古里安这段谈话的寓意，巴勒斯坦工人党代表团中后来出现了两位年轻代表：摩西·达扬，当年31岁，后来当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另一个是佩雷斯，当年只有23岁。

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黑林山脚下的巴塞尔市白雪皑皑，12月的冰冷能够刺透厚貂皮大衣，直插人们的筋骨。但在大会会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分成两派，唇枪舌剑，争论得热火朝天。

哈伊姆·魏茨曼，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元老，正如他自己所说，“……纳哈拉勒的每一家农户和每一个马厩，特拉维夫或海法的每一座建筑，包括最小的车间，都包含着我的一滴血”，但在这次大会上却受到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抵抗运动派”的激烈攻击。魏茨曼主张继续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渐进的过程达到建立独立犹太国的目标，而本—古里安一派则认为，“外交只有以实力，即以抵抗运动为后盾才能获得成功”。这里所说的“抵抗”，就是武装斗争。

佩雷斯和达扬在激烈的争论中站在了本—古里安营垒。更进一步，他们两人联名向大会递交提案，要求采取措施拆毁英国人设在塞浦路斯岛关押所谓“非法犹太移民”的难民营，并“强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允许被关押者入境。尽管这一议案没有引起绝大多数代表的注意，但它把佩雷斯和达扬两人在其后几十年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第 22 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选举本—古里安为大会执委会负责人，这显然说明“抵抗运动”的势力占了上风。这一结果也预示着一场腥风血雨正在东地中海上空形成。

1947 年初佩雷斯返回特拉维夫时，英国已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犹太代办处成立了外交官学校，佩雷斯的名列在首批学员的花名册上，如果他入学，建国后将立即外派出国。然而，佩雷斯觉得，当外交官言谈举止要受到很大的约束，相比之下，他更愿从事那些需要火一般热情的工作。婉辞录取通知后，他回到了阿鲁莫特基布兹，着手组织有关建立新国家的基层动员工作。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艾什科尔又一次来到阿鲁莫特。他再次向基布兹负责人提出调用佩雷斯的要求，这一次不是去青年运动总部，而是到犹太人地下武装组织“哈加纳”的总参谋部负责兵役动员工作。时至今日，佩雷斯仍是阿鲁莫特基布兹的一名社员。但自 1947 年他被“调用”后，至今还未回那里长久居住。



## 第二章 让我们装配飞机大炮

1947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佩雷斯穿过特拉维夫海滨的哈雅贡大街，来到哈加纳总参谋部的所在地——“红房子”。由于多年海风中盐份的侵蚀，这栋四层小楼已变成粉红色，内部装修也绝说不上有任何奢华，然而，就在这幢小楼里，哈加纳变成了以色列国防军，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

刚到“红房子”，佩雷斯就受到本—古里安的召见。但是，谈话没超过三分钟，口气也颇为生硬，好像谁惹了他似的。“我们不得不准备打仗，但是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还有，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动员和组织一支规模巨大的部队。”

命令就这样下达了。佩雷斯也二话没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他本人来说，常规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6时到深夜12时，每周七天，连安息日也过不上。整个总参谋部只有12个人，要求每个人都超水平地发挥作用。佩雷斯的工作效率很高，除了兵役工作外，后来组建哈加纳海军支队的事也压在了他的头上。但对他未来生涯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与泰迪·科拉克共同负责在美国采购武器的事项。

泰迪·科拉克也是被老一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看中的青年人，后来曾担任以色列总理办公厅主任、国家旅游公司总经理，并连续六届担任那路撒冷市的市长。当时他被派往美国组建秘密的武器采购团，这也是哈加纳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军火采购机关。战争爆发前夕，科拉克从国外返回，找到艾什科尔，抱怨无法与哈加纳总部直接沟通联系。艾什科尔立即把佩雷斯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着科拉克的面问道：“年轻人，最近负责什么工作哪？”

“兵役动员。”佩雷斯回答说。

“会说英语吗？”

“不会。”

“嗯，你就是我要找的那种人。从今天起，你就在总参谋部负责从美国采购武器的事了。”

佩雷斯离开艾什科尔办公室后，科拉克着了急。“你干了些什么事啊！你居然任命一个毫无经验的人负责武器采购。”科拉克说。艾什科尔莞尔一笑，回答说：“别急，泰迪。我向你保证，他会干得比任何人都出色。”

后来的情况说明，艾什科尔的判断没有错。美国军火采购团与哈加纳总部间的沟通一直很顺畅，两人的合作也很密切。只是有一点令人感到遗憾：在两人的密语联络中，飞机、大炮为《圣经·旧的》上的香柏树、石竹花所替代，杀人的武器被描述成为奇花异草。

1948年5月15日下午4时，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的大厅用小木槌敲响桌面，大声喊道：“以色列国成立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含着热泪，看着带有蓝色大卫王星的国旗冉冉升起，祈祷这个新生的国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壮大下去。

然而，战火在六个月之前就已经点燃，以色列国的建立只不过把更多的阿拉伯士兵从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引到了巴勒斯坦这块本应按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的土地上。特拉维夫遭到了轰炸，哈加纳的士兵所拥有的重武器只是几门被称作“拿破仑宝物”的旧山炮。在战斗日趋激烈的关头，兵役号为45546、军阶为二等兵的佩雷斯两次

找到本—古里安，要求派自己去战斗部队。佩雷斯的要求两次都被本—古里安一口拒绝，这位新生以色列国的总理认为，佩雷斯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显然要比一个前线的士兵重要得多。佩雷斯默默地服从了这个决定，但在心灵中也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疤。后来他当了议员，每每听到自己党内的成员在议会指责对手时说“我在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他未免总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战争结束时，联合国分治决议所规定的边界已经改变。分治方案中的阿拉伯国土地被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三国占领：埃及占有加沙，约旦占有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老城，其余 622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从而控制了 78% 的原巴勒斯坦土地。本—古里安利用哈加纳大批士兵复员的机会开始组建以色列国防军。为了使军队成为一支不受政治意识左右的武装力量，本—古里安对那些他认为是思想“左倾”或“右倾”的军官一律作了退役处理。佩雷斯自然免不了参与其事，但看到一大批骁勇善战的军官挥泪而去，心中总是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带着疑虑与困惑，他再次来到本—古里安的办公室，但却提了一个与头脑中的想法完全无关的问题。

佩雷斯告诉本—古里安，他虽然感谢总理阁下对自己的器重与支持，但由于以往没受过正规教育，现在想离开总参谋部去大学读书。佩雷斯作好了受申斥的准备，没想到本—古里安一下子就表示同意，而且还宣布要送他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去读书。“但是，”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元老和现代以色列之父说话时总有“但是”一词，“有个条件，那就是你在读书时必须接替泰迪·科拉克的工作。至于科拉克，我另有重用。”

1950 年 1 月，佩雷斯以美国哈佛大学注册生的名义前往美国。虽然是一位秘密使者，但有新独立的以色列国做后盾，他对完成使命充满了信心。

一开始接手工作，佩雷斯立刻感到情况出乎想象。要是没有美国的支持，1947 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就无法通过，以色列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但当巴勒斯坦燃起战火时，美国又突然改变态度，顾虑影响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建议对巴勒斯坦实行“临时托管”。后来在美国犹太人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放弃托管方案，也承认了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但宣布对整个中东地区实行武器禁运，佩雷斯赴美时，这一禁运还没撤消。

佩雷斯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购买军火的资金。国内几乎没有钱汇来，全靠当地犹太人的捐赠作为来源。佩雷斯不得不走街串巷，要求美国犹太人伸出援助之手。他还不得不暗中走访生产兵器的企业和公司，看看有没有被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可供出售。

在本—古里安的眼里，佩雷斯在美国的秘密使命确实完成得不错。1950 年 9 月 13 日，他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录：“西蒙·佩雷斯已经到达目的地，他现正为国防部干事，并在夜间去上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为购买武器花消了 170 万美元，其中 110 万用于空军装备（80 架飞机和备件）；41 万用于海军装备（1 艘护卫舰，12 艘登陆艇，3 艘鱼雷艇以及备件）；9 万用于步兵装备（炸药、子弹和炮弹）。”

本—古里安还谈到了在加拿大采购到的军火，这方面的工作也是由西蒙·佩雷斯完成的。“加拿大极为友好。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对我们非常有帮助，而大战期间担任加拿大总参谋长的麦克诺顿的儿子成了我们的代理人。加拿大人已卖给我们 5000 发芽甲弹，200 挺二手机枪（每挺只花 80 美元，而买新的要 1300 美元，修理费不过每挺 20 美元），我们已经得到了

购买蚊式轰炸机的许可证。”

从本—古里安的日记中自然难以看到佩雷斯所花费的精力。没有钱，又要转弯抹角地把军火搞回去，简直成了“空手套白狼”。以色列原先的军火采购都委托一个住在巴黎的波兰贵族——斯特凡·泽恩斯基来代理。此人住在一所拿破仑时代建造的庄园里，靠收取高额的佣金去支付他那奢华的生活。佩雷斯到北美后写信给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平哈斯·萨皮尔，要求由自己承担购买火炮的任务，从而把付给泽恩斯基的佣金省下来。萨皮尔回信说：“你的建议太妙了！只可惜我一分钱也没有，到哪去省佣金呢？”

佩雷斯决定去找加拿大犹太亿万富翁、海克酒业集团创建人和董事长萨姆·布朗夫曼。有人告诉他，找布朗夫曼最便捷的办法是通过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博士。然而，为了保密，佩雷斯决定径直去找他。

佩雷斯来到海克酒业集团总部的大门口，但却被门卫“挡了驾”。佩雷斯没有多说话，递上一张希伯来文的名片，要求门卫交给布朗夫曼。门卫自然因看不懂希伯来文而感到有些困惑，但还是立即把名片送进了老板的办公室。没几分钟，布朗夫曼来到大门口，亲自把佩雷斯引进去。门卫从未见过布朗夫曼对客人如此殷勤，只是觉得这位刚退去稚气的年轻人来历一定不同寻常。

佩雷斯告诉这位犹太亿万富翁，他已通过小麦克诺顿搞到30门火炮，加拿大工商部索价200万美元，价钱还算合理。布朗夫曼前倾着身子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不行，他们要价太高了。”随后，他抄起电话接通加拿大工商部长，“通知”后者明天他要亲自造访。

第二天清晨，佩雷斯搭上布朗夫曼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从蒙特利尔出发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当天大地盖满了厚厚的白雪，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布朗夫曼像以往一样，不让司机打开热风器，而是从酒柜中取出威士忌，与佩雷斯共酌驱寒。

一进工商部长的办公室，布朗夫曼就摆出了讨价还价的架势。然而，没说几句，工商部长就把要价降低了50万美元。出来时，佩雷斯一方面为他未能进一步详细观察布朗夫曼的商业谈判才能而感到遗憾，一方面又为省下一大笔钱而感到兴奋，简直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登上了“七重天”。

回去的路上，布朗夫曼又请佩雷斯喝威士忌。不过，这位亿万富翁问：“剩下的那150万美元你从哪儿搞？”佩雷斯几乎是毫无停顿地回答说：“从您那里呀”。

布朗夫曼面无表情地足足盯了佩雷斯一分钟。“小伙子，你说得对。”他说，“明晚我将召些人来，咱们凑点钱。”下车时，布朗夫曼皱起了眉头。他瞧着佩雷斯穿的浅色袜子，摇摇头，“你可不能穿这一身儿到我家来参加晚宴。”他让司机拉着佩雷斯去服装店，这使佩雷斯人生头一遭穿上了黑色的晚礼服。

第二天晚上佩雷斯离开布朗夫曼家中时，手中已攥有足够支付“购货”费用的银行支票。蒙特利尔犹太社区的头面人物都来了，布朗夫曼把他们一一向佩雷斯作了介绍。倘若佩雷斯按父亲的意志读完商业学校，他现在只可能在其中某位大老板手下当个实习生。而如今，他被看作是以色列国的代表，受到恭维与尊重，这是他的父亲过去能想到的吗？

佩雷斯的喜悦并没随着他发往国内的电报而传回以色列。萨皮尔把电报送到本—古里安办公室时还嘟嘟囔囔地说：“30门大炮，不花以色列的一个

子儿……”可是，四个星期后他陪本—古里安到雅法港，亲眼看到 30 门大炮从船上卸下时，忍不住高兴地跳了起来。本—古里安扭身走了，但萨皮尔在他的步伐中也看到了春风得意的姿态。

佩雷斯与布朗夫曼的友谊并没有随火炮交易的结束而结束。佩雷斯代表以色列政府把一本由纯银做书皮的《圣经》赠送给布朗夫曼，这位亿万富翁生前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案头，布朗夫曼去世后，他的儿子埃德加·布朗夫曼一直同佩雷斯保持着密切的个人联系。海克酒业集团的实力不断增强，埃德加·布朗夫曼也担任了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今天，任何一个那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参观者在看到布朗夫曼家族捐赠的成片建筑时，都不会怀疑该家族与以色列国的密切联系。但他们知道这一密切联系的牵线人是谁吗？

能够筹集到足够资金，通过秘密渠道完成采购任务，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货物在送回国的途中遗失或被对手截获，无疑是前功尽弃，白忙了一场。1950 年冬季，佩雷斯安排以色列飞行员将刚刚搞到手的蚊式轰炸机秘密开回国内。飞行员们选择了不同的航道，其中也有通过北极的一条。不幸的是，一架蚊式飞机在飞越北极时失踪。佩雷斯说服本—古里安，利用当时以色列航空公司唯一一架客机——星式客机从事找寻工作。

飞机以加拿大纽芬兰的古斯湾机场为基地，每天在白雪覆盖的山野间从事找寻工作，佩雷斯也是搜寻队的一员。搜寻队最终也没能找到失踪的飞机，此事给佩雷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纽约时，佩雷斯无意识地告诉飞行员们，以色列今后不能再买二手飞机了，要自己造出来。飞行员们轻蔑地笑了，虽然舱外天寒地冻，但舱内却比较暖和。他们嘲笑说，机舱里的温度使佩雷斯净做“仲夏夜之梦”。

佩雷斯的想法不是梦幻。事实上，佩雷斯出不起购买整机的钱。他只能买到飞机部件，然后送到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附近的伯班克的一家小工厂里装配成为飞机，再由飞行员开回国内。从小工厂工人的精湛技艺中，他看到了在以色列制造飞机的前景。

小工厂的主人叫施韦默，是个美籍犹太人。用佩雷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才思如涌、眼光远大的男子汉，是我曾见过的最优秀技术专家”。1951 年 5 月本—古里安访美时，佩雷斯把他引入施韦默的小工厂。看到设备简陋但保养得当，厂房不大却得到充分利用，以色列总理对施韦默说：“不可思议。就靠这几台机器你们就能修飞机和装配飞机。立刻到以色列来吧！”这正是佩雷斯所企望本—古里安说的话。

当年夏天，佩雷斯陪同施韦默来到以色列。他逢人就介绍说，施韦默是“一个能造喷气式飞机的人”，这使施韦默心理上得到了很大满足。施韦默从家乡搞到了整套设备，运抵以色列后，受命同列昂·卡迪诺和丹尼·阿格农等人共同建造命名为“贝戴克”的飞机制造厂。然而，三个人向本—古里安提出，工厂的兴衰成长都需要在国防部找到一位“项目之父”，这一要求对佩雷斯后来的前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51 年年底佩雷斯回国后，巴勒斯坦工人党总书记泽尔曼·阿兰向本—古里安建议任命佩为党的特拉维夫地区委员会书记。对于一个 28 岁的人来说，阿兰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佩雷斯的特殊器重。身兼国防部长的以色列总理在几经考虑后，拒绝了阿兰的建议，任命佩雷斯担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显然，本—古里安觉得，施韦默等人所说的“项目之父”，非佩雷斯莫属。

当时担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是齐夫·申德，他同时还兼任运输部的部

长。繁忙的工作使申德无暇顾及国防部的工作，因此佩雷斯成了事实上的办公厅主任。

佩雷斯一走马上任就对国防部实行了精简改革，使之更加适应“行政化”的要求。他本人负责装备采购、生产及行政管理工作。看来本—古里安对佩雷斯大刀阔斧的行动颇感满意，九个月后，他免除了申德在国防部的兼职，任命佩雷斯为办公厅代理主任。

总理兼国防部长为何不能去掉委任状上的“代理”二字呢？这主要来自资深官员的压力。他们认为佩雷斯年轻且缺乏经验，本—古里安不得不加以考虑。不过，本—古里安有时总要为佩雷斯辩解几句。一次，国防军总参谋长伊加尔·亚丁问本—古里安“为什么要选派这样一个年轻且无经验的人坐阵国防部关键位置”，本—古里安不苟言笑地回答说：“年轻并不是缺陷。至于没经验，让我们走着瞧吧。”

1953年，本—古里安身体欠佳。劳累使他决定休息一段时期，于是在7月份任命外交部长夏里特代行内阁总理职务，任命平哈斯·拉冯代理他在国防部的工作。

本—古里安在休假第一个月中巡视了不少兵营和军事机构，目的是理顺国防部与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关系。他曾征询陪同他视察工作的佩雷斯的意见，佩雷斯回答说，总参谋部应只管统领军队、作战与训练问题，而与安全相关的其他问题则应由国防部来处理。没想到，佩雷斯的看法竟成为本—古里安的正式决定，害得与此有不同看法的国防军总参谋长莫德恰·马克莱夫任职刚刚11个月就愤而辞职。

1953年12月，本—古里安正式辞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退隐到内格夫沙漠深处的萨德博克尔基布兹去当一名普通社员。夏里特正式就任政府总理，拉冯也当上了国防部长。本—古里安临行前正式任命佩雷斯担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在佩雷斯的建议下，又提升原国防军作战部长达扬为总参谋长。佩雷斯和达扬这两位第22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联合提案人，现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 第三章 “拉冯事件”的冲击

夏里特和拉冯都曾被本—古里安看作是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异常紧张。

摩擦的原因首先是政见不同，夏里特认为，以色列国的“生存”与安全要从外交途径寻找解决办法，主要是依靠美国在联合国为其张目，迫使阿拉伯国家解除对以的封锁。而拉冯则指出，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搞遏制苏联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一定会因害怕开罪阿拉伯国家而同以色列拉开距离；所以，以色列只有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威慑对手，安全才有保障。

除了政见方面的问题外，两人的个性也使他们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在所难免。夏里特属于那一批从一开始就跟随本—古里安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老卫士”，虽然决策时优柔寡断，但在“老卫士”中人望颇佳。拉冯相比之下要年轻得多，一表人才，善于辞令，只是自恃甚高，根本看不起夏里特，也几乎看不起任何人。

从政见上说，佩雷斯和达扬与拉冯是站在一条船上的，但拉冯的独断专行作风又使两人感到无法在其手下供职。1954年上半年，佩雷斯和达扬在购买法国制造的AMX坦克问题上与拉冯发生了第一次公开冲突。

1954年初，以色列军事情报机关报告说，埃及已从英国买到了一批新坦克，美国也将向伊拉克提供同类的武器。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说，现役的谢尔曼坦克还是大战前的产品。AMX坦克虽不能说是无懈可击，但比谢尔曼坦克要先进得多。达扬积极建议引进，从根本上加强以色列陆军的突击力量。不料拉冯在背着达扬与几名军官交换意见后，一口拒绝了达扬的建议。

6月16日，达扬气愤地递交了辞呈。随后又与佩雷斯一同前往萨德博克尔基布兹，向本—古里安抱怨拉冯的专权作风。

本—古里安隐居在乡村，但几乎天天都有过去的部下来看他。作为一个资深政治家，他一直在夏里特和拉冯之间更看好后者。听了佩雷斯和达扬的陈述，他把拉冯“请”到萨德博克尔基布兹，详细地“讨论”了国防部长与办公厅主任、总参谋长的关系。最后，拉冯许诺要改善这一关系。

拉冯请达扬共进午餐，开明宗义要改善两人的关系，并要求达扬收回辞呈。然而，拉冯把“两人间的误解”都归在佩雷斯的身上，这使达扬感到“关系紧张虽已过去，但是不和的因素依然存在。”

令人感到奇特的是，拉冯与达扬发生矛盾，但受到指责的却是佩雷斯。在后来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代人受过”似乎成了佩雷斯政治生涯的特征，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的原因是他与本—古里安“走得太近”。被称作“老人家”的本—古里安隐居萨德博克尔后，常把自己比作牧羊人兼哲学家——半天给基布兹放羊，半天读书和写作。然而，正如当时担任劳工部长的果尔达·梅厄夫人所说，“如果本—古里安不是实际上仍为国家掌舵的话，至少他时刻准备着重新为国家掌舵”。萨德博克尔因为有了本—古里安而一夜之间成为以色列有名的地方，经常有人川流不息地来此访问，而佩雷斯是其中最积极的一员。看到佩雷斯在“老人家”那里穿堂入室，任何在朝的政治家都难免有芒刺在背之感。“太上皇”的亲信能不遭人嫉恨吗？

另一个原因在于佩雷斯志向“太远大”。虽然一直是阿鲁莫特基布兹的一名成员，但佩雷斯却没有回去隐居的举动。他想一生都投入到以色列国家

政治生活之中，所以每当受到指责和攻击，他绝不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常常是把眼皮耷拉下来，默不作声，最多不过是挥挥手，表明事情不是自己干的。

第三个原因放在 50 年代就让人更易理解——佩雷斯当时还很年轻，对“老卫士”们的指责只有逆来顺受的权利。不仅如此，“老卫士”们对本—古里安不满时，当然不能公开发泄愤懑，结果佩雷斯就成了出气筒。“老人家”有时还出来替佩雷斯鸣不平，其结果是对佩雷斯的攻击突然静寂下去，但一个新的浪潮又在孕育之中。

然而，佩雷斯毕竟渡过了 50 年代的“指责关”，这除了得益于“老人家”的卵翼，还借了“拉冯事件”的光。

1954 年，整个以色列似乎都突然感到它在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的领导人、而今走到前台的阿卜杜勒·纳赛尔。纳赛尔要求部署在苏伊士运河区的英国军队撤出埃及，而美国为了把阿拉伯国家拉入反对苏联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也劝说英军迅速撤出。以色列军方认为，英军的撤出将把运河区的机场、码头和其他军用设施留给埃及军队，从而大大增强埃军的实力。拉冯、达扬和佩雷斯都盘算着怎样才能整纳赛尔“一把”。

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局长宾亚明·吉布利与拉冯和达扬的关系都不错，但拉冯抛开达扬找到吉布利，要求后者想办法在 1954 年 7 月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前离间美国与埃及的关系，从而使英军能够留下来。

吉布利打算利用一张被达扬称之为特种部队的、隐蔽在埃及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犹太情报网，该情报网的负责人叫阿弗里·埃拉德。吉布利向拉冯报告了自己的打算，拉冯对此表示完全支持。但是，吉布利不知道，达扬曾同拉冯讨论过这支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要求在平时保持其潜伏状态，只有战时才可使用。

1954 年 7 月中旬，达扬率团赴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吉布利在这段时间下令让埃拉德在埃及从事破坏活动：烧毁美国在埃及的经济、文化机关，从而挑起美对纳赛尔的不满；伪装伊斯兰激进分子破坏公共设施，以此动摇英按计划撤军的决心。

先不说这一设想有多么幼稚，就是说行动本身也毫无成效可言。7 月 14 日，特种部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两城市的美国图书馆点了火，但很快就被扑灭。7 月 23 日，特种部队在开罗火车站、开罗的两家电影院和亚历山大的两家电影院安放了燃烧弹。虽然火是点起来了，但先后有 12 名行动分子被埃及警方抓获，只有埃拉德逃脱。多少年后传出的消息说，被抓住的人中有一个是埃及安全部门派来的卧底分子，行动的失败也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吉布利得知行动失败后紧急求见拉冯。他没有报告真实情况，只是建议拉冯批准在埃及“实施行动”。拉冯自然没有意识到他面对的行动方案已是明日黄花，不假思索地下达了批准命令。

8 月 24 日，从国外返回以色列的达扬看到了吉布利就特种部队被埃及警方破获所写的书面报告。自然，这个报告载明行动方案是经拉冯批准的，达扬对拉冯未与其商量就动用原准备在战时使用的部队甚感气愤。在佩雷斯的鼓动下，达扬到萨德博克尔“老人家”那里“参”了拉冯“一本”。本—古里安当时没做声，但对拉冯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12 月 11 日，埃及法庭开始审判“犹太复国主义间谍案”，拉冯读到报纸上的报道，才发现自己受了吉布利的骗。拉冯打算惩处吉布利，但吉布利

反咬一口，说拉冯在7月16日就下令批准了在埃及的秘密行动。拉冯很快就找到证据，批驳了吉布利的谎言。但拉冯这时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宣布自己只是在7月31日才在吉布利的蒙骗下发出了命令，这比实际的日期晚了八天。

后来，可能是通过佩雷斯，有关方面在拉冯的办公室里找到了7月26日吉布利写来的报告，其内容是通知拉冯，“我们的人”在埃及被抓起来了。报告说明了拉冯也在讲假话，但他跑到夏里特那里，状告佩雷斯、达扬和吉布利“合谋”企图搞掉自己。

佩雷斯、达扬和吉布利是否进行了合谋，不得而知。但是，吉布利与他的部下以及死里逃生的埃拉德的确进行了合谋。他们在由前以军总参谋长亚可夫·多利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伊扎克·奥辛组成的调查委员会面前作了伪证，还重新打印了一封给达扬的电报，上面说“埃及行动”是“根据拉冯的命令”进行的。

多利—奥辛调查委员会的最后结论写得含混不清：“我们发现，我们至多只能说我们绝不相信（军事情报局局长）没有从国防部长那里接到命令。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肯定国防部长确实发出了被认为是由他发出的命令。”拉冯看到这一结论后大发雷霆，他当着夏里特的面，扬言要把问题提到议会中去解决。

埃及对“犹太间谍”的审判在以色列引起了极大反响。判决前，已有两名被捕的犹太人在狱中自杀身亡。1955年1月27日，埃及法院宣布了判决结果：被告中两人被宣告无罪（其中有一个肯定是埃警方派出的密探），六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斯穆尔·阿扎和摩西·玛祖克被判绞刑。夏里特知道，如果听任拉冯把问题拿到议会上，以色列公众会指责政府应对特种部队在埃及的覆灭负责，巴勒斯坦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

2月1日，夏里特和几位老卫士来到萨德博克尔，准备听取本—古里安对“拉冯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老人家”那里传出的消息是拉冯“应当走”，结果拉冯第二天就递上了辞呈。不过，他在信中埋了伏笔，说要把问题通报“全党”，夏里特认为这也不能接受，因为许多内阁部长还不了解问题的细节，更不要说是全体党员。

夏里特决定让拉冯留任，但拉冯进一步提出：必须解除佩雷斯和吉布利的职务，国防部也要大换班。

佩雷斯的个人前程已处在危机阶段，因为夏里特准备向拉冯妥协。但是，当夏里特召来达扬，通知他吉布利已被解职、正要谈佩雷斯的前程问题时，达扬抬出本—古里安，说“老人家”已决定，“拉冯必须走”。

夏里特没办法，最后定了一个“谁也不能走”的决定。岂知拉冯决不善罢甘休，再一次提出辞呈，似乎无人能替代他，只能依他的意见来办。这一次，“老人家”出马了，他决定回政府担任国防部长，拉冯不得不吞下他自己酿造的苦果。9月份，本—古里安又一次成为总理兼国防部长，夏里特重新专职担任外交部长，佩雷斯的政治前程又露出了红色的晨光。



## 第四章 敌人之敌人乃朋友

本—古里安的复出倒不全是为了解决党内的冲突，而是认为以色列的周边安全环境正在恶化，但夏里特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

单纯从以色列的角度看，本—古里安的看法或许有些道理。1955年2月24日，伊拉克和土耳其结成联盟，从而形成后来的巴格达条约的核心。伊、土之间的联盟在以色列和埃及都引起激烈反响。本—古里安认为，这个得到美英支持并以军援作后盾的军事联盟将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而纳赛尔则威胁说，如果美英只答应向阿拉伯君主国提供军援，而把埃及这个新生的阿拉伯共和国抛在一边，他将另寻军援途径。

1955年9月，纳赛尔宣布，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已签订了一项用棉花换军火的协议。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包括：200架米格15战斗机和伊尔18轰炸机，230辆坦克，200辆装甲运兵车，100门自行火炮和500门其他种类的牵引式火炮，还包括2艘驱逐舰，20艘鱼雷艇和6艘潜水艇。

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棉花—军火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它声称这使以色列在地区均势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上。购买军火的特使被派到许多西方国家，但除了得到一点儿口头上的同情外，几乎都是空手而归。最令以色列感到失望的是美国的态度。讲到埃捷之间的交易，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反复说要重新审定美国对以的军援政策，但到头来，重新审定的结果是以色列外交部收到一封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信函，那上面说，美国将不反对以色列从别的西方国家搞到武器。的确，尽管杜勒斯对埃捷协议大为光火，但出售武器给以色列可能会激怒伊拉克，从而使它一手操办的巴格达条约化为灰烬。

正当外交部为屡屡受挫而感到焦头烂额时，佩雷斯却在另辟蹊径。在一次本—古里安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佩雷斯提出了“法国方向”的概念。

1954年11月1日，一个叫作“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向法国殖民军打响了第一枪。这一组织得到了纳赛尔的道义和物资支援，这使法国政府极为恼火。按照佩雷斯的逻辑，“每一个在阿尔及利亚被杀的法国人，如同一个在加沙地带被杀的埃及人一样，都是加强法以关系的重要一步”。佩雷斯还强调，他说的话可能不中听，但却反映了现实情况。

后来佩雷斯又进一步解释说，尽管法国人一贯对以色列有好感，但两国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感情之上。这种共同利益是存在的：法国力图继续控制阿尔及利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埃及支持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作战——以色列是阿拉伯人的敌人，“敌人之敌人乃朋友”——法国会因此向以色列提供以色列所想要的东西。

其实，佩雷斯个人与法国政府的秘密联系早在1953年底就建立起来了。在此之前，以色列从法国购买武器都是由前面提到的斯特凡·泽恩斯基代理的，数量不多，钱却花了不少。这位波兰没落贵族不仅要收15%的佣金，还索要大量的“活动费”，用以“润滑轮子”。佩雷斯被任命为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后，在办公室里召见了正在以色列的泽恩斯基。佩雷斯要求泽恩斯基说明“活动费”都付给了什么人，否则，以色列将停止支付这笔费用。泽恩斯基回答说，钱都给了“接近”法国副总理保尔·雷诺的“那些家伙”。佩雷斯表示他想见雷诺，泽恩斯基满口答应予以尽快安排。

几个星期过去了，泽恩斯基的安排总是一拖再拖。佩雷斯决定亲赴巴黎，

而且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保尔·雷诺，要求会面。第二天，雷诺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佩雷斯。客人先讲了以色列的困难和需要，然后不加停顿地提出了购买火炮的要求。对此，雷诺回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让我来安排吧。”

从法国副总理那儿出来，佩雷斯打电话问泽恩斯基：“保尔·雷诺那边的事怎么样啦？”泽恩斯基“嗯”了一声，回答说：“他下星期见你。”佩雷斯明白，这个军火商关于贿赂雷诺身边人的说法全是一派胡言。此后，以色列开始直接从法国购入武器。当然，泽恩斯基的钱也赚够了。

为了从法国购入更多的武器，佩雷斯认为自己需要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在拉冯的管制下，这自然只是幻想。但到本—古里安东山再起时，几乎是毫无节制的权力都被赋予了佩雷斯。

1955年5月初，在“老人家”的批准下，佩雷斯怀揣一封达扬写给法国国防部长皮埃尔·科内格将军的信再次前往巴黎。本—古里安对刚刚结束的万隆会议很感担心，因为纳赛尔成了会场上的“一颗明星”。佩雷斯在会谈中向科内格提交了一份采购清单，科内格表示将积极予以考虑。

后来法方的供货单表明，科内格几乎满足了所有以色列方面的要求，只是神秘型战斗机只有24架，这与以方的愿望相去甚远。不过，佩雷斯倒是觉得应该感到满足，因为他知道法方对美国支持的巴格达条约颇为不满，害怕美借此在中东排挤法国的势力。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也反对巴格达条约，法国不愿因扩大同以色列的联系而开罪这两个可能利用的阿拉伯国家。

9月份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棉花—军火协议公布后，佩雷斯又赶到法国催货。这一次他对协议作了一个重大的修改：一些法国空军官员悄悄告诉他，神秘型飞机在设计上有重大缺陷，要他转订刚投入生产的神秘型战斗机，佩雷斯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

两天后，就将从总理职位上卸任的夏里特来巴黎会见西方三大国的外长，要他们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但夏里特的希望破灭了，因外长们在会议上都拒绝这样做。夏里特向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的辞行拜会仅持续了10分钟，但就在这10分钟内，富尔告诉夏里特，他已经批准了佩雷斯与法国国防部达成的军火合同，以色列不久将得到24架神秘型飞机。

夏里特与佩雷斯并未因此而感到特别兴奋，因为法方还附加了一个先决条件：由于神秘型飞机是根据美国的要求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制造的，供货协议必须得到美方的批准。

当以色列驻美外交官找到美国国务院时，美方官员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批准法以协议的意见。但以后去催，美方官员今天提一个问题，明天又提一个问题。最后，还未等美方给予最终答复，从巴黎传来消息说，富尔政府已因其经济方案未获议会批准而倒台，新政府要待1956年1月议会大选后才能成立。这实际等于说，如果富尔所在的法国激进社会党不能在大选中获胜，法以军火合同就有可能失效。

佩雷斯听到这一消息后迅速得出两点结论：（1）要按正常办法保住合同是不可能了；（2）在法国新政府成立前必须得到执行合同的保证。当天，佩雷斯就前往巴黎，会见了法国看守内阁的国防部长皮埃尔·比洛特将军。讨论的主要问题当然是神秘型飞机，但事前佩雷斯听人说，法国空军司令对神秘型飞机有特殊的钟爱，不允许从武器库中抽取该型号的飞机外售，他于是决定变换一下谈话的方式。

佩雷斯告诉比洛特，以色列考虑到法国方面可能在供应神秘型飞机上

有困难，因此已经决定购买神秘型飞机。他一边说，一面暗中企望得到他所想得到的回答。结果他得到了。比洛特跺起脚来，大声说：“神秘型飞机？没那么回事！你们必须买神秘型飞机，此事我已经和富尔讲了，他那儿没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要你发誓彻底保密，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洛特停顿了一下，放缓了口气，说：“如果你们能在自己的报纸上骂一骂法国，事情就更好办了。”

佩雷斯虽然面无表情，但心中甭提多高兴了。他觉得比洛特只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话说得正对以色列人的心坎儿，以致一时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以法新协议的签字时间定为次日下午5时整，地点是法国国防部副部长克罗谢尔的办公室内。

佩雷斯可能是高兴得早了点儿，后来他在日记中记述道：“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克罗谢尔的办公室，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喜气洋洋地准备签约。克罗谢尔笑着问我：‘现在以色列的天气怎么样？’我们花了五分钟时间谈天气，但注意到这里毫无要签约的气氛。最后，我不得不说：‘我们是来签约的。’‘啊，’克罗谢尔回答说，‘你们是来签约的吗？但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美国人和我们自己的外交部。’”

事情还得从头开始，佩雷斯不得不继续与法国的将军和政府官员周旋。两天后，协议终于签了。法国人答应提供155毫米加农炮和谢尔曼坦克，就是没提供应战斗机的事，这使佩雷斯不得不于12月再次来到巴黎。

佩雷斯又一次见到比洛特，但这位将军没等佩雷斯开口就大发雷霆。数日前，以色列特种部队袭击了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比洛特认为这一行动危害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不过，比洛特提出今后两国要加强事前的协商，这一要求没直接得到答复，但佩雷斯把它记在了心上。

比洛特推说他要参加大选而不能与佩雷斯深谈，佩雷斯则跟随比洛特来到这位法国将军的选区第戎市，这使比洛特不得不坐下来与佩雷斯好好谈一下。佩雷斯建议，为了绕过必须经美国批准这个难题，法国可将退役的战斗机卖给以色列。而比洛特回答说，富尔总理认为“美国不久将会批准法以军火合同，所以法国愿继续等一等”。在佩雷斯看来，希望已经没有了。但比洛特话锋一转，告诉佩雷斯，在目前的情况下，富尔总理已下令“立即签订向以色列出售12架神秘型战斗机的协议。如果美国批准这一协议，法国将立即交货。倘若美国不批准这一协议，而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又能如期完成制造计划，那么法国将在不迟于1956年7月向以色列转交这12架飞机”。在佩雷斯的要求下，比洛特还授权下属向以色列转让一批数量可观的“飞机部件”。用佩雷斯的话说，这批部件足够在以色列境内“再组装几架神秘型飞机”。

法国大选的结果使得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受命组织法国新政府，他指派富尔政府时期任内政部长的布歇—莫努里出任新政府的国防部长，两个人一下子都成了佩雷斯“追踪”的对象。

摩勒与佩雷斯并不陌生。大选期间，佩雷斯就刻意邀请摩勒一起共进午餐。摩勒对此颇为感谢，一见面就自诩为“以色列的朋友”。但佩雷斯想到法国社会党过去曾有过上台前对以色列许诺万千、上台后翻脸不认人的历史，于是弦外有音地说：“英国的欧内斯特·贝文上台前也自称是犹太人的朋友，但一掌了权，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对此，摩勒的回答倒还算干脆：“我不会成为另一个贝文。”

至于佩雷斯与布歇·莫努里的交往历史，那更是早得多。两人第一次见面是由以色列驻法武官约瑟夫·纳哈米亚和法国内政部办公厅主任阿贝尔·托马斯安排的。初次相识说的都是一些客套话，但两人一下子都发现对方与自己有共同之处——他们即使干的不是自己份内的事，也绝不容许别人插手。

当然，佩雷斯最初也不会肯定，他的这些和人交往会对未来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当居伊·摩勒宣誓就任总理后，佩雷斯手持本—古里安致法国政府首脑的信去见摩勒时，事情好像一切都清楚了。摩勒一边对佩雷斯说“现在你看到了吧，我不是贝文”，一边招呼秘书草拟命令——以前历届政府所定协议必须遵守。这一命令的具体后果在1956年4月11日得到了体现：本—古里安亲率资深文武官员出现在以色列北部的某一军用机场上，随着晨曦泛起的灰白光线中一次又一次显现的银色划光，12架神秘型飞机依次降落，停放在机场的跑道边。

本—古里安脸上显露出略带得意的微笑，但也有人感到不那么满意。财政部长艾什科尔3月份曾抱怨说这笔军火开销太大，还没等佩雷斯向这位老上司作解释，本—古里安就写了一个条子：“致财政部长和以色列公民艾什科尔：我希望西蒙（·佩雷斯）能因买武器向你更多的钱。就目前而言，你的任务是毫不拖延地批准这几笔买卖，以便能立即成交。”

“老人家”君临天下的口气自然使艾什科尔感到不快，其迁怒于佩雷斯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比起夏里特对佩雷斯的怨恨，艾什科尔的愤懑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担任外长的夏里特本来就对佩雷斯在法国避开以色列外交官自行其是痛恨不已，后来两人对美国政府的看法南辕北辙，更使对立成为直接的冲突。夏里特可以说是一个“亲美派”人物。1955年他担任总理期间顾虑美国的态度，拒绝与新中国发展关系，使中以两国人民相互隔绝了30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建“巴格达条约组织”，不愿放松对以色列武器出口的限制，夏里特则始终坚持要设法说服杜勒斯，结果劳而无功。佩雷斯则相反，在会见杜勒斯后，当面告诉本—古里安，杜勒斯是“一个牧师与律师奇特的复合体。他有时拿出检察官的腔调，有时则满嘴神秘主义的神学论点。谈话开始时他会说，是犹太人杀了穆罕默德，而到最后，又说由于美国的成就，俄国人已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反正他就是不讲以色列购买武器的事情”。佩雷斯还向本—古里安汇报说：“杜勒斯心中有一个难以忘却的犹太情结——他一生只在一次选举中失利过，而这个选区的犹太选民又占很高的比例。所以，杜勒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

佩雷斯的汇报使得本—古里安认为必须作出最后决定。1956年4月2日，“老人家”召来夏里特、达扬、佩雷斯，还有当时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后来当过以色列总统的雅科夫·赫尔佐克，要大家就是否继续在美国游说购买武器事发表意见。夏里特在发言中坚持要把游说工作继续下去，他认定杜勒斯是会被说服的。没等他人发言，“老人家”一句话定下乾坤：“我们必须停止一切在美国的求情活动！”

后面的“讨论”气氛要轻松得多，但挑起的感情纠葛却颇为复杂。达扬向佩雷斯表示祝贺，夸奖他在购买神秘型飞机一事上干得出色，谁知却引起了夏里特的不快。会后第二天，夏里特给本—古里安写了一封信，上面说：“我对西蒙·佩雷斯不懈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深感羡慕，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是我与富尔在1954年10月举行的会谈打开了从法国购买武器

的僵局，并使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夏里特在信中所流露的怨气究竟反映的是外交部和国防部之间的矛盾，还是他与达扬和佩雷斯之间的个人恩怨，本—古里安的看法是两者都有。在接信后的次日，这位身兼国防部长的总理给他的外交部长回信说：“在谁先后、谁干得多干得少的问题上，我或许有失察的地方。我认为，政府各部、每位公职人员都是同一事业的参与者，而对谁应得到更大的殊荣毫无感兴趣的地方。可能我眼光很短浅，但我认为总参谋长（达扬）的话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武器为兵工厂或军队所有，我们就应先与兵工厂或军队接触。当然，外交部长也应了解情况。如果（法国的）武器所有者与我们的外交部联系，你当然要履行外交部长的职责。但是，假如西蒙（·佩雷斯）也可以见到法国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或者其他什么人，只要这一接触有效用，我并不认为它会产生什么部际之间的矛盾。我这个人不懂得什么部际之间的关系，但就个人作用而言，我认为，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要比什么事都干更易取得成功。这就是我对西蒙（·佩雷斯）取得成功的看法，他的成就确实不小。”

本—古里安这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夏里特的，还不如说是写给佩雷斯的。“老人家”的“上谕”不仅阻止了夏里特对佩雷斯的发难企图，也明确告诉佩雷斯，他在武器采购问题上可全权自由行事。实际上，佩雷斯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支持者：法国国防部长布歇—莫努里在就任后第一次会见佩雷斯时，也要求两国国防部避开各自外交人士的干扰进行直接的合作。

1956年4月30日，佩雷斯在给国防部下属“训话”时，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法以军事合作的成因和目的，他说：“在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然而，这种分歧并非出自简单的机构间的摩擦，而是因为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有不同。外交部认为，法国在中东处于一种中介位置，它可以在尖锐对立的美国 and 苏联之间从事沟通活动。而国防部的眼睛看到的是160万以色列人和在阿尔及利亚的160万法国人。随着阿尔及利亚形势的恶化，法国国防部把以色列看作是对抗纳赛尔的第二条战线。以色列必须选准方向，利用一切国家内可以利用的力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佩雷斯选择了法国，更确切地说是选择了法国的国防部，而本—古里安又赋予他充分的行动自由，一时从法国采购武器成了佩雷斯的主要工作。经常秘密出入巴黎自不必说，就是在以色列国内时，他也不断地用长途电话与以驻法武官纳哈米亚保持联系。不过，能听懂佩雷斯与纳哈米亚谈什么的人不多，比如那谈话——

佩：“卡尔曼·米兰达结婚了吗？”

纳：“谁？请再说一遍。”

佩：“卡尔曼·米兰达小姐。”

纳：“噢，她走了。”

佩：“她找到一间临时用的房子了吗？”

纳：“我可不知道婚礼到底办了没办。”

佩：“好，明白了！”

他们说的是密语。这种密语是为了欺骗敌人还是自己人，谁也不知道。或许，两者都有……

## 第五章 为原子能反应堆而战

1956年底，法国议会要求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以报复该国对阿尔及利亚反法武装斗争给予支持的叫嚣不断扩大，这使佩雷斯颇感得意。早在该年5月，佩雷斯就向本—古里安提出建议，要求与法国结成反纳赛尔同盟。在“老人家”首肯后，佩雷斯飞往巴黎，正式向布歇—莫努里提出了一个一揽子方案：双方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埃及，同时由法国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武器。布歇—莫努里很赞赏这一方案，双方约定以秘密会议的方式商讨合作细节。

与法国结盟的方案未能得到夏里特的赞同，而本—古里安又威胁说他不愿干在主要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事，其结果是夏里特于1956年6月19日提出辞职，由原劳工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接替他的外长职务。

6月22日，达扬、佩雷斯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雅胡沙法·哈卡比将军秘密搭乘一架法军的“北极”飞机来到了巴黎郊外的一座军用机场，法军方代表和以驻法武官纳哈米亚已在机场等候。法方把达扬等人安排在巴黎远郊一个叫佛美维尔的小镇里，住处是一座周围有高大围墙的古堡。当天下午，以法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路易·曼金为首，包括查理将军、利沃德将军和法情报机构代表在内的法方代表团来古堡与以色列代表团会谈。双方在共同对付埃及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合作原则也很快商定下来。后面轮到军火交易问题，佩雷斯拿出一份清单，声音缓慢地将以色列所需物资读出来：200辆AMX坦克，72架型战斗机，4万发75毫米炮弹，1万发反坦克火箭。这笔交易的总价值为7000万美元。以方的几位代表都屏住呼吸，看看法方代表会不会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出人意料的是，曼金不动声色地问：“你们准备签约吗？”达扬、佩雷斯等人都惊呆了，他们原先设想，法方能答应其中的一半就是值得庆喜的事了，没想到对方如此爽快。还是佩雷斯反应快，他答到：“当然。只要你们准备好协议文本，我们立即就签字。”

纳哈米亚拉了拉佩雷斯的衣襟，凑近他耳朵说：“你还没得到授权呐！”自然，纳哈米亚的提示是完全正确的。但佩雷斯认为，法国军方的“慷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一再出现政府更迭，这一机会可能会失之交臂。他知道政府内外会有人反对这笔对以色列来说颇为沉重的军火交易，但他也想到了本—古里安的支持。一个小时后，协议文本拟出来了。佩雷斯几乎是未假思索，提笔在上面签了名。对于佩雷斯的这一举动，达扬在自己的日记上作了专门的记录：“在巴黎的谈判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经历。这一谈判给我们以希望、信心和骄傲。我们将得到武器，而且是质量可靠、交货及时的武器。在一年之内，我们将拥有一支新型的空军和一支新型的装甲部队，它们将装备先进的攻防武器；我们将从苏联与埃及同盟构成的危机中崛起。”

或许是出于极度兴奋，佩雷斯和达扬等人决定在法国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去逛逛巴黎。由于使命本身是高度机密的，夜逛巴黎也是在“提心吊胆”中进行的。达扬后来写道：当进入一家电影院后，几个人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然而，巴黎实在太小了。在我们座位的前三排坐着我们大家的一个熟人——保罗·考姆斯基。虽然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影片的情节中，但我们心慌意乱，还是悄悄地到前排找了新座位坐下。在新座位上刚坐定，我就指着坐在前两排的一位女士低声和大家开玩笑说：‘那个女人要是索莎娜·达曼理（当时在以色列走红的女歌星）的话，我一点儿也不会吃惊，她

和索莎娜长得一样。’说着说着，那位女士回过头来，好像是要寻找什么人。天哪！谁也不敢说她不是索莎娜。我们几个人低下头，悄悄地溜了。”

冒险夜逛巴黎的事，佩雷斯和达扬都没敢向本—古里安汇报。但是在汇报军火交易时，“老人家”倒是说起了冒险。他承认搞军火是一个冒险的行当，“可又怎么办呢？我们的生存就是冒险！”

7月中旬，36架神秘型飞机秘密飞抵以色列；几天后，一艘名义上驶往阿尔及尔的货轮抵达海法市的吉绍港，30辆坦克和60吨弹药被卸下来。本—古里安亲自参加了这两次军火交接活动，随从的以色列官员心里都喜洋洋的——“有了法国提供的先进武器，纳赛尔敢拿我们怎么样……”

然而，埃及总统纳赛尔生就英雄般的气概。1956年7月26日，也就在法国坦克运抵海法市两天后，纳赛尔宣布，埃及将对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一切外国的领港员必须在9月15日以前撤走。

纳赛尔的决定使英法两国政府气急败坏，盘算着要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正在巴黎的佩雷斯也积极活动起来。7月27日，他打电报给本—古里安汇报说：路易·曼金紧急约见他，在场的还有法军总参谋长保罗·埃利将军和法国空军司令查理将军，“没说任何客套话，他们通知我说，明日（英国首相）艾登和（法国外长）皮诺要在伦敦进行紧急磋商，讨论采取何种措施以应付纳赛尔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声明。法国外长已经许诺明天（向英方）提供有关埃及军队部署和位置的最新情报，所以要求我们在明天他出发前把这一情报交给他”。如果只是提供情报，还谈不上法以关系有什么更特殊的地方，但佩雷斯发来的电报中还留了一个伏笔：“他们微笑地对我说，如果有必要（展开一场）英法联合行动，他们相信以色列一定会积极参加。”

7然而，如果说法国准备把以色列纳入英法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中去的话，英国的态度则截然相反。8月1日，佩雷斯打电报给本—古里安的私人助手纳哈米亚·阿格夫：“虽然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采购武器和零配件，但我们在和法国国防部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不说到苏伊士运河的事情。英国和法国已原则上决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以接管苏伊士运河。但是，据（法国官员）阿贝尔·托马斯告诉我，英国所提条件之一是以色列不得介入，甚至要求不得将此事告诉我们。英国人认为，我们的参与将使阿拉伯人在纳赛尔周围团结起来，结果把联合军事行动搞成了以阿战争。”佩雷斯可不愿置身度外，他告诉阿格夫说：“目前我们正在制定以色列参与（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如果有必要，我们还可多干一点事情，如：在南部边境地区制造紧张气氛，甚至打掉埃及在加沙地带的部队。”

在电报的末尾，佩雷斯似乎还有些东西没搞明白：“目前我的情况有些特别：布歇—莫努里要我多呆几天，以便能更详细地了解（英法）联合行动计划。我不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否有用，请你给予答复。另外，如果‘老人家’有何需要告诉法国人的行动准则，也请立即告诉我。”

没等佩雷斯收到本—古里安的指示，布歇—莫努里又一次约见他。法国国防部长问：“要是要求你们的军队跨过西奈半岛，打到苏伊士运河，你估计要多长时间？”佩雷斯回答说，从以色列的观点看，大约需要五至七天。布歇—莫努里有些吃惊，也有些将信将疑。他告诉佩雷斯，法军要采取类似行动，一般给三周的时间。他又问：以色列是否打算有一天在自己的南部边界采取军事行动？对此，佩雷斯回答说：“埃拉特就是我们的苏伊士。我们绝对不允许埃拉特遭到封锁。如果埃拉特被封锁，以色列当然要采取行动。”

如果说布歇—莫努里的话还有些转弯抹角，那么法军中下级军官的话可以说是相当直率的了。他们问佩雷斯：“如果法国与埃及交战，以色列是否与我们并肩战斗？”佩雷斯的回答也很肯定：“是。”谈话后，随同佩雷斯的以色列驻法武官纳哈米亚可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说道：“你说这话是要被绞死的！你怎么能这样回答呢？你得到授权了吗？”佩雷斯倒是毫不在意：“如果我说不，法以关系就要告结束了。当然，采取这种军事行动需要得到政府授权，可我们也能改变（领导人的）看法呀。”

纳哈米亚更不明白了。改变领导人的看法，谈何容易！他哪里知道，佩雷斯心中早有主意。回国后，佩雷斯向内阁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借“苏伊士运河危机”之时，从法国购进原子能反应堆！

原子能反应堆？用铀 238 做燃料，废弃物成了钚 239，经过提纯和处理就成了可以制造原子弹的材料！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内阁部长们吃惊了。艾什科尔指责这是在说疯话，一方面是因为原子弹令人心寒，一方面又代价太高，他这个财政部长哪能把国库的钱都用到这上面。

佩雷斯在一片指责声中把眼睛盯在本—古里安身上。“老人家”一开始似乎有点儿踌躇，好像还轻轻地摇了一下头。但在最后，他“拍了板”——“买！”佩雷斯要的就是这句话。

重返巴黎的佩雷斯抓紧时间向法国人提出购买原子能反应堆的要求。法国人的反应也像以色列内阁部长一样，推托、吞吞吐吐，后来又说难做决定。尽管佩雷斯反复说这是“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但法国人当然认为其目的不仅仅在此。最后，佩雷斯干脆告诉法国人，只要卖原子反应堆给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将给予同等的回报——“积极的军事合作”。就这样，法国人点头了。以色列未来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现在和购入原子能反应堆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56年9月初，布歇—莫努里在巴黎告诉佩雷斯，美国人已向英法传来话，不赞成以军事行动改变“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状况。美国人私下里说，用搞政变的方式也能推翻埃及现政府。或许是受美国人的影响，英国不赞成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另外，他们还建议把军事行动定为两个月的时间，目的是在其间搞些外交活动。至于法国，布歇—莫努里愿意早一点儿发动进攻。用他的话说，时间拖长了，这一届法国政府可能要倒台。

布歇—莫努里的话说得不明白，但佩雷斯心领神会。法国方面的意思是要早一点儿开战。虽然以色列国防军尚需一段时间来掌握新购入的法国武器，但佩雷斯认为，在开战时间上“照顾”法国将有助于签订购买原子能反应堆的协议。佩雷斯打电报向本古里安建议，行动方案可按英国的建议拟订，但行动开始时间应在法国认为合适的时机。9月21日，“老人家”复电批准了佩雷斯的建议。不过，本—古里安也没忘在电报上加一句：“我最高兴的事是就那件事情达成协议。”“那件事”当然是指购买原子能反应堆的事情。

佩雷斯当天就把本—古里安的答复转告给布歇—莫努里。法国国防部长喜出望外，当天就与佩雷斯签订了原子能反应堆协议。后来由于英国坚决反对，法国未能提早开始军事行动。佩雷斯对此倒没有什么“感觉”，反正他已把想要的东西拿在了手里。

1956年10月，欧洲和中东的政治形势出现动荡。苏联先派兵进驻波兰，随后又派兵进入了闹事的匈牙利。西欧舆论大哗，似乎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



就要土崩瓦解似的，在中东，约旦的大选使一批英国人认为是“亲埃及的人士”进入了议会。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海岸拦截了一艘埃及货轮，声称其偷运武器，并为此召回了法驻埃及大使。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英法两国政要觉得，此时是对埃及采取行动的“天赐良机”。

经过紧张的讨论，英法拟订了一个入侵埃及的方案：先由以色列挑起战火，占领埃及的西奈半岛并进抵苏伊士运河；尔后，由英法发表声明，呼吁埃及和以色列停火并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出；英法估计埃及会拒绝这一呼吁，在这种情况下，英法军队将以“维护国际水道秩序”为由占领苏伊士运河区。

10月17日，法国政府将英法方案通知以色列，要求召开法以政府首脑会议研究具体贯彻办法。在有梅厄夫人、艾什科尔、达扬和佩雷斯参加的会议上，本—古里安大发雷霆，指责英法方案是英国企图败坏以色列形象、把以色列变成侵略国的阴谋。不过，“老人家”还留了一手，他让佩雷斯通知法国人，如果法方对他的邀请依然有效，他愿赴巴黎进行磋商。

佩雷斯和达扬此时似乎都成了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谁开第一枪根本就不重要。佩雷斯甚至设想派一艘以色列货轮去苏伊士运河，只要埃及方面拒绝这艘货轮通过运河，就以此为借口对埃及开战。

10月21日晨，法国总理居伊·摩勒派一架飞机来接本—古里安。虽然随飞机而来的曼金和查理将军表示法国不准备更改英法方案，但佩雷斯和达扬还是把本—古里安劝上了飞机。在巴黎郊区的色佛尔宫，英、法、以三国的领导人连续三天密商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

本—古里安在谈判中作了一些让步。他同意首先由以色列军队发起进攻，但借口以色列城市有遭埃及空袭的危险，要求英法空军在开战后立即轰炸埃及的空军基地。本—古里安的这一要求自然遭到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的拒绝。劳埃德甚至威胁说，他已与埃及外长法齐举行过会谈，没有必要以军事手段“解决苏伊士问题”。

会谈接近破裂时又出现了转机。约旦大选后产生的新内阁公开宣布要废除英约防务条约，而且还打算加入埃及—叙利亚联合司令部，这使英国首相艾登觉得“纳赛尔正在把英国人从中东赶出去”。搞垮埃及纳赛尔政权——现在成了英、法、以的共同目标，达成共同的战争方案也因此成为可能。

1956年10月24日晚7时，英、法、以三国签订了《色佛尔协定》，具体规定了各方在战争中的“责任”和“时间表”；10月29日，以色列首先在邻近苏伊士运河的米特拉山口地区空投一支部队，挑起战争并在地面部队支持下占领埃及的西奈半岛，逼近苏伊士运河；第二天，英法政府将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呼吁，要求双方停火，各自从苏伊士运河后撤10英里，并“同意英法为保障水路航行自由而暂时占领运河沿岸的重要地点”；英法要求在12个小时内“满足它们提出的要求”，如果交战方之一拒绝遵行（三国估计埃及会拒绝英法的要求），英法将“采取必要措施”“使它们的要求被接受”。

作为君子协定，英法在埃及拒绝它们的“呼吁”时，不要求以色列从运河区撤兵。英法军队把自己发动进攻的时间定为10月31日。另外，法国还将派两个中队的飞机和几艘军舰进驻以色列领土和领水，确保以色列本土不受埃及军队的反击。

仔细观察一下三国间的协定，人们不难发现，这一协定同英法最初拟订的方案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换言之，本—古里安已经从最初的反对立

场后退，他作了全面的让步。法国国防部长布歇—莫努里对此是一清二楚的。签字仪式后，他紧紧地握住佩雷斯的手，因为正是这个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说服了本—古里安，从而使英法的方案从最初的设想变成了严格的协定。

1956年10月29日下午5时20分，以色列第202伞兵旅所属的一个营约395人，分乘16架达科他式运输机由低空侵入埃及西奈半岛领空，在距运河30英里的米特拉山口东侧空降，从而揭开了第二次中东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以色列陆军分三路攻入埃及领土，占领了加沙地带，进攻矛头指向运河区和亚喀巴湾口的沙姆沙伊赫。

第二天，英法两国在紧急磋商后于下午4时15分把最后通牒交给了埃及和以色列驻伦敦大使，要求在12小时之内立即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后撤10英里，否则将进行军事干涉。

像预先盘算的那样，尚未把军队开进运河区的以色列宣布“接受停火”，但埃及对这一通牒予以严词拒绝。本—古里安焦急地等待着英法开始轰炸埃及空军基地，并把军队派进运河区，但《色佛尔协定》从这时起已无法按预定时间表加以执行。

英国首相艾登开始动摇了。11月6日美国即将进行大选，追求连选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保注成立不久的“巴格达条约组织”，避免美阿关系恶化，开始向英、法和以色列施压，要它们立即采取措施以避免事态恶化。英法原定在10月31日清晨开始对埃及的轰炸，现在不得不推迟12个小时。本—古里安在国防部作战室里对艾登破口大骂，他认为自己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受到英国人的愚弄。

10月31日下午5时，从塞浦路斯起飞的英法轰炸机开始袭击埃及的机场。虽然在本—古里安看来，英法的轰炸只不过是一场“豪华”的袭击：英国广播电台的“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已使埃空军将飞机转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但世界舆论的压力已从以色列转到了英法身上。本—古里安下令以军加速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争取在48小时之内占领该半岛全境。

11月5日，以军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亚喀巴湾口的蒂朗岛和萨纳菲尔岛。英法在观望数天后，也终于向运河区投入了自己的地面部队。但也就在这一天，刚刚从“波匈事件”摆脱出来的苏联向英、法和以色列发出了警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在给三国领导人的信中说，苏联“此刻正采取措施以结束这场战争和遏制侵略者”。

在苏联——某种程度上也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退却了，同意停火并从苏伊士运河区撤走自己的军队。在以色列国内狂热地“庆祝胜利”的时候，本—古里安也不得不作出从西奈半岛撤军的决定。佩雷斯心里明白，“老人家”的本意是吞并西奈半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并没有取得胜利。佩雷斯的心有些感到凄凉，这在他写的《从西奈撤军》的诗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地面布满车轮的痕迹，  
但没有道路可循，  
坦克和军车的残骸，  
仍旧遗留在原地，  
清晨朝阳射来，  
看到的只是黑漆漆的一片；在毫无树木的荒野上，  
挺立的只是毁坏了的炮管；只有骑在驼峰上的贝都印人，继续在边界地区游荡：

黄沙中蕴含着苦痛，  
露出一片片岩石，  
就像一杖射出箭，  
正要刺进一个无辜婴儿的身躯；那横亘其中的山脉，  
依旧无法显示自己的躯干，只有小提琴奏出的圣乐，  
能在其中回响自己的音阶；太阳像是倒挂，  
月亮伏在地面，  
地面尘烟四起，  
席卷而来的仍是寒冷的空气；创伤何在？  
为何一语不发？  
我们先人曾经徘徊的土地啊，我们虽然从你这里撤出，  
但你将一直留住在我们心中。

## 第六章 以色列的“原子弹之父”

对佩雷斯来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最大收获是法以关系的加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又开始了新的以色列军火工业的创业进程。

1957年5月27日，佩雷斯和达扬率领一批以色列军界高级官员，再次秘密地登上了法国军方派来的专机。飞机这一次并没有在巴黎降落，而是飞到了马赛附近的伊斯特瑞空军基地。在那里，全体以色列人换乘另一架法军飞机，飞往北非撒哈拉沙漠中的贝沙尔——法军的导弹试验基地。

佩雷斯和达扬在贝沙尔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亲眼观看了法制1000型、1100型和4500型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试验，还考察了法军装备“秃鹫”战斗机的103型空对空导弹。法国空军司令查理将军亲自陪同以色列客人，两个国家军队之间的关系简直密切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但佩雷斯的头脑中却闪出了另外一重意念，回国后他向本—古里安报告说：“在未来两三年中，法国将生产出更先进的制导导弹。但他们不会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建一座生产导弹的工厂。”

生产制导武器，这意味着首先要发展电子工业。“老人家”没有说话，在一旁的达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以前几乎从未对佩雷斯的建议提过不同意见。达扬认为，以色列财政力量有限，目前不应发展电子工业，而应集中力量投入到飞机制造业等部门。佩雷斯没有与达扬争辩，但他似乎觉察到，未来战争的英雄是“电子芯片”。佩雷斯瞒过达扬，在某种程度上也瞒过了本—古里安，秘密下令在以色列飞机公司里建立了一个电子制导工程研究室。若干年后，以色列试制成功“杰里科”地对地导弹、“蜻蜓”空对空导弹和“加布里埃尔”舰对舰导弹后，达扬才不无内疚地向佩雷斯表示祝贺。

然而，飞机、坦克和导弹都不是佩雷斯最关心的东西。自从位于内格夫沙漠中的迪莫纳原子反应堆开始建设后，佩雷斯一直考虑的问题是：现有的原子能反应堆功率太低，以色列必须拥有一座24兆瓦的原子能反应堆。

问题又被提到了内阁特别会议上。如同以往，大多数部长对购进24兆瓦原子能反应堆提出了反对意见。本—古里安再一次以他那毫不妥协的精神否决了多数人的意见，这使佩雷斯的设想成为了可能。

法国内阁这时已进行了改组，布歇—莫努里成为总理。对于佩雷斯提出的要求，布歇—莫努里自然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以前总理居伊·摩勒为首的社会党人必须表示同意，佩雷斯好不容易说服了摩勒，但担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皮诺又通过访法的以色列外长梅厄夫人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

- (1) 以色列要求得到的这种“援助”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 (2) 如果美国发现法国向以色列提供24兆瓦的原子能反应堆，美国在原子能技术方面对法国的帮助就会中止；
- (3) 如果法国在这方面向以色列提供援助，苏联就有可能把核武器引入埃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并不是在帮助以色列，而是帮助俄国人用核武器武装埃及。

佩雷斯后来承认，皮诺的论点是很难直接反驳的。不过他还是找到皮诺，用一段经过深思熟虑的开场白开始了谈话：“可能我们还年轻，但也不是孩子。现在我们可能无意把那个东西（指24兆瓦原子能反应堆——作者注）引入中东，但你能预料到3—4年后中东的局势是什么样子吗？或许到那时，美国人会要求我们引入那个东西，而您，皮诺先生，会出来阻止我们去找美国

人。”佩雷斯表示，“俄国人把那个东西引入埃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假如俄国人真的把那个东西引入埃及，而我们却没有，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是从你们这里买呢，还是去找美国人？”

说到这儿，皮诺打断了佩雷斯的谈话。“这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说，“你的考虑是对的，我没有想到这一面。”他接着问，是否以色列能作出保证，即3—4年后该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行时，还能继续与法国就该问题进行“磋商”。佩雷斯毫不迟疑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皮诺又思考了几分钟，最后说，他已被佩雷斯的“论点所说服”。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当时法国政局不稳，有消息说，布歇—莫努里政府因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处理失当，立即就要垮台。佩雷斯要赶在法国政局变动前签订购买原子能反应堆的合同，否则将功亏一篑。

佩雷斯怀揣皮诺表示“同意”的信件赶到法国总理府，但法国反对党已在议会提出了对布歇—莫努里政府的不信任案，法国总理不得不跑到议会去应付就此问题举行的辩论。不过，布歇—莫努里留下口信，当天下午6时半，他“将抽空从议会回未，与佩雷斯签约”。

当佩雷斯下午按时来到法国总理府时，布歇—莫努里还未能从议会辩论中脱身。佩雷斯等了一小时，觉得再等下去就会前功尽弃，于是硬着头皮赶到法国议会。

趁着议会辩论休息的空儿，佩雷斯总算见到了布歇—莫努里。形势对这位法国总理来说非常不妙，政府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佩雷斯觉得一刻也不能耽误了，直截了当甚至是超乎寻常地向布歇—莫努里建议：签约“可以推迟到明天早上，但条件是，如果本届政府垮台，您在签约时必须把日期提前一天，也就是表明协议是在政府垮台前签订的”。

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小国的使者曾经向一位大国的总理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果布歇—莫努里让警卫人员把佩雷斯赶出去，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事情。然而，布歇—莫努里没有这样做。他怀着一种有些难以捉摸的微笑盯了佩雷斯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说：“明天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

次日，佩雷斯准时来到法国总理府。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布歇—莫努里“整夜未眠，眼里布满血丝，因为昨夜他的政府垮台了。他掏出笔，说道：‘我的社会党朋友（皮诺）已经同意了。’他给能源部长（纪尧姆）写了封信，告之后者法国政府已于前日批准了在以色列建设该项设施（指原子能反应堆）的协议，要求能源部长予以执行。”

佩雷斯在得信后原想立即电告本—古里安，但还是决定先去法国能源部。果然，法国能源部长纪尧姆在看完协议文本后提出，由于协议中有政治性条款，协议应由法外交部及其属下的国际原子能合作机构执行。

佩雷斯又一次返回布歇—莫努里的办公室。这位“看守政府”总理召来皮诺及皮诺的能源事务助理路易·儒西，要求他们立即设法制订一个能“执行法以协议”的方案。儒西与佩雷斯工作了一整夜，次日清晨制定出法国向以色列提供技术援助并提供24兆瓦原子能反应堆所需材料的“技术性协议”。那一天的准确时间是：1957年10月3日。

37年后，美国作家威廉·伯罗斯和罗伯特·温德雷姆在他们所著的《临界质量》一书中指出：以色列在20世纪90年代已不仅拥有200多枚原子弹，还发展了能与超级大国媲美的多层次、一体化的核作战能力。“以色列真正的核武库之父，是西蒙·佩雷斯。”

本—古里安在接到佩雷斯的报告后，真是有些感到心花怒放。在一些知情人心中，法以关系的“天空”也是如此“蔚蓝”。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日益陷入困境，法军又在右翼党派的支持下掀起了骚乱。公众希望能恢复秩序，于是请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当时隐居在科隆贝村的夏尔·戴高乐将军。1958年5月31日，法国组成了以戴高乐为总理的新内阁。六个月以后，法国通过新宪法，建立了实行总统制的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出任总统。

法国政局的变化在以色列引起了不安。过去，由于以法政界交往很深，不论哪个党上台执政，以法关系都未受大的影响。但戴高乐对以色列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在巴黎常来常往的佩雷斯也只见他一回。所以，戴高乐一上台，佩雷斯又被派往巴黎，“摸一摸新政府的脉搏”。

1958年6月29日，佩雷斯向本—古里安呈递了一份预测法以关系发展的备忘录。在会见了部分新政府的成员后，佩雷斯认为，尽管戴高乐想重新确立法国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的地位，但他会继续保持对以色列友好的政策，“这是因为，戴高乐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且对以色列显示出来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活力表示敬仰”。

显然，佩雷斯对法以关系发展的前景估计太乐观了。没过多久，戴高乐宣布法国将从阿尔及利亚“脱身”，佩雷斯立刻觉得情况有些不妙——法国在阿拉伯世界重塑自己的形象，这说明以色列的“价值”降低了。他也迅速联想到24兆瓦原子能反应堆，虽然大部分零部件已运到施工现场，但未来在核燃料供应上，以色列还需依赖某个大国。

24兆瓦原子能反应堆的建设，可以说是在最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早一些时候进口的小型反应堆被建在特拉维夫市南边的索雷克，新闻记者可以去参观，物理系的学生也可以去实习，显然想起到一些掩人耳目的作用。至于小反应堆的“大哥哥”，被安置在内格夫沙漠深处的迪莫纳小镇附近，对外称是建一座“纺织厂”。在其后的几年中，很少有人对为什么要在沙漠深处建一座“纺织厂”产生怀疑，甚至内阁中的许多部长也不知其真实用途何在。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1960年初，一位法国神甫来到位于内格夫沙漠的比尔谢巴市。在市长招待客人的宴会上，神甫小声地问：“事情干得怎样啦？”多喝了几杯的市长在兴奋之中把迪莫纳正在建造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的事情告诉了客人。不幸的是，这位“神甫”是法国情报界的工作人员，此次来以色列专为察看保密工作进行得如何。

当年5月16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沃尔特·埃坦，向他宣布了法国政府的三点决定：（1）现在是将迪莫纳工程公之于众的时候了；（2）迪莫纳的核“工厂”应当受到国际监督；（3）从现在起，法国将不再向以色列提供铀原料。戴高乐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解释这一决定的原因时说：“我们停止向比尔谢巴市附近一家把铀转换成钚的工厂建设提供援助，是因为其有可能在某一天造出原子弹来。”

佩雷斯承认，比尔谢巴市长的泄密所产生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他一面要作出部署，加强保密措施，一面又要再去一趟巴黎，为本—古里安紧急求见戴高乐作准备。

在飞往法国的班机上，佩雷斯想到，他所要前往的巴黎已不再是近几年他熟悉的法国首都了——密室会谈不会再有了，也不会有朋友宁可瞒着自己的政府来帮助他，一切都要按正规方式，打着官腔来办事。

6月8日，佩雷斯在巴黎拜会了法国原子能部部长皮埃尔·威廉。威廉向他解释说，要求公布法以原子能合作一事主要来自与该项目有联系的企业家，他们认为，“由于该项目的规模和派往迪莫纳的法国人人数，要想继续保密、丝毫不加以泄漏是不可能的。这些法国人的合同上都写着他们将被派往‘一个气候炎热的沙漠地区’，要指出具体位置在哪儿，这一点儿也不难。”

通过与法国原子能部长的谈话，佩雷斯心里有了与法国外长德姆维尔会谈的底。不过，他这时在法国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法军总参谋长勒沃将军提醒说，法以关系变冷的源头就是德姆维尔。他劝佩雷斯“不要与德姆维尔谈具体问题。没有他，我们干得很好，将来也会干得很好”。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绕过德姆维尔，吃亏的只能是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6月8日下午就前往法国外交部拜会德姆维尔。

会谈围绕着四个问题进行，首先碰到的就是公开迪莫纳原子能反应堆的事。佩雷斯告诉主人，以色列原则上同意公开这方面的情况，但要求采取一种全面宣布法以科技合作的方式，原子能反应堆只是众多合作项目中的一个，在文件中只占一小段。另外，佩雷斯表示，在消息公布后，以色列将开放迪莫纳反应堆，“甚至连苏联大使都可以去参观”。

说到这里，佩雷斯看到那位不苟言笑的法国外长稍稍抬起了眼皮。他抓住这个自认为是转机的时刻告诉德姆维尔，在公布了法以科技合作项目后，以色列将适度“弱化”法国所起的作用，以免给法国“带来麻烦”。

德姆维尔插话了，法国人特有的骄傲驱使他不能不说：“……任何贬低法国科技成就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向公众说明迪莫纳原子能反应堆的用途，对此佩雷斯早已胸有成竹。他告诉法国外长，由于印度、瑞典、联邦德国和加拿大当时都已建成了24兆瓦原子能反应堆，以色列“完全可以不加修饰地告诉世人”，它的原子能反应堆“将纯粹用于和平目的”。

问题转到了第三个——国际监督，对此，佩雷斯坚决予以反对。他说，由于没有适用的机制，国际监督意味着“向俄国人敞开了大门”。这时，佩雷斯看到德姆维尔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相信这一点已经说通了。

最后说到了铀燃料的供应。佩雷斯提醒法国外长说，根据两国间的协议，以色列在核废料的处理方面有与法国“磋商”的义务，因此法方大可不必为此担心。

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儿。德姆维尔在结束时告诉佩雷斯，他要与自己的同事商量一下，6月13日将给予最后的答复。佩雷斯心里清楚，这个时间仅仅比本—古里安到达巴黎的时间早几个小时。

从总的方面说，佩雷斯是乐观的。他觉得自己即使没有完全说服德姆维尔，也在大多数方面满足了法方的要求。或许正是因此，6月13日他看到德姆维尔不苟言笑地向他走来时，心中不免有些吃惊。德姆维尔告诉佩雷斯，在宣布法以原子能合作情况问题上不能采取任何可能被人认为是阴谋的变通办法，否则将影响法国的声誉。尽管佩雷斯反复辩解，德姆维尔还是拒绝了以方的任何建议。

本—古里安在巴黎拜访戴高乐为法以解决核问题带来了一些新气氛。虽然双方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戴高乐许诺说，法国将重新考虑它在这方面的政策，他还建议皮埃尔·威廉与佩雷斯在这方面继续保持接触，本—古里安对这一切都感到颇为满意。

然而,政策的重新评估并未带来以色列所期望的结果。1960年8月1日,德姆维尔再次召见埃坦大使,通知以方,如果耶路撒冷方面坚持反对国际监督与公布事实,法国将停止援建以色列反应堆的项目。法国外长补充说,巴黎愿意补偿以色列在这方面的损失,埃坦据此判断,这回法国是“动真的”了。

摆在佩雷斯面前的问题是: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以色列政界要人都坚决反对国际监督,法国停止对以色列核项目的援助已不可避免,但正在建设之中的原子能反应堆工程不能停下来,法国还必须提供以方所需的信息资料。为此,佩雷斯于11月初又一次前往巴黎。

在与德姆维尔和威廉的谈判中,佩雷斯告诉他的法国对手,以色列现在已不反对公布原子能反应堆的情况了。但是,以色列反对由法以以来共同公布这一情况。佩雷斯的道理是: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法以之间的合作项目,由于法国拥有先进的原子能技术,世人会怀疑法国在这方面支援了以色列。佩雷斯提议由以色列单边宣布一个“开发内格夫沙漠的五年计划”,其内容包括扩建比尔谢巴大学,改造沙荒地,当然也包括建设一个原子能反应堆。计划中指明法语是比尔谢巴大学所教授的“第一外国语”,这样,法国技术人员到那里去就不会有太多的猜疑。如果有人问以色列的原子能反应堆技术是谁提供的,以方可以以避免阿拉伯国家对该国实行制裁为借口而加以保密。佩雷斯认为,照这种办法做,如果国际上有人提出问题,只会去找以色列,而不会给法国造成什么压力。

德姆维尔过去曾说过,他绝不同以色列达成任何“密谋”。但是听了佩雷斯的说法,他明确表示赞同。至于国际监督问题,佩雷斯说,法国应当继续提供技术支持,以使以色列完成它的原子能反应堆工程。但法国可以不执行原协议中向以色列提供核燃料的义务,这样既可使法国对从核废料中提取何种物质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使以色列免除了须受国际监督的义务。德姆维尔再次同意了佩雷斯的建议,但他心里明白,科学家1948年就在内格夫沙漠中找到了铀矿物质,核燃料对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不等法国和以色列在原子能反应堆问题上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60年12月18日突然刊载了记者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官员估计“以色列将在五年内制造出第一枚原子弹”。

无论这篇报道对问题的判断有多模糊,它对世界舆论所起的作用是“爆炸性”的。法国外交部沉不住气了,通过发言人告诉记者,法国正在帮助以色列建造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但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

情况的紧迫也使佩雷斯立即向属下下达了“表态口径”:

(1) 索雷克的原子能反应堆规模很小,而迪莫纳反应堆也仅仅是出于科研目的而建的;

(2) 迪莫纳反应堆只是开发内格夫沙漠大规模建设中的一个项目;

(3) 建设迪莫纳反应堆的决定是以色列自主作出的,外国的帮助在工程建设上不占主要地位;

(4) 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原子能反应堆目前被置于国际监督之下,所以对以色列正在建造的原子能反应堆实行国际监督的建议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在佩雷斯的具体策划下,以色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公布了它正在建造原子能反应堆的事实:先由本—古里安在议会宣布一个简短的声明,强调反应



堆的目的完全是用于和平研究工作，然后再由一名被事先指定的议员发问：“有报道说以色列正在制造原子弹，此报道是否属实？”本一古里安面无表情地回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报道纯系谣言！”坐在议会旁听席上的佩雷斯在听完“老人家”的回答后起身离开会议厅，他最清楚什么是有意，什么是无意……

如果说佩雷斯使以色列在 1960 年的法以原子能反应堆争执中勉强过关的话，那么同一年他还终于做成了与法国的最后一桩“大买卖”。

1960 年 2 月，佩雷斯赴法催促法方交付以色列定购的最后六架超级神秘式战斗机，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但佩雷斯并没有因此而停步不前，他要求法国军界向以色列提供最新型的法制战斗机——“幻影”，法军方表示为难，说此事必须先经外长德姆维尔批准，佩雷斯因此前往法国外交部。

从侧翼入手，引诱对方进入自己的轨道，历来是佩雷斯的拿手好戏。谈话一开始，佩雷斯就问法国外长，他对继续援助以色列持何态度。

德姆维尔很谨慎，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他只能重申戴高乐定下的腔调：“对西方世界来说，以色列的地位很重要。法国当然是西方世界的一员，所以也要尽自己的责任。”

“部长先生不反对公开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将像以往一样继续支持以色列吧？”佩雷斯接着问。

德姆维尔依旧小心翼翼，他反问：“你想公开什么？是买幻影飞机的事吗？”显然，他对佩雷斯的来意非常明白。

“不，”佩雷斯回答说，“我只想请您公开这样一个事实，即法以友好关系将继续发展下去。我认为，公开这样一个事实将有助于遏制阿拉伯人，并将使我们的人民感到放心。”

德姆维尔，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跟随戴高乐将军的“老兵”，看了看眼前这个战后成长起来的“犹太政治家”，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从你们的观点看，你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干事情要考虑北非穆斯林国家的反应。倘若我们照你的想法去做，必然在北非产生对法国不利的影 响。”

佩雷斯暗暗佩服这位戴高乐的“老兵”对问题的全面看法，但他装得似乎有些糊涂，忙问：“哦，原来是遇到了左右为难的事。不过，部长先生，我想请教您，政治家在遇到左右为难的事时应该怎么办呢？”

年轻人的“谦恭”使得德姆维尔颇为得意，他回答说：“在政治生活中，若是遇到左右为难的事，就用两种声音说话。”

“两种声音”，这当然不是说有喜有怒，而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政治“厚黑学”的第一要领。佩雷斯当然深谙此道，他赶忙跟着说：“好，我们就走这条路！”

资深政治家是不能否定自己的。话既然说出来，德姆维尔就不能拒绝幻影飞机的交易。3 月份，三家法国飞机制造公司的代表来到以色列国防部，当着佩雷斯的面与以方代表签订了出售幻影飞机的合同。

出售幻影飞机是法以之间“最后一桩”军火“大买卖”。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桀骜不驯的戴高乐将军没有听从美国的指挥，下令对以色列实行军火禁运。但到这时，以色列已全面掌握了幻影战斗机的性能和制造技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在幻影飞机的基础上生产出后来作为以色列空军主战飞机的幼狮战斗机。法国不再支援以色列，而以色列也不再需要法国……

## 第七章 军火商

如果是一个不了解佩雷斯的犹太人，当他看到法以关系在 60 年代初“降温”的情景，可能会对佩雷斯说：“你要使军火来源多元化呀！”

虽然是这个道理，但谈话的对象错了。佩雷斯从打担负武器采购任务的那一天就说过，以色列安全的“鸡蛋”不能只装在一个篮子里。

1952 年，以色列与联邦德国签订了《赔偿协定》，联邦德国保证在 12 年内向以色列提供 7.15 亿美元，用以赔偿在大屠杀中被德国纳粹分子杀害的 600 万犹太人。

《赔偿协定》的消息在以色列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党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在议会外的广场上对群众说：“……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今天，犹太国的总理说他要到德国去收钱，他将为钱而出卖犹太民族的荣誉，在历史上留下永久的耻辱……”

像 50 年代中国人看见太阳旗而愤恨一样，以色列的犹太群众被激怒了。他们冲破警察设置的路障，向议会大厦投掷石块，整个国家都动荡起来……

的确，人的生与死都不应为了钱。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说，纳粹不仅抢走了他们的钱，还把他们赶进集中营，最终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和焚化炉……

数年后，佩雷斯访问慕尼黑时在日记中写道：“客观上说，德国人一点儿也鼓不起我的激情。主观上说，我处处在心理上存有保留，生怕哪个德国人过来和我打交道。同德国人打交道，我心里总有一种犯罪感。在德国，孤立的气氛环绕着我们，这使人感到屈辱。但同时，作为人，我们又觉得德国人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难道一群曾经播撒恶魔种子的国民不会发生变化吗？难道德国人只能制造仇恨，压迫和刽子手吗？或许他们会忏悔，但忏悔是真诚、坚定和永久的吗？”

据佩雷斯说，如果可以作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把德国人甩在一边。但是，为了使大屠杀不再发生，“以色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事情”。为了安全，需要钱，以色列因此也就别无选择。佩雷斯说：“我们可以诅咒德国人，但诅咒不能创造出装甲师团来。”这样的话，就如同本—古里安在议会驳斥贝京时所说的一样。

1957 年，佩雷斯向本—古里安提交一份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报告——像同法国人交往那样，先与该国的国防部联系，报告立刻得到批准。当年 7 月 3 日，佩雷斯在波恩第一次见到了当时担任联邦德国国防部长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按照佩雷斯的描述，施特劳斯“有着山一样的身躯，体重 100 公斤以上，蓝色的眼中透出不知疲倦的精神，喜好大吃大喝，尤善唇枪舌剑的辩论”。两人一见如故，在随后的四个月中见了六次面。双方就德向以提供潜艇、导弹和飞机达成了协议，这种秘而不宣的合作后来又继续扩大。一次，佩雷斯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的会议上讲：“如果说美国人给我们钱但不给武器的话，法国人给我们武器是要收我们的钱的，而德国人给我们武器，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我们保住秘密。如果话被漏了出去，就没有机会得这份便宜了……”

经佩雷斯的“操作”，德以关系还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50 年代末的一天，佩雷斯把一位名叫莫伊的 32 岁的肯尼亚人带到施特劳斯在波恩的家中。莫伊是肯雅塔领导下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领导成员之一，当时正在以

色列军事学院受训。莫伊告诉施特劳斯，非洲民族联盟当时不仅要与英国统治者进行斗争，还要与“莫斯科支持的集团进行争夺”，他要求德国给予支持。经过佩雷斯与施特劳斯的协商，三人达成君子协议，以色列将承担训练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军队的任务，而全部装备则由德国提供。

佩雷斯和施特劳斯对肯尼亚的“投资”，后来都得到了回报。莫伊后来成为肯尼亚的总统，这使得1976年以色列突击队从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时能使用肯尼亚作为中转站。至于联邦德国，收获一点儿也不比以色列差。施特劳斯曾请佩雷斯帮助德国“打入”东部非洲。在带来莫伊后，佩雷斯又先后带来了苏丹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可以说，德国给以色列武器而不要钱，其实钱并没有白花。

法国卖给以色列的武器，联邦德国赠送的武器，加在一起，比起1963年以后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军火，真可谓九牛一毛。

1961年，年轻的约翰·肯尼迪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这似乎给多年来驻足不前的美以关系刮来了一股新风。5月份，本—古里安在访问加拿大后有意到美国进行一次“非正式”访问。肯尼迪私下告诉本—古里安，他在大选中取胜得益于许多美籍犹太人投他的票，所以他必须为以色列做一些事“以示感谢”。

本—古里安抓住时机，要求美国提供隼式防空导弹。肯尼迪犹豫了。一年后，他通知本—古里安，隼式导弹是可以提供的，但前提是要接受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难民方案：让流寓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自主决定是返回家园还是入籍现居住国。本—古里安认为肯尼迪的条件“太苛刻”，于是放弃了引进隼式导弹的计划。

本—古里安对美国的访问还暴露了两国在迪莫纳核反应堆问题上的分歧。出访前，外交部长梅厄夫人曾要求本—古里安向美国透露一些有关以色列核计划的真实目的，从而取得肯尼迪政府的信任以争得更多的援助。但佩雷斯却顶撞说，此举毫无必要。“老人家”自然是接受了佩雷斯的建议，这使原先梅佩二人已颇为紧张的个人关系又有了一点雪上加霜的味道。

1963年1月，肯尼迪再次提出向以色列输出隼式导弹的问题。这一次，他提出要以方接收10%的巴勒斯坦难民返乡定居，并且还提到要以向美开放迪莫纳反应堆的问题。

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美国收回了要以接收10%巴勒斯坦难民的先决条件。这样，引进隼式导弹问题就只与允许美核查迪莫纳反应堆一事相联系，这又引起佩雷斯和梅厄在本—古里安面前的一番争吵。

梅厄夫人在肯尼迪还担任参议员时就与其相识，所以认为肯尼迪入主白宫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佩雷斯提出如果不能无条件从美国搞到防空导弹，以色列可从欧洲想办法时，她怒气冲天地反驳说：“这是让时钟倒转数年！”本—古里安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来斡旋：“我们不是还在和美国人谈判吗？……”他决定派人去华盛顿，但被派遣人不是梅厄，而是佩雷斯。

在美国首都，佩雷斯又使出了惯用的迂回战术。在国会山，有影响的参议员司图尔特·赛明顿告诉他：“继续干你们的核反应堆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别听我们的政府说三道四。”佩雷斯又结识了肯尼迪的助手麦乔治·邦迪和迈克·费尔德曼，在后者的帮助下走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佩雷斯后来回忆说：“从某种角度上说，肯尼迪要比照片上的他潇洒得

多，但也有不及照片上的地方。令我吃惊的是，他的脸要比照片上的小，前额狭窄，黑发中夹杂着不少白发，灰色的大眼透出疲惫的样子，微笑中含有一丝揶揄他人的神态。他确实很具悟性，可以迅速抓到问题的实质。通过阅读报纸，他了解世界各地刚刚发生的事情。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但谈起话来总装得漫不经心。”

肯尼迪是用间接方式提出以色列核反应堆问题的：“中东地区已经引进了哪些类型的导弹？”

佩雷斯回答说：“埃及已引进了四种。最近他们还引进了装备在鱼雷艇上的导弹。”

“什么？他们有了科马尔型导弹？有多少枚？”

“到目前为止有四具装备。”

“那种导弹的有效射程是 16 英里，对吧？”

佩雷斯回答说：“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射程 30 公里，弹头重 750 公斤。另外，埃及人已有了空对空导弹，他们还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地对空导弹。除此之外，地对地导弹也出现了。”

“这些导弹都是俄国人给的吗？”

“我们没有证据说这些导弹都是俄国人给的，但知道德国人正在帮助他们造导弹。”

肯尼迪问：“是西德人吗？”

佩雷斯答：“不是西德政府，而是西德的一些科技人员。所造的导弹迄今为止还不太准确，但射程可达 500 公里。”

“已经造了多少枚了？什么时候装备部队？”

“大约 30 枚，18 个月内将装备部队。”

肯尼迪听罢点点头，开始把话题转到以色列一边：“除非是装上了非常规的弹头，否则导弹只不过是一颗火箭。你不认为弹头比导弹更具危险性吗？”

佩雷斯觉得美国总统话中有话：如果以色列不发展核武器，干嘛对埃及的火箭那么上心呢？他稍稍想了想，回答说：“在我看来，即使是携带常规弹头的火箭也与飞机掷下的炸弹不同。由于火箭是无人驾驶的，它会使人感到恐慌，并使占有者忘乎所以。况且，没有有效的办法去拦截它……”

没等佩雷斯落下话音，肯尼迪紧接着说：“此话没错，但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是极端危险的。”

佩雷斯旁顾左右，回答说：“导弹已经出现了，但核弹头毕竟还未在中东露头……”

肯尼迪盘算照这样谈下去永远也不会进入正题，于是把话挑了个明白：“我们对中东地区潜在核力量的发展一贯给予密切的注视，因为它将造成一种很危险的局面。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们在核领域里的努力。你能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吗？”

不知道佩雷斯是否预先有准备，但他的下述回答却成了后来以色列官方的表态口径，他说：“我可以清楚地向您表明，我们将不会把核武器引入中东。以色列不会、也无意在现在或将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恰恰相反，我们对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直至彻底裁军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肯尼迪对这番回答是否感到满意，此事无人知晓。人们可以猜测他仍抱有怀疑的心态，但他毕竟没有再直接追问下去。他换了一种口气，问道：“你

们准备如何应付现存的导弹和其他兵器问题呢？”

佩雷斯松了一口气，话也讲得长了一些：“在我看来，外交优于军事装备。我不相信您能说服苏联人不向中东提供武器，也不相信埃及人会放弃引进武器。如果问题是由我们造成的，我们将彻底地放弃引进武器的计划。不过您应当知道，以色列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迫切需要发展，也要搞好教育工作。我们国家还存在着社会融合问题。这些自然形成了要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贮藏武器的压力。所以，当我们说外交是最好的途径时，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崇尚它，而且也是形势迫使我们这样做。”

外交界允许所答非所问，但佩雷斯这样不着边际的侃侃而谈确实让谁也摸不着头脑。肯尼迪感到有些困惑，忙问：“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在向我们提供维持和平的手段的同时，再发表一个声明。”“维持和平的手段”显然是指隼式导弹，这一点肯尼迪是明白的。卖给武器还要发表一个声明，说明美国是在以色列受到埃及威胁情况下才以出售武器方式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证的？肯尼迪不免还要问下去：“我请你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想到，假如我们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我们也应对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等认为受到埃及威胁的国家提供保障呢？我们那样做，会不会让世人把我们看作是包揽世界辞讼的大法官呢？”

“以埃冲突与埃及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有所不同，”佩雷斯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这种冲突并非说爆发就会爆发。只要美国对事不对人，也就是说，只反对那些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美国的声誉就不会受到损害。”

不知道肯尼迪对这种以“美国声誉”来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建议作何感受，他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关于发表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的单边声明，我想，你是否也认为我们还应发表一个向埃及提供安全保障的声明呢？”

“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我当然要为以色列说话。”佩雷斯似乎显得有些窘迫，忙回答，“我的话没有恶意，但我不相信您能像同我们那样轻易地与纳赛尔达成任何协议。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要在战争爆发后做某些有限的干预，而是要防止战争的爆发。坦白地说，问题不在于向纳赛尔说什么，而是要让阿拉伯人明白一种新的现实。”

肯尼迪显然明白佩雷斯所说“新的现实”是指什么。50年代，为了把阿拉伯国家拉入反对苏联的阵营，美国不得不疏远以色列。但自从伊拉克君主在1958年被推翻、埃及也越来越靠近苏联东欧集团后，美国自然也在重新寻找其中东政策的重心。依靠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形成某种威慑，使它们不敢过于靠近苏联，这就是佩雷斯所说的“新现实”，也是肯尼迪在思考的问题。

肯尼迪把谈话引入细节，提到了被认为是亲西方的约旦：“倘若约旦发生动乱，侯赛因国王被推翻，你们打算怎么办？”

“至少会有三种可能的情况，”佩雷斯回答说，“一、埃及派兵入侵约旦；二、出现武装暴乱者，他们请埃及派兵；三、纯粹是63由当地人发动的暴乱。在前两种情况下，我们将不会闲呆着，而且还会与美国政府进行磋商。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以色列将很难一下子就采取行动。不过，那时或许会出现第四种情形，而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情势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肯尼迪会心地笑了。从佩雷斯的谈话中，他看到了美国把以色列作为其

中东政策重心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在肯尼迪的指示下，佩雷斯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的谈判进行得出人预料地顺利。美国方面最后只要求享受参观迪莫纳反应堆而不是以色列全部核设施的权利，并在此条件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五套隼式防空导弹系统，突破了以往不向以色列提供尖端武器的传统。美以关系的密切发展自肯尼迪当政时期始，而佩雷斯与这位美国总统的谈话起了虽未引人瞩目，但却相当关键的作用。

佩雷斯赴美使命的成功自然再次受到本—古里安的褒扬，但在同时也加强了他本人长期以来的信念——只有友好的外国政府，而没有友好的国家，一旦政府发生变动，该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很可能要出现调整。所以，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必须进一步实现以军装备的全面国产化。

60年代初期的一天，佩雷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被他称为“激动人心的”一页：“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经过多年努力，寄与希望并克服巨大困难而得来的庆功仪式。下午4时30分，我陪本—古里安来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和4000余人聚集在一起，参观以色列制造的第一架教练机。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为这架小巧美丽的飞机命名的问题。由于潜艇常以鱼类命名，而飞机常冠以鸟名，我最后决定定名这架飞机为‘燕子’，这是因为《塔木德》有言：‘燕子也可以斗过鹰。’组装这架喷气式飞机的零部件50%以上都是以色列产的，而且质量也是第一流的。‘老人家’十分激动，致辞中第一句就说：‘如果我是一个教徒，我就要开着这架飞机去天堂。’总设计师施韦默也很激动，他用带着浓重美国腔的希伯来语对我说：‘你是我们航空工业的支柱。’”

激动之时，浮想联翩，佩雷斯想到当年为试制这架飞机而遭遇的坎坷，心中不免感到一阵酸楚。想当年刚提出自己试制飞机时，财政部门大叫无钱，外交部门说会恶化国际环境，甚至军队也表示反对。

当时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的哈伊姆·拉斯科夫曾致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军火工业的重点应放在生产反坦克炮、火箭弹、喷火器等武器的配件上。至于研制国产飞机，拉斯科夫认为：“即使经济上可行，所产飞机的数量也不足以满足空军的需要，还是只干点民用航空产品算了。”

佩雷斯当然不能接受拉斯科夫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产品应涵盖全部的空气动力产品，从飞机一直到导弹。

燕子号飞机升上天空前四个月，佩雷斯在日记中记下了以色列试制导弹的情况：“我乘飞机来到内格夫，观看G—25型导弹的试射情况。这种导弹射程为30公里，可在军舰、飞机和车辆上实施发射。一共试射了三枚导弹，第一枚发射后不久就落地爆炸，原因不详。另两枚导弹像是神奇的造物，飞行了16公里，击中了远处山坡上的预定目标。试射总体上是成功的，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的两名试射人员虽然有些兴奋，但还是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操作。”

“导弹击中目标为四年来的工作画上了一个成功的句号。它不仅给予以色列国防军一种新式武器，还把这支军队带入复杂精巧的导弹世界。许多国家曾为研制自己的导弹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但进展却极为有限。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钱，但凭着工程师和工人的忠诚与天才，却得到了买也买不来的东西。今天，对于以色列科学家、军队和企业来说，都是上天赐福的日子。”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是由贝戴克飞机制造厂发展起来的，但其后来发展速度之快连佩雷斯也没有预见到。自制造燕子教练机成功后，它又成功地试制了阿拉瓦短程起降运输机和西风公务机。前者在发展中国家颇受欢迎，而后者则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导弹研制工作进展更快，除了种类齐备外，舰载加布里埃尔反舰导弹尤受国际军工界的称道。除此之外，以高精尖电子器件、雷达和计算机为主体构成的电子战设备也迅速发展，使得以军在“第四维战场”上具有了巨大的优势。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王冠上的宝石”是幼狮战斗机，尽管它是根据法国幻影战斗机为原型设计的，但造价低、性能优越，一出现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一度作为以色列空军主战飞机的幼狮战斗机是1975年4月14日第一次试飞的。那一天，佩雷斯作为重要贵宾坐在主席台上，身边是多年的老朋友施韦默。两人回忆起当年在加利福尼亚伯班克小镇上与本—古里安的谈话，回忆起当年作出的“制造喷气式飞机”的誓言，泪水不自觉地从两双眼睛中涌出来……

佩雷斯不仅是以色列最大的军火采购商、制造商，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军火销售商。自然，出售武器被冠以一个不太起眼儿的名称——开发国外市场……

1958年3月的一天，以色列飞行员列奥·加德纳驾驶着DC—4型运输机由东往西飞行在地中海上空。在西地中海上空，四台引擎中的一台停机，不久又出现漏油现象，这使加德纳决定紧急着陆。通过与当时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当局联系，飞机降落在距阿尔及尔市400公里的小城波尼。

在机场，法国安全官员问加德纳：“你们运的是什么？”加德纳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军火，运往南美去的，你们在巴黎的头儿知道这件事。”法国安全官员迅速与巴黎取得联系，回答却说对此事毫无所知。机场官员怀疑武器是运给当时反对法国殖民占领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所以立即扣住了机组人员。

在审讯中，加德纳依然抱着无所谓劲儿，将自己历来的所作所为一股脑儿告诉了法国人：“1947年，我从事把美国飞机偷开到以色列的行当。1948年，我负责从捷克斯洛伐克空运军火去以色列，并在战争期间驾机轰炸开罗。1953年，我负责开通以色列到意大利的航线。1956年，我从法国运军火到以色列。”加德纳说得越多，法国人越感怀疑，最后竟将此事捅给了报界。巴黎报馆的编辑使出拼剪的看家本领，把此事说得玄而又玄，结果搞得法国政府内部出现争吵，以色列负责此事的佩雷斯不得不出来加以澄清。

佩雷斯告诉记者们：“如果你坐在飞往以色列班机的驾驶舱内，你就会发现，越是快到达目的地，敌国雷达的电波就越多地出现在电子荧屏上。所以，为了避免出现危险，我们把飞往南美的航路选在靠近北非的上空。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出现，我们还必须与一个重要的法国政府官员保持联系，告诉他何时我们将有飞机飞往南美。这位官员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而且分文不取。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忘了将此事通知有关方面，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误会。”

佩雷斯没有说出这位法国官员的名字，但后来的材料说明，他是当时担任法国总理布歇—莫努里顾问的路易·马吉尼。自然，马吉尼在问题发生后采取了多方努力，终于使机组人员先被释放，尔后又交还了飞机和所运的物资。

佩雷斯如此公开地将情况透露给报界，真正的目的是掩盖军火的去向。他提到了南美洲，但却没有指出是哪个或哪几个国家。后来人们才知道，军火是运往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的。

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家族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是当时南美洲最腐败和凶残的独裁统治者，但佩雷斯却认为有义务向他们提供军火。这是因为，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是 1948 年独立战争期间少数几个曾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国家中的两个，佩雷斯觉得应当给予回报。当然，金钱的诱惑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如果此次飞机能抵达目的地，以色列将净得 122 万美元，这对财政拮据的以色列国防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字。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以色列与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的军火交易自然也在南美一些国家引起愤慨。早在 1957 年，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沃尔特·埃坦就致函佩雷斯：“由于（尼加拉瓜）在外交政策和国内体制上的问题，拉美国家都对其嗤之以鼻。你没有与外交部磋商就与这个国家进行军火交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与我都知道，我们在联合国对由 20 个国家组成的拉美集团有很大的依赖性，我们不能不考虑它们的情感因素。所以我在这里要求你立即发出指示：必须停止与尼加拉瓜的新交易，所有尚未启运的货物立即封存。”

照常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向国防部副部长发出这种措辞强硬的函件确实与名份不符。但面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老卫士”，佩雷斯还是作出了答复，只不过是在四个月后才写出了回函：“近来，一些南美国家对我们这里购入武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然，我们对这类交易也颇感兴趣。然而，鉴于以往我们与尼加拉瓜交往的经历，我们将在这方面与外交部密切进行协调。”埃坦在收到信件后毫不客气，立即寄给佩雷斯一份武器禁运国名单，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明确地被列入禁运的范围之内。

“波尼事件”被披露后，佩雷斯陷于窘境，后来被迫承认这批军火是运往多米尼加的。但他还是进行了辩解，说这批武器属“剩余物资”，近 150 万美元，放在仓库里实在可惜，“国防部的任务之一就是卖旧武器以换取新装备”。

外交部长梅厄夫人把状告到了本—古里安那里，这迫使佩雷斯不得不当着这而人的面把问题“说清楚”。佩雷斯承认，多米尼加索要的军火包括护卫舰、乌兹冲锋枪和反坦克火箭，这些东西以色列都有能力提供。他保证说，为了以色列对外政策的需要，现在决定不卖了。“老人家”一贯护着佩雷斯，既然作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要求梅厄夫人别再追究往事了。

佩雷斯后来还是向多米尼加出售了反坦克火箭。在他看来，护卫舰和乌兹冲锋枪容易被人查出原产地，但反坦克火箭是仿制品，打上别国的标记就“万事大吉”了。他的逻辑是：“不卖武器给某一国，这不是对这个国家实行禁运，而是对我们自己实行禁运。在可从他国取得同等装备的情况下，禁运毫无意义。”



## 第八章 党的分裂

在梅厄夫人和她的前任夏里特身上看不到什么相同之处。夏里特恬静、爱沉思且很注重外表修饰，梅厄夫人却对人对事苛求、说话直来直去而且不修边幅。不过，两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西蒙·佩雷斯都恨得刻骨铭心。本—古里安越是对佩雷斯加以偏袒，夏里特与梅厄夫人的共同之处就愈发明显。

梅厄与佩雷斯的矛盾自打这位女士出任外交部长时就产生了。梅厄夫人虽然以前当过驻苏联公使，但后来长期担任劳工部长，与外交事务的日常接触有限，同各国领导人的联系也不多。一俟她走马上任外交部长，就发现年仅33岁的佩雷斯已在外交渠道之外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联络网。用佩雷斯的话说，“外交与防务密不可分”，言外之意是他插手对外事务有理。特别是，佩雷斯的活动总是得到本—古里安的庇护，这更使梅厄夫人极度恼火。

1957年7月，梅厄前往巴黎会见欧洲一体化的领导人让·莫内，本意是希望后者能施加影响，让以色列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系国”。谁知话刚刚开头，让·莫内就告诉这位女外长，同样的要求已于四个月前由她的同胞佩雷斯提出过，此事目前正在讨论之中。梅厄夫人没有继续谈下去。当天晚上，她取消了原定的日程，搭飞机回国了。

本—古里安在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梅厄夫人气势汹汹前来“评理”的场景，并且还写道：“我告诉果尔达·梅厄，她怀疑国防部插手外交事务虽并非毫无道理，但我对此深感忧虑和痛心。梅厄说她并不抱怨总参谋长，但对佩雷斯背着她干事深感失望。我对她说，失望或把失望放在一边儿都是不对的，应当进行一场同志式的讨论来解决问题。她点头答应了。”

梅厄与佩雷斯的讨论化解了一些矛盾，但并未持续很久。过了一段时间，佩雷斯又要赴法国采购武器，梅厄要求他向以驻法大使报告行程，而且还要允许大使参与有关活动。佩雷斯当然不能接受这一要求。结果两人又吵到了本—古里安的办公室。在听完双方申诉的理由后，“老人家”作出了一个妥协决定：报告行程，应当；参与活动，不行。梅厄感到，这与其说是妥协，还不如说是完完全全的袒护。

说到底，梅厄与佩雷斯的争斗代表了一场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老卫士”与“青年帮”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卫士”的领导权受到挑战。“青年帮”虽然羽翼未满，但得到“老人家”的支持，显得格外咄咄逼人。

本—古里安把西奈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两个人：成功地实施作战指挥的达扬和为部队提供优良装备的佩雷斯。西奈战争后，他已决心提拔一批青年人，除达扬和佩雷斯外，还有尼赫迈亚·阿尔戈夫、泰迪·科拉克、伊扎克·纳冯和哈伊姆·以色列。另外，比这个年龄段稍长一些的阿巴·埃班、乔拉·约瑟夫塔、伊加尔·亚丁、耶胡达·阿夫里尔和沙洛姆·希勒尔也在提拔之列。

本—古里安已考虑到“老卫士”们不会轻易地同意他的主张，他曾对约瑟夫塔说：“党内会出现反对势力，但我们必须顶住。”不过，他还是低估了曾在他麾下征战过的那些“老卫士”。梅厄、艾什科尔、萨皮尔和拉冯不仅没有丝毫引退的意向，而且已做好准备和“青年帮”较量一场。

1958年11月，距新的大选没有多长时间了，本—古里安准备把埃班、亚丁、达扬和佩雷斯纳入党的领导集团，从而为他们进入议会铺平道路。“老卫士”开始闹事了，攻击的矛头首指佩雷斯。“老卫士”核心之一沙盖·内

兹尔对本—古里安说，佩雷斯不能进党的领导班子，因为那样的话，当时担任总工会书记的拉冯就会退出。“老人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听到拉冯不来，我很遗憾，但不能排除佩雷斯，因为在国防部里他贡献最大。”

不过，本—古里安还是把两部分人召到了一块儿，想用他惯常使用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把两伙人捏在一起。他对“老卫士”们说，他并非想以牺牲他们利益的办法来提拔年轻人；他们可以留下，但年轻人必须进来。“巴勒斯坦工人党只有年轻化才可履行未来赋予的使命。纵观历史，年轻人往往可以做成大事。年轻并不值得骄傲，但也不应受到处罚。如果证明哪个年轻人有领导才干，年轻自然也就成为优势。”

本—古里安的这一席话并没使“老卫士”们平息下来。拉冯公开指责这次会议是达扬和佩雷斯的“加冕仪式”，这下可惹火了刚刚从总参谋长位子上退下来的达扬和佩雷斯。一只眼睛上蒙着黑眼罩的达扬仗着自己是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将军，逐一地把“老卫士”们数落了一通。佩雷斯没有达扬那种“资本”，所以先从戴高乐“今天我67岁了”那句名言开始，说“67岁不应是点燃青春之火的年代，而是从公共生活中退休的岁数”。本—古里安在一旁频频点头，他自己整治不了的“老卫士”，没想到竟让两个年轻人给治了。

在1959年的大选中，由于本—古里安把达扬和佩雷斯排进了党的竞选名单，两人双双当选国会议员。“老人家”在组阁时任命达扬为农业部长，佩雷斯仍为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仍由本—古里安本人兼任。

新内阁宣誓后，佩雷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与达扬一起喝茶。他问我，是否感到有值得庆幸的地方？没等我回答，他说，他这次进了国会和政府，但却没有感到任何一点儿值得欢喜和有意义的地方。我告诉他，我对此也有同感。”

的确，只要本—古里安还处在以色列国家权力的中心位置上，不论他是在台前还是台后，佩雷斯都有取得政治成就的保证。然而，如果这个处于中心的光环黯然失色了，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963年6月，本—古里安在访美归国后又一次宣布辞去在政府内担任的职务。尽管来自各地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党员反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改初衷。他告诉当时担任工商部长的多弗·尤塞夫，他“感到负担太重，难以承受。同时，又找到两位完全可以信赖的接班人：艾什科尔和佩雷斯”。就这样，在本—古里安的推荐下，艾什科尔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佩雷斯留任国防部副部长。

艾什科尔以往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和善但优柔寡断的人物。不过，在看了多年那种刚毅、不苟言笑的领导者面孔后，艾什科尔初任总理却颇得好评。虽然是“老卫士”的一员，但本—古里安的光环仍在闪烁，艾什科尔对佩雷斯也算过得去，像“老人家”在任时一样，对国防部的事情很少加以干预。1964年5月艾什科尔应邀访美时，特地在名单上加上了佩雷斯的名字。这至少是告诉“老人家”，他的执政之道依然是“一碗水端平”，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

然而，此时此刻的巴勒斯坦工人党中央已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不仅“老卫士”与“青年帮”的争斗不断激化，而且沉寂多年的“拉冯事件”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对本—古里安的威望与声誉构成了挑战，对佩雷斯的政治前途也产生了影响。

1955 年的多利—奥辛调查委员会没能查出军事情报局局长吉布利伪造文件的事实，而拉冯又借机想把达扬和佩雷斯从总参谋部和国防部清除出去，这使本—古里安东山复出，重新担任国防部长，后又重新担任总理。因此事下台的拉冯被安排到以色列总工会担任书记，表面上好像矛盾已经平息，但受了“冤枉”的拉冯一直伺机挽回当年被迫辞职的面子。

1960 年，前军事情报局工作人员哈瑞尔上校向拉冯告发了当年吉布利伪造文件的情况。拉冯在得此消息后找到本—古里安，要求重新调查此事并给予“平反”。本—古里安先指派自己的军事秘书本—大卫简单地对有关人士进行询问，在本—大卫汇报说确有假造文件的情况后，又下令以最高法院法官哈伊姆·科恩为首组成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此事。

因蒙受不白之冤的拉冯觉得不能再等待了，他要求本—古里安依据本—大卫的汇报立即给他“平反”，但“老人家”拒绝这样做。本—古里安的态度是，在没有得到权威性的调查结果前，判定谁有过失或是无辜都将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拉冯对本—古里安的这一立场甚为不满。

偏执、愤懑不平的拉冯终于将新得来的信息捅给了新闻界，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而且几乎都在为拉冯鸣不平，在新闻界曝光的浪潮中，拉冯的“小机灵”又起动了，矛头对准与此事无牵连但被视为自己宿敌的佩雷斯。拉冯在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作证时，不相干地提及“经济帝国主义”，而且还点到了佩雷斯的姓名。事后，他把证词漏给了报界，佩雷斯的姓名立即见诸报端。

值得注意的是，拉冯只提佩雷斯而不讲达扬，这使人不免要把视线对准佩雷斯这位副部长的上司——本—古里安。“老人家”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写信给某报社，称佩雷斯“以难得的天才把整个国防部门管理得井井有条”，“在为国奉献方面难找出有出于其右的人”，这多少抵消了一些拉冯煽动起来的流言蜚语。对此，佩雷斯在日记中写道：“在争论过程中，我从未要求本—古里安帮我做一些辩解。然而，他却显示了超乎寻常的同志之情，这使我深受感动。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忙于政务的人能像本—古里安这样挤出时间来为自己的学生、朋友和下属辩护，他的行为堪称楷模。”

然而，本—古里安的爱护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他既然出面为佩雷斯辩解，就离开了原先比较超脱的位置，把自己放在了拉冯的对立面。在新闻界普遍为拉冯鸣不平时，他实际上也处在了舆论的对立面。自从以色列建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陷入这样一种局面之中。

以科恩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不久得出结论：有关批准在埃及从事爆炸活动的文件是伪造的。吉布利后来也作了伪证。这对拉冯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或许正是由于调查结果对拉冯有利，本—古里安根本不愿接受它。在本—古里安看来，对四面受敌的以色列来说，国防部门有着突出的重要性。吉布利等人的做法确实违背了“文官领导军队”的民主政体，但若扶助拉冯，必然使军队和国防部的威信扫地。于是，面对科恩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本—古里安声称：鉴于该委员会只有科恩一人是司法界人士，因此这一报告还算不上是司法调查的结果。他要求重新对“拉冯事件”进行彻底的司法调查，没想招致一片激烈的反对声。

在拉冯的鼓动下，报界向政府提出了极为严肃的问题：如果调查报告认定拉冯有罪，是否还要进行彻底的司法调查呢？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之前，为什么本—古里安不提要进行司法调查呢？面对这些质问，本—古里安

陷入老人难于避免的偏执，矢口咬定科恩委员会的报告在事实与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换言之，事实只能说明，拉冯在这场“腐败行为”中是有罪的。

在内阁里，不少“老卫士”对本—古里安的偏执很不满。最后还是由财部长艾什科尔出面达成一项妥协：不成立专门的司法调查组，而由司法部长平哈斯·罗森牵头，建立一个由七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重新调查“拉冯事件”。

然而，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照顾荣誉和威信的。1960年12月21日，“七部长委员会”得出了与科恩委员会同样的结论。本—古里安为此暴跳如雷。更使“老人家”不能接受的是，内阁中大多数“老卫士”都没有站在他一边。用佩雷斯的话来说：“结论造成了一种迫使本—古里安辞职的局面。除非拉冯退出政坛，否则本—古里安不会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给“老人家”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

亲爱的本—古里安：

在我看来，您是唯一能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国家这只船引向安全彼岸的人。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您为我国所确立的四块基石：

- (1) 在国防方面——实施核威慑；
- (2) 在政治体制方面——提供了可以改革选举制度的机会；
- (3) 在内格夫建设方面——利用联邦德国贷款从事移民、工业化和农业发展工作；
- (4) 在外交方面——与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如果现在您提出辞职，上述所有基石将受到冲击，结果是被损伤甚至完全被毁灭。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面对灭顶之灾的威胁时是不能离开您的思想、智慧和经验的。

我非常理解近几个月来您的处境。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许多扭曲、非礼和背叛的现象，但其责任不在我们的人们。一些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只起了把水搅混的作用，根本不考虑后果如何。

您的一生都在为这个犹太国而奋斗，而且在精神和心理上赋予国民以巨大的恩惠。在人民需要您庇护他们时，您不应退出政治舞台。

新的总参谋长刚刚承担起指挥全军的职责，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您的指导和支持。在武装部队中，无论哪个军种都不可能离您而去。在上一次选举中，千百万群众怀着完全的信任和巨大的希望选举了您作为他们的领导人，这也完全可以说明一切。

我将永远和您站在一起！

考虑到本—古里安给予佩雷斯的恩惠，这封信可以说是出自真情的表白，但这并没有阻止“老人家”去做佩雷斯不愿看到的事情。1961年1月31日，本—古里安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本—古里安辞去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意味着整个内阁的总辞职，这在执政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内部引起巨大震动。2月4日，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艾什科尔在会上提出，为使“老人家”收回辞呈从而避免“内阁危机”，唯一的办法是解除拉冯所担任的总工会书记的职务。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多数人同意了艾什科尔的建议，本—古里安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东西……

巴勒斯坦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保住了，但本—古里安在“老卫士”和公众

心目中的威信也降到了最低点。许多人不再把他看成这个国家的创建人，而看成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两年后，本—古里安又一次提出辞职，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位让给了帮他渡过那场“危机”的艾什科尔。佩雷斯依靠“老人家”的“余威”继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年迈的本—古里安这一回是真的要在萨德博克尔渡自己的晚年了，但不久，一桩政府的决定又把他带回政治旋涡之中。1964年5月，艾什科尔在会商了巴勒斯坦工人党其他领导成员后宣布，鉴于当年撤消拉冯职务决定的证据不足，政府决定取消当时的有关决定和文件。尽管艾什科尔并没有说要给拉冯“官复原职”，但决定本身已足以使本—古里安火冒三丈。1964年底，本—古里安通过报界宣布，他已搜集到新的材料，说明拉冯的确曾下令在埃及从事秘密活动。他要求政府成立一个司法调查委员会，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巴勒斯坦工人党内“老卫士”与“青年帮”之战已不可避免。一时间，两派人士频繁分别碰头于特拉维夫党的总部或萨德博克尔本—古里安家中。达扬首先采取行动，宣布“由于在艾什科尔政府中存在的敌对和压迫气氛”，他决定辞去所担任的农业部长职务。不久，总检察长本—兹维和司法部长多夫·约瑟夫又正式向艾什科尔提出成立司法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这使艾什科尔必须作出反应。

或许是艾什科尔学到了本—古里安的为政之道，在党内两派斗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他向总统提出辞呈，内阁又面临全体总辞职的“危机”之中。1965年2月，巴勒斯坦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决定两派究竟谁将取胜。已身患癌症的夏里特坐在轮椅上，由艾什科尔和梅厄夫人等“老卫士”簇拥进入会场，发表了一篇激烈抨击本—古里安的讲话。夏里特的行动对动摇不定的代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古里安发现自己已因此失去了党内的“中心位置”，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会场。最后，大会以1226票对841票否决了成立司法调查委员会的提议，实际上宣布了受本—古里安支持的“青年帮”的彻底失败。

本—古里安回到萨德博克尔，打算退出巴勒斯坦工人党，另立旗帜。照他的盘算，新成立的政党可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赢得25个席位，而分裂后的工人党与劳工联盟党的联盟也可得到25席，到那时，艾什科尔会找上门来进行联合，以保证能取得执政地位。

本—古里安另立新党的主张得到“青年帮”中许多人的支持。总工会中最大的分支机构——建筑工会的书记海勒尔·科恩向“老人家”建议，只要能把总工会书记阿哈龙·贝克尔和海法市市长阿巴·库斯基拉住，新党会立刻成为一个“大党”。然而，“老人家”此时心目中只有两个重要的角鱼——达扬与佩雷斯，而对别的人物都抱可有可无的态度。

遗憾的是，达扬和佩雷斯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要离开工人党。佩雷斯认为本—古里安对新党的选举潜力所作的估计实在过分乐观。6月份，他在“少数派”积极分子会议上说：“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团结，多做有建设意义的工作，而不是分裂和去作反对党。”在他的劝说下，当时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表示“愿在工人党的框架中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而不是另立新党。

两天后，佩雷斯带着这种意见去参加本—古里安召集的一个会议。一进门，他就感到已经不能把预先想定的意见公之于众了。本—古里安指定梅

尔·巴雷立而不是他来主持会议。会议也没有要求参加者发表意见，只是由本—古里安像宣布决定似的说：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成立新党。6月29日晚，本—古里安正式宣布成立以色列工人党，按希伯来文缩写，也叫拉菲党。

那一天晚上或许是佩雷斯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时刻。他并不相信新成立的拉菲党能取得任何成功。就个人而言，他与艾什科尔也没有任何解不开的宿怨。至于“拉冯事件”，他认为已走到了尽头，任何翻来覆去的调查与指责都不会有任何政治意义。但是，他觉得自己离不开本—古里安。“老人家”就是“老人家”，他决没有能力去改变本—古里安的决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佩雷斯举起了苍白的左手，于是他不得不情愿地成了拉菲党的党员，做了一件他以往从未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是夜，佩雷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徘徊在脑海中的是白天会议上的一幕场景，而夹杂于其间的又是无数迷茫与困惑。只是夏日的第一缕晨曦透过百叶窗射进屋内时，他才昏昏入睡。晨7时整，床前的电话铃响，数声之后他才用手拿起了话筒。“喂，你在家呀！”这是本—古里安的声音，佩雷斯立刻振作起来。“老人家”说，他对他自己昨天在会议上的表现深感遗憾，想立即到佩雷斯家造访，以示歉意。无论如何，佩雷斯不能让“老人家”屈尊就驾。他赶忙解释说，他在昨天的会议上并没感到有任何不快，并表示立即赴本—古里安的住所“聆听教诲”。

本—古里安在住所门口等待着佩雷斯。一见面，“老人家”就热情地与他拥抱，并再三对自己昨日冷落佩雷斯表示歉意。本—古里安说，他知道佩雷斯不赞成分裂出来另立新党，但由于自己的新党“不能缺了达扬和佩雷斯”，所以才用了“强硬”的手法把两人拉过来。最后，“老人家”带着一股“政客式的腔调”对佩雷斯说：“如果你当时说‘不’，我或许会放弃重组新党的主张。”

本—古里安的话，佩雷斯都听明白了。他感到十分凄楚，但又别无选择。踌躇不安之中他只想到了过去在信中讲的一句话，于是对本—古里安说：“我将永远和您站在一起！”

## 第九章 挽救国内政局的战争

说佩雷斯离不开本—古里安，此话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在组织和扩大拉菲党的过程中，正是年迈的本—古里安离不开佩雷斯。达扬有一股放荡不羁的性格，本—古里安虽然喜欢他，但在筹资、发展党员、建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等一系列党务活动中却不能依赖他。这样，全部重任就落在辞去了公职的佩雷斯身上。

不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失去了施展抱负的一个机会。然而，由于不再受到“老卫士”品头论足的挑剔，佩雷斯也把顾虑甩在了身后，这就为他实现新的抱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佩雷斯最紧要的任务是制定一个新的纲领，以便在即将到来的议会大选中为拉菲党赢得更多的席位。在这个纲领中，佩雷斯提出“以民族化代替社会主义化”的口号，力图与巴勒斯坦工人党的左翼政纲拉开一些距离，这一点颇受本—古里安赞赏。另外，佩雷斯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建立了不少拉菲党的分支机构，也筹集到相当数量的资金。如果说拉菲党刚成立时佩雷斯还对前途抱有不少悲观的看法，那么到了大选前夜，他的看法已变得颇为乐观。

议会竞选进行得十分激烈。拉菲党和巴勒斯坦工人党从过去的“一家人”变成了对手，反目为仇，相互攻击几乎到了白热化 81 的程度。1965 年 11 月，大选结果公布出来，工人党和劳工联盟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在 120 个议席中取得了 45 席，联合一些小党取得了执政地位；而拉菲党仅得 10 个议席，远远低于预期的 25 席，这使佩雷斯感到很失望。

尽管本—古里安、达扬和佩雷斯都当选为议员，但却是坐在反对党的议席中。本—古里安显然有些心灰意冷，非到重大决策时刻，一般不参加议会的会议。这样，拉菲党议会党团的组织工作就落在了佩雷斯的庸上。或许有些感到遗憾的是，议会党团领袖是西奈战争的英雄达扬而不是跑前跑后的佩雷斯。好在两人私交甚笃，佩雷斯对此也不太计较。

唯一时常萦绕在佩雷斯心中的阴影是这种反对派地位还要持续多久？自从他投身于政治领域以来，无论是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构，他从来没有这样被冷落过。特别是当梅厄夫人那种“死对头”出现在议会讲坛上的时刻，他总觉得发言人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和阴阳怪气的语调是冲着自己来的。他试图忍耐，但有时也身不由己地站出来，从事他一直认为是无聊的党派之争。他心里明白，只有当一个“共同敌人”出现在以色列面前，在朝派与在野派之间的党争才能平静下来，这样一种局面不久果然出现了。

1964 年 6 月，在阿拉伯联盟支持下，巴勒斯坦各界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一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艾哈迈德·舒凯里为主席，总部设在约旦首都安曼。是年底，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暴风”突击队向以色列打响了第一枪，由此开始了经常不断的武装袭击。1966 年春，叙利亚在自己境内实施约旦河上游河源巴尼亚斯河的改道工程，以色列认为这一举动威胁到自己生产和生活用水来源，于是派飞机在 7 月 14 日炸毁了施工工地。当年 11 月，以军因巡逻队受袭越界进攻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与约旦军队发生激战。1967 年 4 月，以方因开垦叙以间非军事区土地而与叙利亚军队交火。7 日，叙以空军在戈兰高地上空开战，六架叙空军飞机被击落，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的军事摩擦进一步激化。

叙以空战发生后，埃及表示站在叙利亚一边。5 月 1 日，埃及总统纳赛

尔宣布，根据 1966 年 11 月签订的埃叙共同防御协定，埃及已同意向叙派遣空军部队，以对付以色列的侵略。5 月 13 日，苏联向埃及提供情报：以色列正在以叙边界集结军队。尽管苏联随后解释说，它不能确定以军的行动是出于进攻还是防御目的，但情势本身使得埃及和叙利亚先后于 16 日和 17 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埃及还在 16 日通知联合国有关方面，为了保证埃能顺利地西奈半岛增派部队，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驻扎在那里的联合国部队应当撤出。

以色列对联合国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的反应是 5 月 19 日宣布进行全国总动员，而达扬和佩雷斯这样的反对党议员也立即活跃起来。5 月 20 日，达扬告诉来访的以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他估计埃及军队在进驻西奈半岛后会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从而使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完全陷入瘫痪。不幸的是，他的话言中了，埃及果然在 5 月 22 日采取了这一行动。

或许是拉宾以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份向艾什科尔提出了建议，5 月 23 日，艾什科尔召集内阁国防委员会和议会反对党领导人一起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当时担任工党总书记的梅厄夫人、新任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右翼的自由运动党领袖贝京、达扬和佩雷斯，还有总参谋长拉宾和作战部长埃泽尔·魏茨曼。艾什科尔就局势征求各方意见，贝京出人预料地借机提出：鉴于艾什科尔缺乏军事经验，他应让位给本—古里安，以便使后者组织一个容纳各党派的民族团结政府。

熟知党派政治真谛的达扬和佩雷斯对贝京的建议并不感到惊讶，他们赞成贝京建议的后半部分，但知道，由于在朝派在议会享有多数，由本—古里安复出以取代艾什科尔是做不到的。会后，佩雷斯告诉达扬，如果艾什科尔同意由达扬担任国防部长，拉菲党可以参加拟议中的民族团结政府。至于本—古里安那里，他将设法取得这位“老人家”的首肯。

佩雷斯后来在日记中记述道：“我现在面对人生中处境最困难的一天：我不得不到本—古里安那里，告诉他取代艾什科尔是不可能的，只要能使达扬当上政府的国防部长就应当满足了。我想到本—古里安听到这些话时会感到很气愤，没想到昨天一谈起此事来他的脾气发得像火山爆发那样大：‘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政治家，是位朋友，但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你居然没把撤换总理作为先决条件提出来，难道你认为艾什科尔有能力领导这场斗争吗？’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已处在不得不给予‘反击’的位置上，于是说：‘您过去总是告诫我们，在意识形态与安全发生冲突时，安全应放在优先地位上。难道这一原则是约束我们而不约束您吗？难道您没看到安全形势已严重到了何等地步吗？’霎时间，‘老人家’立即从暴怒中冷静下来。”

本—古里安最终同意让达扬参加民族团结政府，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佩雷斯告诉艾什科尔：“我们对你当总理毫无信任可言。”佩雷斯对此很感棘手，因为他觉得艾什科尔毕竟还是一个不坏的人。最后，佩雷斯还是原原本本地把本—古里安的意思转达给艾什科尔。现任总理对此莞尔一笑，告诉佩雷斯：“我知道那是你们的立场，不过一天后你就可能变主意。”

1967 年 6 月 1 日，以色列成立了以艾什科尔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贝京首次成为内阁成员，达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国防部长一职。佩雷斯没有得到正式的任命，但后来达扬任命他为“助理”，负责国防系统文职人员方面的工作。6 月 1 日晚上，拉菲党的领导成员齐聚在本—古里安家中。“老人家”似乎忘记了数日前火冒三丈的场景，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干得



都不错，但干得最出色、最卖劲儿的还是佩雷斯。”

以色列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之时，中东局势正处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5月24日，叙利亚和伊拉克签订了针对以色列的双边军事合作协定，伊拉克派出部队进驻叙以边境。5月30日，约旦与埃及签订了双边防御协定，埃及军事使团和沙特阿拉伯部队也进驻约旦。另外，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派出部队支援埃及，黎巴嫩、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国也宣布动员部队。热点温度急剧上升，使美国和苏联向中东有关国家发出警告：谁也不准“打第一枪”。全世界密切关注东地中海局势的人似乎都因此松了一口气。

6月4日清晨，以色列内阁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尽管外交部长埃班再次提到美国人所说的“谁开第一枪”的问题，但达扬仍坚持他前一天在书面报告上所作的结论：木已成舟，以色列必须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按照达扬的说法，如果以色列不抢先下手，发动突袭的有利条件就会丧失，其结果是在南、东、北三个方向面临三个战场，顾此失彼，使阿拉伯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听到这里，艾什科尔发言了。他说：“如果我们早三四天动手，情况也许要好一点。”虽然“战争”一词没有从他的口中说出来，但他建议命令军方选择时间、地点和适当的方式发动军事行动。这就是说，军方已取得了开启战端的全部授权。

1967年6月5日，也就是以色列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的第四天，内阁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二天，以军向阿拉伯国家发起了进攻。清晨，以色列空军倾巢出动，以隐蔽方式突袭了埃及的空军基地。以为美苏的警告可以“遏制”以色列的埃及军队此时已放松警惕，结果在以空军的两个梯次的攻击中即损失空军实力的3/4以上，完全失去了制空权。几乎是在发动空中打击的同时，以色列地面部队分三路攻入西奈半岛，在三天的时间内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

以色列空军在完成对埃及的空袭后，5日中午调过头来攻击约旦空军和驻扎在约旦的伊拉克空军，两个小时之内使约空军损失90%以上，同时以军地面部队也向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发起了进攻。

在北线，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战争是6月6日打响的。在完成85对埃、约空军的袭击后，以色列空军倾全力对叙空军发动攻击，当日即使叙损失作战飞机50%以上，6月8日，以地面部队在完成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的作战任务后，集中兵力开始了对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的进攻。

被称作六·五战争的第三次阿以战争只进行了几天。在美苏的压力下，埃以和约以在6月8日实现了停火，叙以间的战斗也在6月11日停下来。以色列在战争中不仅重创了阿拉伯军队，而且还占领了西奈半岛和原由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控制区扩展到8.7万平方公里，一下子扩展了近三倍。

达扬成了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英雄。没有人去考虑他仅仅是四天前才担任起以军的最高职务的，也没有人想到那些在“闪电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军用飞机是佩雷斯当年从法国历经千辛万苦采购回来的。在鲜花和掌声之中，艾什科尔也不能因党派之见把达扬排斥在内阁之外，甚至不能把他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挪开。在这种情况下，达扬和佩雷斯都认为，拉菲党应当重新回到巴勒斯坦工人党中去，以使更多的人能进入内阁，取得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达扬和佩雷斯的主张自然遭到本—古里安的激烈反对，这迫使佩雷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到了“老人家”的对立面。在1967年12月12日召开

的拉菲党代表会议上，与巴勒斯坦工人党合并的提案以 52% 的代表赞成而获通过。1968 年 1 月，拉菲党、巴勒斯坦工人党和劳工联盟达成了结成政治联盟的协议，党的领导机构权力分配的份额为：巴勒斯坦工人党占 55%，其余两党各占 22.5%，对外称以色列工党。固执的本—古里安不愿成为工党党员而留在了党外，两年后，他完全退出了政界。

以色列工党的建立使得佩雷斯重新正式到政府任职。从 1968 年到 1973 年间，他先后担任过交通部长、移民安置部长和邮电与运输部长，还曾负责过被占领土的开发工作。表面上看，他的政界地位是提高了，他投身于国家治理的热情也提高了，当交通部长时曾提出过“每个工人一辆轿车”的口号，也为其实实现努力过几年。但在实际上，工党内部的派系偏见一直在困扰着他。特别是 1969 年艾什科尔因病去世后，果尔达·梅厄夫人担任内阁总理，两个“死对头”碰在一起，实在让佩雷斯感到郁闷和烦恼。由于存在着原先三党达成的权力分配协议，梅厄夫人无法将佩雷斯从内阁中赶出去，于是她总是力图把佩雷斯排斥在内阁的重大决策过程之外，特别是涉及国防、外交领域的事更是这样。

对于佩雷斯来说，摆脱寂寞和冷遇的办法之一是倾注笔墨，1970 年出版的《大卫王的投石机》是这方面的一个“成果”。在书中，佩雷斯首先披露了早年他奔波于巴黎、波恩、华盛顿等地采购武器的许多细节，随后又讲到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六·五战争前后的决策过程。这些内容引起了国内外许多读者的兴趣，佩雷斯内心也感到相当的满足。相比之下，他在书中对未来中东形势和阿以冲突的看法几乎根本未得到人们的重视。今天看来，这些想法并非毫无意义的呓语。

佩雷斯在书中提出，为使以色列长久生存下去，这个国家必须设法同阿拉伯各国达成政治谅解和进行合作。在政治途径暂时受阻的情况下，应着眼于其他方面，而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中。

佩雷斯认为，现代经济法则要求实现跨越边界的“大生产”、“大流通”，以色列经济要想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就要与邻国合作，建立输出产品的“大市场”。佩雷斯提出建立以色列、黎巴嫩和约旦之间的“协作关系”，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进出口，彼此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要加以维护。另外，黎巴嫩阿拉伯人口中有近一半是天主教徒，出于利害关系与以色列有着密切的联系；约旦在政治上是亲欧美的，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有芥蒂。这些都有利于以色列争取它们向自己靠拢。至于合作的方式，佩雷斯认为，三国可以像北非的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市场的“联系国”，在共同市场的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佩雷斯提到 1957 年他第一次会见被称作“欧洲共同市场之父”的让·莫内的情形。让·莫内当时告诉佩雷斯：“政治家很少为政治观点所打动，但经济学原理和统计数字却容易说服他们。”让·莫内是用统计数字说服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其结果是建立了共同市场。按照让·莫内的看法，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的是政治性的——避免欧洲被再一次带入残酷的战争。

佩雷斯关于发展以、约、黎三国经济合作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让·莫内，此事不得而知。他的设想在 70 年代不可能实现——北非三国是靠戴高乐的努力才成为欧洲共同市场联系国的，而 1967 年战争后，法以关系已相当冷漠——这也是事实。不过，读者在本书后面还会看到，从 80 年代后期

开始，以经济合作促政治和解几乎成了佩雷斯的口头禅。溯本求源，《大卫王的投石机》一书作为佩雷斯这一论点的蓝本，这种说法或许并不过分。

70年代初，当佩雷斯受冷遇而不得不从著述中解脱的时候，以色列工党政府正红极一时。1969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部队在与约旦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后，不得不把总部迁往黎巴嫩的贝鲁特，这使得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相对平静了许多。1970年，使许多以色列人感到畏惧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继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又忙于处理内部事务，整个中东形势处于“不战不和”的局面中。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已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他们把功劳记在工党政府的一对“搭档”上一——被描述成犹太母亲和预言家性格集于一身的内阁总理梅厄夫人，和作为战争英雄的国防部长达扬。面对人们称道这“一敌一友”的“搭档”，佩雷斯心中有一种难以明状的酸楚。好在情况不久就发生了变化。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教赎罪日，以色列全国都处在宗教活动中。数日前，情报部门曾向内阁报告说，埃及和叙利亚各自开始向两国与以军的对峙边界集结军队，有可能开展重大的军事行动。然而，在内阁会议上，梅厄夫人和达扬都认为埃、叙军队向以色列发动全面进攻的可能性极小，拒绝让以军实行局部动员。直到10月6日凌晨4时，情报机关搞到了埃叙当日下午发起进攻的作战计划，达扬才决定以军实行部分动员。

10月6日下午2时，埃及使用200架飞机、1000门重炮，向设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军巴列夫防线发起全面攻击，迅速突破前沿，24小时内将10万大军和1000余辆坦克开进了被以军占领了六年之久的西奈半岛。与此同时，叙利亚军队在1500门火炮和1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分三路向占领戈兰高地的以军发起进攻，夺取了赫尔蒙山主峰，兵逼高地重镇库奈特拉。

埃、叙军队的突袭成功震惊了整个以色列。自1967年战争胜利以来，以色列上上下下都相信自己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埃、叙军队在第一阶段的胜利使他们感到沮丧、不知所措。第190装甲旅高速驰往西奈前线救援，不想误入埃军包围圈，70%的坦克被毁，旅长也被埃军俘虏，许多人认为以军已到了全线崩溃的边缘。危机之中幸好埃军方面出现了四天的“战斗间歇”，达扬抓住这一时机组织兵力在北线进行反攻，至11日以重大伤亡夺回了戈兰高地。从14日起，大量南调的以军开始攻击进入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由沙龙率领的装甲师利用埃及第2、3军团结合部处的七公里间隙，于16日凌晨由大苦湖地区向西越过苏伊士运河，切断了埃军的后勤运输线，总算使埃军的攻势停止下来。10月24日，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实行停火，战争才告基本结束。

以色列虽然在“赎罪日战争”中转危为安，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飞机103架，战车1200辆，近3000士兵阵亡，另有9000人负伤。丧失丈夫或儿子的妇女们走上街头，痛斥工党政府是“瞎子政府”，这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是没有见过的。

“赎罪日战争”爆发时，风烛残年的本—古里安已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1973年12月1日，“老人家”在特拉维夫的哈绍梅89尔医院安静地故去。刚刚忙完战时工作的佩雷斯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眼望着被自己称为“精神指导者”的遗体，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哀。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他终生都打算仿效但永远不能企及其伟大程度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总算达到了“最靠近”这个人的程度……

## 第十章 通往领袖之路

1973年是以色列议会的大选年，但由于“赎罪日战争”，原定11月31日举行的大选被推迟到12月31日举行。在大选中，工党凭借多年的实力仍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和组织政府的权利，但其在选民中的威信已今非昔比，“瞎子政府”之说仍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介之中。

作为工党领袖的梅厄夫人在组阁中遇到了麻烦。由于反对党和新闻界对战争初期猝不及防现象的攻击，大选前曾组成了以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纳特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查找应对此负责的官员。然而在大选后，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仍未公布调查报告，而报界继续抨击达扬应对战争初期的失利负责，这使梅厄夫人在是否继续任命达扬为国防部长问题上举棋不定。

作为工党联盟内部原拉菲党派别的领袖，佩雷斯是无保留地支持达扬继续担任国防部长的。在他的游说活动下，梅厄也下决心让达扬留任。这是佩雷斯政治生涯中与梅厄少有的一次意见一致，但却没能持续几天。

1974年3月3日，梅厄向议会提交了新政府的组成名单，达扬在其中仍担任国防部长。新政府很快就得到议会批准，但在公众和舆论中却遭到激烈的反对，要达扬辞职的呼声就像1967年“六天战争”前夕请他出任国防部长时那样强烈。4月10日，梅厄夫人以自己的辞职结束了舆论对达扬队而也是对她的政府的攻击。工党联盟必须选出新领袖以组织起一个新政府。

在工党联盟中，原巴勒斯坦工人党一派势力最大，新领导人出自这一派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佩雷斯却准备向党的原第二把手萨皮罗提出挑战，竞选党的领袖。

萨皮罗承认自己已到风烛残年，无力担任党的第一把手。但他也没有把位置让给佩雷斯，他选中了伊扎克·拉宾。在工党联盟原巴勒斯坦工人党一派人中，拉宾不仅有年龄优势，而且当过军队的总参谋长，有指挥部队的经验：当过驻美国大使，有外交工作的经验；特别是，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他不在国内，因此让别人抓不到“失职”、“丧失警惕”的小辫子。在4月22日工党联盟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拉宾得票298张，佩雷斯得票254张。尽管原巴勒斯坦工人党一派在党内占65%的人数优势，佩雷斯能取得如此接近于拉宾的投票无疑是一种胜利，但他还是没能圆自己的“领袖梦”。1976年6月3日，佩雷斯进入新成立的拉宾政府，当上了虽不是最终所想但也梦寐以求的国防部长一职。

佩雷斯一上任，下属立即感觉到他与前任的领导风格有许多完全不同的地方。达扬当部长，精力主要集中在制定作战计划和管理被占领土两方面，上班时也经常难以寻到，据说是偷偷摸摸“猎艳”去了。佩雷斯不仅早来晚走，而且事必躬亲，简直让人觉得是一个大事小事一齐抓的“老婆娘”。第一次召开国防军参谋长会议，佩雷斯就要求报告预备役部队“纳哈尔”的人数，而且还要把女兵的人数单列出来，真让不少高级军官抓耳挠腮地下不来台。他还经常进行不预先通报的视察，试图发现装备保养不良、后勤供应不到位这样的问题。十月战争期间，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曾缴获了不少有关以色列通讯、密码方面的文件，佩雷斯上任后立即全部更换密码、密语系统，并下令说，今后如再有类似情况发生，一定要依军法严办。十月战争后以色列军队士气低落，对战争初期失利的责任争论不休，但在佩雷斯的管理下，很快恢复了元气。虽然他的办法颇令人讨厌，但慢慢地看出了成果，说闲话

的人就变得少起来。

当然，佩雷斯也没有把时间全花在视察部队和检查具体工作上。他当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时就热衷开展海外联系，当了部长后则更是这样。

佩雷斯把伊拉克看作是以色列不共戴天的敌人，为此他几度秘密会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领袖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向后者提供武器，支持其对伊拉克政府开展的武装分离活动。不过，与库尔德人的联系需要有一种特殊的谨慎和小心。这个民族分布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边界的邻接地区，在各国都是政府的武装反对派。支持巴尔扎尼要考虑到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关系，巴列维被佩雷斯看作是阿拉伯人的敌人，因此也就成了以色列的“朋友”。但伊拉克库尔德人作为“敌人的敌人”，巴列维作为“敌人的敌人”，他们之间也因伊朗境内的 500 万库尔德人而彼此仇视。在这方面，佩雷斯通过担当向伊朗出售美国武器的“中间人”，还是没有惹恼巴列维国王的。

佩雷斯这一时期开展“秘密外交”的重头戏是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唱的，而这对于佩雷斯来说也是初次接触的“国家级机密”。

1974 年 8 月 29 日深夜，一架约旦军用直升机降落在耶路撒冷郊外的阿塔洛特机场。几位乘客趁着夜色在以色列官员的引导下登上一架已经发动了的以军直升机，直飞特拉维夫郊区的以色列国宾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乘客是约旦国王侯赛因，首相拉法伊和一名军事顾问。在宾馆等候者是拉宾、佩雷斯和以色列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这是一次连记者们都不会猜想到的秘密会谈。

凭着侯赛因对宾馆的熟悉程度，佩雷斯料定这位约旦国王已不止一次到过这里。为了保密，约以之间的联系历来只有内阁总理和少数资深部长知道，连会谈中端茶倒水的侍者也只能由内阁首长的高级助手临时充任。佩雷斯得以进入这个“小圈子”，一方面是心中充满欣喜，另一方面也准备在其中有所作为。

约旦虽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但与以色列却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约旦政府一贯认为自己是以色列占领下的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生矛盾。1969 年 9 月，约旦军队与在安曼的巴解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侯赛因国王通过美国政府向以色列告急，以军在戈兰高地大量集结兵力，迫使当时支持巴解的叙利亚不能派兵进入约旦，从而导致巴解总部不得不由安曼迁往黎巴嫩的贝鲁特，这才保住了约旦的哈希姆王朝。

对于以色列来说，原属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是一块战略上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土地，从西岸地区最西点到以色列的地中海海岸只有 18 公里，当然不愿把它拱手还给约旦。然而，西岸又是一块巴勒斯坦人人口密集的地区，如果以色列正式吞并这块土地，不仅会损害它的国际形象，也会使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激增，最终改变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的性质。因此，以色列一直在寻求一种既不能让巴解组织控制西岸巴勒斯坦群众，又不能撤出军队从而威胁到自己安全的解决办法。

1973 年“赎罪日战争”停火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往返多次“穿梭”访问中东各国，最终达成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撤退若干距离，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驻以实施埃及和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的“脱离接触协议”。“脱离接触协议”为美国因支持以色列而在阿拉伯世界受损的形象挽回了不少影响，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趁热打铁，1974 年 6 月访问以

色列时劝说拉宾与约旦达成某种“脱离接触安排”，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约以之间的秘密谈判。

拉宾和佩雷斯等人都以为尼克松的“脱离接触安排”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所以在会谈开始不久，佩雷斯就提出由他草拟的一项约以妥协、排斥巴解的“邦联制方案”：不涉及主权归属，从行政方面讲，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可以持有约旦护照，参加约旦的议会选举，甚至可在聚居的村镇悬挂约旦国旗；从安全方面讲，以色列军队将继续留在西岸“维持治安”，在西岸的犹太定居者属以色列国民。

虽然拉宾和阿隆都相信佩雷斯的“邦联制方案”一定会对约旦国王产生吸引力，但侯赛因却坚持要求先签订一个“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方面的几位谈判者一下子就明白，作为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小国，约旦在与以色列达成妥协时，总要找到一个阿拉伯大国已经同以色列达成的东西作先例，已表示它并没有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然而，“脱离接触”意味着以色列军队要从与约旦军队对峙的约旦河西岸撤退一定距离，这将会使在西岸定居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在不久的将来要把西岸还给约旦。拉宾政府初掌国家大权，经不住反对派所煽动的示威和攻击。对于约旦国王的要求，拉宾和佩雷斯只好答应“容后再议”。

究竟要不要与约旦签订“脱离接触协议”，拉宾、佩雷斯与阿隆产生了分歧。阿隆觉得应该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这既可满足美国方面的要求，排斥巴解组织作为未来中东和平谈判的一方，又可通过与约旦的合作给其他阿拉伯国家做个样子，促使它们也效法约旦。

拉宾和佩雷斯的看法与阿隆不同，他们认为侯赛因国王势单力薄，先与约旦达成妥协不仅不能引诱其他阿拉伯国家加以仿效，反而会激起相反压力，迫使约旦退出所达成的任何协议，所以他们倾向先与埃及达成某种妥协。

1974年10月19日约以领导人第二次秘密会谈时，侯赛因国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告诉自己的以色列谈判对手，一周后阿拉伯国家首脑将聚会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会议有可能通过一个决议，正式承认巴解组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不言而喻，到那时约旦将从法律上丧失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管辖权。所以侯赛因要求以色列官方在会议召开前发表一个声明，宣布如果阿拉伯首脑这样做，以色列就将正式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

以色列政府虽然没有完全按照侯赛因国王所要求的那样做，但也在拉巴特阿拉伯首脑会议前发表了激烈指责巴解组织的谈话。但是，这些谈话并没能阻止会议通过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决议，约旦已失去了代表西岸巴勒斯坦人说话的资格。

1975年5月28日和1976年1月14日，约以领导人还进行了两次秘密会晤。佩雷斯拟订的新方案比以往更加具体化，包括：（1）纳布勒斯及周围占西岸地区1/3的土地可由约旦在政治上加以控制，允许开辟一条连接纳布勒斯和约旦的“走廊”，并由约旦警察负责治安工作；（2）杰里科及周围的农业区域也归约旦管理；（3）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将完全由约旦指定的穆斯林委员会管理，还可在其中升起约旦国旗。然而，已经失去对西岸巴勒斯坦人代表权的侯赛因国王已没有兴趣倾听佩雷斯的建议，他甚至还含着苦笑告诉拉宾：“我要是你的话，就只有去找巴解了。”

约以之间未能达成交易，佩雷斯倒不觉得是一个失败。早在与约旦国王会面前，他就决定要通过基辛格打开与埃及人谈判的渠道。1974年6月25

日，也就是第一次会见侯赛因国王的次日，他出发前往美国，一是联系与埃及人开启谈判之事，二是还想采购部分新式兵器。

由于实现美苏缓和、进行中东调解，基辛格已成了那个时代的国际风云人物。佩雷斯对外国大人物的态度从来是“崇拜但保留怀疑”，他也是抱着这种态度去见基辛格的。

基辛格刚刚参加完国会的听证会。在会上，他因与苏联谈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一事而遭到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激烈抨击，心情颇为沮丧。他告诉佩雷斯，由于又要去莫斯科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他暂时还腾不出时间为埃以双方“搭桥”。至于武器采购问题，他提醒佩雷斯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施莱辛格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为了今后爬上高位，他可能会左右逢源，因此以色列别指望从施莱辛格那里得到好处。

基辛格与施莱辛格“两虎相争”的事佩雷斯早有耳闻，两人都是犹太人（只不过施莱辛格后来改宗信了基督教），都曾在名牌大学里当过政治学教授，“两个犹太教授能提出三种意见”，这对佩雷斯来说并不感到稀奇。他就是抱着这种不偏信基辛格言论的态度走进施莱辛格办公室的。

佩雷斯与施莱辛格的会谈进行得颇为顺利。这位美国国防部长谈话坦率，能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的尽量加以满足，并且还许诺不向伊斯兰国家出售高精密的武器。回国之后，佩雷斯成了施莱辛格在以色列的“辩解人”。每每有人攻击施莱辛格，他就要站出来说几句好话。他私下里曾对人说：“我有一个住在美国的亲戚叫罗伯特·佩尔斯基，他的祖母是施莱辛格父亲的姐姐。”不知道这个亲戚关系八竿子能不能打着。

就是没有施莱辛格与基辛格之间的个人成见，佩雷斯对后者的印象也不好。他描述基辛格说——

阿隆在美国时，基辛格告诉他：“我们应为下阶段的工作制定一条美以联合战略。”阿隆听了很高兴，立刻回国了。不久埃及外长法哈米到了华盛顿，基辛格又对他说：“让我们制定一条美埃联合战略吧。”法哈米也很高兴，立即返回开罗。而究竟基辛格站在哪一边，谁也不知道，“除了人们对他的恭维，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虚伪。”

70年代初期，佩雷斯无疑是以色列内阁中最“鹰派”的人物。相比之下，拉宾这位有军方背景的政治家也略逊一筹。基辛格以当代梅特涅自居，搞平衡外交，这自然无法为佩雷斯所接受。一俟基辛格着手埃以之间的问题，佩雷斯与这位美国国务卿的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

1974年10月，基辛格在访问开罗和耶路撒冷后，就埃以双方达成最终实现和平的过渡协议总结了两点要害问题：

一、埃及要求占领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首先撤退到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以东的地方（距苏伊士运河约35公里）。

二、以色列要求过渡协议必须包括结束两国战争状态的条款。

基辛格指责以色列的要求旨在破灭达成协议的希望，为此拉宾不得不把佩雷斯和阿隆召集在一起，商讨接受埃及方面的要求以缓和美方不满的问题。拉宾一提出要放弃两个山口，佩雷斯立刻表示反对，认为那样做会使以色列丧失讨价还价的筹码。阿隆本来就对与埃及谈判不感兴趣，也同意佩雷斯的看法。拉宾只好告诉基辛格，以色列既坚持原先的立场，也不能向埃及作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不难猜出其中主要的决策者是佩雷斯，他返美后会见以驻美大使迪尼茨时甚至询问以色列报刊对自己的批评是不是佩雷斯在

搞鬼，可见不信任程度之强。

1975年3月，基辛格再次“穿梭”访问中东有关国家，希望能在埃以过渡协议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一次，他的口气变得很强硬，不仅要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实行大距离撤退，而且还要求六个月后在戈兰高地也采取同样的行动。面对基辛格施加的压力，以色列内阁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此时的抉择对以色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内阁成员都知道，基辛格为在美苏中东争夺中排斥莫斯科的势力，促成了埃以和叙以之间的“脱离接触协议”，使得一些阿拉伯国家相信美国才是稳定中东局势的主导势力。如果不让基辛格进一步促成导致未来和平的“过渡协议”，美国的影响就要受到怀疑，苏联已经受到削弱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但是，假若依从了基辛格赞成的埃及的方案，撤退到两个山口以东，以色列的安全能否得到保证又成了问题。经过整夜的讨论，拉宾、佩雷斯和阿隆争取到大多数人的同意—拒绝基辛格所带来的埃及方面的方案。

3月22日，以色列官方向公众宣布了基辛格“穿梭”使命失败的消息，立即引来了强硬派的一片欢呼声。基辛格在焦躁和气愤中也失去了以往那种“举重若轻”的派头，在返程的飞机上就告诉记者：“没了达扬”，佩雷斯“成了只会散布恐怖情绪的假鹰派”，而拉宾居然也“拿不出派头，对佩雷斯的议论瞻前顾后，没一点儿主见”。

基辛格的愤怒转化成了现实，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福特向拉宾发来一封照会，声称“鉴于形势的发展，美国将重新审定它的中东政策”。数天后，美方原已答应提供的几批军事装备停止启运，原答应提供上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下降到了几百万，佩雷斯原拟4月份成行的赴美军事采购被客气的外交托辞所推迟。自1967年以后，美国的军援和经援已成为以色列国家和社会得以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倘若美国停止援助，以色列还有别的选择吗？

面对巨大的外交困境，佩雷斯向拉宾建议采取一种“两线战略”：一方面，动员在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进行游说活动，对福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以美援换撤军”，在撤退问题上向埃及作出一定的让步，同时要求美国提供过去它所不肯提供的军事装备。拉宾同意了佩雷斯的建议，但没有同意佩雷斯要求亲赴美国落实这一战略的请求，而让以驻美大使迪尼茨代为行事。

佩雷斯的“两线战略”取得了成效。在美国国会，79名议员在犹太院外集团的鼓动下联名要求福特总统恢复对以色列的军援，而且还要求提供新的军事装备。迪尼茨私下里造访基辛格，拿出了以方的妥协方案：以军可以撤出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一线，条件是空出的地区由联合国军进驻，同时在山口以西保留一个以军的雷达预警站，以防埃及对以发动突然进攻。已经声名显赫的外交家基辛格当然不能容忍“过渡协议”在最重要的时刻功亏一篑，立即同意了以方的建议。1975年8月，他再次前往中东，在埃以之间具体敲定“过渡协议”的每一个细节。9月2日，埃以“过渡协议”开始实施，具体条款大都符合以色列所提的条件。另外，美以之间还签订了一个附加议定书，美方同意向以提供新的一笔20亿美元的军援和经援，佩雷斯的“以美援换撤军”最终得以实现。

9月下旬，佩雷斯为落实美援计划再次来到美国。22日晚，他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后来被后者称之为“纯粹是个人间絮语”的竟夜长谈。作为“外交老手”，基辛格显然还想把中东和平再向前推进一步。他问佩雷斯，如果



要求以色列退回到 1967 年边界，以色列将会作何反应。佩雷斯一点儿也没有迟疑，回答说：“我们将战斗到底！”

看到佩雷斯的这股执拗劲儿，美国国务卿转了话题。他半做玩笑、半怀疑地问佩雷斯：“难道以色列人民不为有一个犹太人当上了美国国务卿而感到骄傲吗？”佩雷斯深知此话的分量，因为基辛格过去曾为梅厄夫人指责他为“带着一口德国腔的美国人”而深感懊恼。外交上需“有进有退”，佩雷斯回答道，他不仅在犹太人圈子里感到了对基辛格的敬仰，而且也为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基辛格和佩雷斯都脱下上衣，松开领带，把脚垫到了茶几上，在大口呷着浓咖啡气氛中自由地开始了交谈。会谈的成果是惊人的，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预警系统是最尖端的产品，不仅可满足脱离接触的需要，而且还可清楚地监听以色列周围阿拉伯国家的通讯信号。佩雷斯搞到手的武器清单，后来被以色列新闻界连人带物大肆吹捧了一番。

佩雷斯在达成“过渡协议”方面出尽了风头，他与拉宾的关系也到了绷得最紧的关头。两人从个人性格上就有差别：拉宾自称是个务实主义者，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办事愿循规蹈矩，采用常规手段，且懒得与新闻记者周旋。佩雷斯则相反，自称性格介乎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办事总愿先运筹，想找出一个能长期有效的解决办法，再加上本身娴于辞令，所以颇受传播媒介的欢迎。如果两人出自党内一个派别，不同的性格或许还是一种好搭档，但情况偏偏不是这样。有时开内阁会议，佩雷斯发言长了点儿，拉宾就忍不住“敲”上几句“空气堡垒”、“海市蜃楼”之类的话，结果闹得双方很不痛快。一次，担任运输部长的盖得·雅柯比替佩雷斯打抱不平，告诉拉宾说，假如他是佩雷斯，早就会因为常被打断发言跟拉宾“翻”了。没想到拉宾却冷冰冰地回答说：“可惜你不是。”

拉宾出身军旅，但与不少高级军官却意气不和，特别是当时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古尔将军。1975 年 5 月，拉宾准备任命预备役少将阿里尔·沙龙为自己的军事总顾问，一下子引起了拉宾和古尔间矛盾的爆发。佩雷斯与古尔私交颇深，平时对拉宾冷落古尔的做法就很不满，起用沙龙一事因此也就成了他与拉宾的矛盾从幕后走向前台的转折点。

沙龙是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勇将，强悍但善于出奇制胜，几次战争中都在关键战区为以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沙龙身上也包含着许许多多引起人们争议的地方——性格暴躁、桀骜不驯。特别是，他公开声称要当军队的总参谋长，遇事总要出人头地地表演一番，这使他与许多同事结了怨。沙龙是达扬提拔起来的，佩雷斯因此不怀疑此人的军事才能，只是有“一将之才有余，统帅之才不足”的感觉。但是，如果拉宾任命沙龙为军事总顾问，一是在自己领导下的国防部插了一个钉子，二是削弱了古尔将军的权力，这就是佩雷斯所不能答应的了。

佩雷斯无法阻止拉宾的决定。按照法律程序，内阁总理任命顾问是无需议会批准的。于是佩雷斯就反反复复地在总顾问权限问题上做文章，终于迫使拉宾同意——总理军事总顾问的地位不得高于总参谋长。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佩雷斯和古尔仍认为拉宾的决定旨在排斥他们两人。他们为不让沙龙出头露面，取消了正常的总理对部队的校阅。沙龙有职无权，无所事事，终于在 1975 年 12 月辞去了总理军事总顾问一职。佩雷斯和古尔胜利了，但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沙龙后来参加了反对党利库德集团，

完全成了佩雷斯在政治上无法驾驭的对手。

沙龙的去职也激化了拉宾与佩雷斯的矛盾。1976年1月拉宾访问美国时，告诉邀请其讲演的美国犹太人士说：“交给美国人的武器采购清单并不是一张以色列国的‘信誉卡’……那上面的项目不是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东西！”

拉宾所提的“项目”显然是指佩雷斯与基辛格作“竟夜长谈”后所获得的尖端预警系统，他说该项目“不是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东西”，显然是暗示自己不知此事内幕。消息传出，以色列国内舆论大哗，拉宾与佩雷斯的矛盾也迅速见诸报端。

在2月8日拉宾返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佩雷斯谈了几则报刊评论后质问拉宾：“难道我们在内阁会议上没讨论过武器清单的事吗？难道我们要把事情拿到公众中讨论才能使你承认参与了此事吗？”拉宾自然无法抵赖，他后来在议会讲话时表示：他在美国的言论毫无指责佩雷斯之意，而采购预警系统的事也是在内阁讨论几次后才定下来的。拉宾的这番讲话自然被看作是向佩雷斯的公开道歉，佩雷斯在两人的较量中又胜了一场。

一波巨浪滚下谷底，另一波巨浪又被推上峰线。1976年4月，拉宾与佩雷斯的矛盾又在被占领土西岸地区的市政选举中表现出来。

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后，全区域的行政权由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但市镇的市长、市政委员会成员仍由约旦控制时期任命的巴勒斯坦人士担任。佩雷斯对西岸市镇的市政选举长期不能进行有一种看法，认为如能恢复举行，有助于缓解以色列占领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自担任国防部长后，他一直积极推动此事，终于使内阁同意在1976年4月12日举行市政委员会的选举。

距选举日还有一周时，以色列报界预测说，如期选举将导致温和派下野、激进派上台，亲巴解组织的人士有可能得势，结果害得以色列内阁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在会上，佩雷斯反对推迟选举的建议，认为报界仅凭有新的候选人出现就断定选举达不到预期结果是缺乏根据的。不过他又说，谁也不能保证选举不出现意外的结果，于是请各位就是否如期选举发表意见。拉宾在会议上没有表态赞成推迟选举，多数阁员也同意选举如期进行，结果西岸市政选举还是在4月12日进行了。

西岸巴勒斯坦人市政选举的结果不幸被以色列报界事前言中了！佩雷斯感到很沮丧，没想到拉宾在背后又插了一刀。在接受《国土报》记者采访时，拉宾把错误推到了佩雷斯身上，结果使反对党的指责都朝向了佩雷斯。

人若得势，对他的指责通常被当作牢骚看，说说而已，无足轻重。但若是栽了跟头，再碰到指责，有如落井下石，就实在不能叫人忍耐了。一当《国土报》登载了拉宾的谈话，佩雷斯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向报界公开了内阁会议上的实情，并以从政道德为由，强烈要求拉宾辞职。

政争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党的重新分裂也迫在眉睫。紧张的局势使得工党元老们走出来，强拉着佩雷斯与拉宾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宣布“争论已经结束，未来将不再进行公开的批评与争论”，又一个“停火协议”而不是“和平协定”生效了。

## 第十一章 外救人质，内争功劳

1976年6月27日，星期日

内阁召开每周例会，讨论预算问题。为争拨款份额，各部部长不惜作冗长发言，反复叙述本部门项目的重要性。佩雷斯感到有些厌烦，耷下他的眼皮，不知不觉陷入梦境。

突然，他的军事副官伊兰·特海拉上尉轻拍他的肩膀，递上了一份军事情报局的急电。上面写道：“由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巴黎的法航139号飞机在雅典加油起飞后被劫持，目的地不详。”

佩雷斯一下子从半昏睡状态惊醒过来，连忙把急电交给了拉宾。拉宾阅后宣布休会，留下国防、外交、司法和运输部长组成应急班子。经过短暂讨论后，大家认为，按照有关航空法的规定，法国政府对旅客的安全负有责任，应当把此事通知它，并希望它不要向恐怖分子妥协。

佩雷斯回到国防部办公室后，找来了军队的总参谋长古尔将军。两人经合计决定，如果被劫持的飞机要求返回本—古里安机场，就允许它降落，并以特种部队尽快制服劫机者。

傍晚得到的消息是，飞机到了利比亚的班加西。21时左右，飞机在加油之后又起飞，目的地仍然不详。佩雷斯回到家中，刚准备吃饭，又传来飞机向以色列方向飞来的消息，佩雷斯立即又赶往机场。

1976年6月28日，星期一

午夜刚过几分钟，佩雷斯来到本—古里安机场。所有航班都已停飞，整个机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行动总指挥库蒂·亚当将军的临时指挥所里，佩雷斯见到了古尔。快到1点钟时，有消息说，由于苏丹喀土穆机场拒绝让被劫持飞机降落，该飞机正向约旦首都安曼飞来，说不定还要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

佩雷斯决定抓紧时间见一下特种部队的成员们。在库蒂·亚当的陪同下，佩雷斯来到机场栅栏外的一处小棚子里，那些他所谓“军队中的精英士兵”正在这里隐蔽待命。他找到这支小分队的负责人乔那桑·内塔尼亚胡中校，向其询问营救入质的准备工作。谈话刚开始就传来消息说，被劫持的飞机已改变航向，向南飞行。换言之，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戒备状态可以解除。佩雷斯与内塔尼亚胡转了个话题，谈起文学以放松一下情绪。不过，两人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佩雷斯也没想到，多年后，已牺牲的内塔尼亚胡中校的弟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成为利库德集团的领袖，以政治上对手的面目出现在他的面前。

凌晨4时佩雷斯返回机场主楼的临时指挥所，最新的报告告诉他，被劫持的飞机已在乌干达的恩德培降落。

上午，佩雷斯在国防部查看了被劫持旅客的名单——虽然没有什么重要人士，但在200余名旅客中有一半是以色列公民。有消息说，乌干达总统已接纳了动机者，并以贵宾相待。

佩雷斯闭上眼睛深思了一会儿。乌干达和它的总统阿明对佩雷斯来说岂止是一般的熟悉，以色列曾长期向这个国家提供军事装备，该国的空军也是靠以色列的专家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佩雷斯突然想起了退役上校巴鲁克·巴列夫，该人曾任以驻乌军事顾问团的团长，与乌干达总统埃迪·阿明私交不错。他立刻派人去找巴列夫上校，要后者打电话给阿明，尽量软化这位乌总

统的态度，以为解救人质争取更多的时间。

1976年6月29日，星期二

下午5时30分，内阁应急班子召开紧急会议，劫持者身份已大致摸清，而且他们已于当日下午2时提出了释放人质的条件。

劫持者是瓦迪亚·哈达德医生所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于7月1日(星期四)下午2时前释放包括制造1972年5月30日本—古里安机场袭击事件的日本赤军分子冈本公三在内的40名在以色列监狱服刑的犯人，同时还要求释放在押于西德(6人)、肯尼亚(5人)、瑞士(1人)和法国(1人)的若干犯人，共计53名。

劫持事件一发生，佩雷斯就指示古尔将军研究武力营救人质的方案。在去耶路撒冷参加应急班子会议的途中，佩雷斯问古尔是否已对方案成竹在胸，古尔提出了他的想定方案：派一支小分队去肯尼亚，乘快艇越过维多利亚湖，到达对岸的恩德培机场，击毙劫持者，然后顺原路返回。

“那被劫持的旅客怎么办？”佩雷斯问。

古尔回答说：“靠外交途径，让阿明交还。”

“不行，”佩雷斯否定道，“阿明靠不住，不能让旅客留在他的手中。”

就这样，应急班子会议开始时，拉宾问佩雷斯有否以军事行动营救人质方案，佩雷斯回答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值得批准的计划……”

自从劫持者公布释放人质的条件后，法国政府已宣布释放它所关押的那名犯人，瑞士和德国政府虽未表态，但也没有拒绝劫持者的要求。现在佩雷斯拿不出现成的武力营救方案，拉宾表示，人命关天，应当与劫机者谈判，答应他们的“以人质换同志”的方案。

“不行，”佩雷斯有些激动，没等拉宾作解释就插了话，“我们还没有释放杀人犯以换取人质的先例！”

怎么没有呢？拉宾不用思索就举出两个例子：当年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到阿尔及尔，以色列政府就同意用释放在押犯来换取人质的生命安全；后来以色列还用同洋办法换回两名在大马士革关押的以色列特工人员。佩雷斯无法反驳，但并没有沉默。他红着脸，低着头，反复强调说，要是接受了劫机者的要求，就等于为更大范围的恐怖活动打开了大门；“人质换罪犯”，这种事不能答应。应急班子会议形成僵局，只好不欢而散。

佩雷斯满怀羞辱。拿不出可行的军事行动方案，不进行谈判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回到办公室已是半夜，他不假思索地叫来了总参谋长古尔、行动总指挥库蒂·亚当和空军司令本杰明·佩莱德将军，要三人立即提出自己的营救方案。

古尔依旧是那套“越湖计划”，没说两句就让佩雷斯打断了。接着是亚当将军，他建议与法国航空公司取得联系，派两架法航飞机去恩德培：一架空飞机装运被劫持的人质，一架飞机载着劫持者要求释放的人质；后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全由以色列特种部队成员装扮而成，一旦劫持者登机要求飞往新的地方，就立即把他们制服。

佩雷斯深思了一会儿，认为这一方案漏洞太多：在巴黎那种各色情报人员荟萃的地方，要想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沉思之中，他抬起眼皮看了一下空军司令佩莱德。

佩莱德显然明白该轮到自已发言了，但说起话来却有点儿让人觉得自言自语的味道：“或许我们可以空运1000名士兵去恩德培，控制机场，干掉劫

持者，救回人质。我们现在装备的大力神运输机完全可以执行这样的任务。”

这是劫持事件发生后第一次提到以控制机场为解救人质先行条件的方案，佩雷斯听了顿觉眼睛一亮。他指示佩莱德立即与伞兵部队司令达恩·肖姆隆将军共同研究实施计划，并将以外交手段为主之方案定名为 A 计划，将机场营救方案定名为 B 计划。

1976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

上午 8 时 30 分，佩雷斯在办公室召见巴鲁克·巴列夫上校等三位曾任职以驻乌干达军事使团的退役军官。巴列夫上校告诉佩雷斯，尽管与乌干达总统阿明尚未直接通话，但经研究认为：

(1) 阿明已表示愿意充当动机者与以色列之间的调停人；因其目的是提高自己的国际声望，所以会劝说动机者延长最后期限。

(2) 作为残忍的独裁者，阿明在国内外很不得人心；如果以色列采取军事营救措施，伤及乌干达士兵，在乌境内和国外部不会引起强烈反响。

(3) 乌干达军队不堪一击，以色列军队可以采取以精胜多的战术。

佩雷斯听罢，打心眼儿里佩服巴列夫上校的洞察力。他叫来副官，下令在国防部为巴列夫上校设立临时专用办公室，安装专线电话以利与阿明保持联系。

巴列夫上校不久就与阿明沟通了。巴列夫按照事先的布置以私人身份劝阿明想尽办法释放人质，但阿明却要求巴列夫转告以色列政府接受劫机者提出的条件。阿明还煞有介事地告诉巴列夫，机场上已埋了地雷，被劫飞机上也捆了炸药，想用武力办法营救是不可能的。巴列夫听后告诉佩雷斯，他相信阿明是在撒谎，并且更说明恩德培机场并非戒备森严。巴列夫的一番话使佩雷斯进一步加强了武力营救人质的决心。

傍晚，内阁应急班子再次开会讨论处理人质危机的对策。佩雷斯只汇报了巴列夫上校与阿明通话的内容，没有讲营救方案拟订的进展情况，因为他从来就不愿意把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方案在人们面前摊开。

拉宾总理的反恐怖问题顾问、预备役将军里赫文·茨维向应急班子成员汇报了一旦政府寻求与劫机者妥协时释放在押巴勒斯坦犯人的方案，并说为不突出以色列，需要请法国政府出面把情况告知劫机者。佩雷斯对此并不十分积极，他深知应急班子中只有自己与法国政界人士私交最深，要说请法国政府帮助，还要打着他的旗号去周旋，结果会削弱自己在公众中不向恐怖分子妥协的形象。会议只决定吁请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教皇保罗六世从中斡旋，又在无实质性决定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1976 年 7 月 1 日，星期四

7 时 45 分，内阁应急班子再次召开会议。首先得到的消息是：劫机者在前一日下午 2 时释放了 48 名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非犹太人乘客。这些被释放者返回巴黎后告诉记者，在恩德培机场，犹太人质与非犹太人质是分开关押的，显然劫机者已把矛头指向了以色列。

怎么办？到下午 2 时这个劫持者规定的最后时间已没几个小时了！拉宾再次提出接受劫机者的条件，佩雷斯又一次硬着头皮强调要寻找其他挽救人质生命的办法。为了缓和争论，佩雷斯提议把老部下本一纳坦派往巴黎，游说法政界与劫机者联系，争取释放全部人质而不是仅仅交还非犹太人乘客。佩雷斯的建议得到批准，会议暂时休息两个小时。佩雷斯抓紧时间赶回设在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办公室，打算听听巴列夫上校又从阿明那里得到什么信

息。

阿明在通话中告诉巴列夫：“转告你们政府，今天下午 1 时将有关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重要声明广播。这就是我给你的唯一回答，有什么事听了声明后再联系。”佩雷斯得知后心中略有些塌实，既然劫持者有重要的话还没说，最后期限就有可能延长，这将为武力营救人质争取到最宝贵的东西——时间。

返回耶路撒冷后，佩雷斯在复会上表示同意与劫机者进行谈判，但强调这只是争取时间的战术性安排。他甚至还要求参加会议的人“立字为据”，以防未来有人从中挑拨。就在这时，广播中传来了劫机者发表的声明。

劫机者宣布，除了以色列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犹太人和法航机组人员，他们将释放 101 名人质；他们还决定把最后期限延长 72 小时，改在 4 日（星期四）下午 2 时，“如果届时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还未得到释放，人质将相应受到处置。”时间有了，但劫持者的矛头已完全对准了以色列。大家面面相觑时，也把眼光投到了佩雷斯身上——为什么武力营救计划还拿不出来？

佩雷斯回到办公室，叫来古尔、佩莱德和情报机关摩萨德的头子伊扎克·霍菲，询问计划拟定工作的进展。佩莱德瞟了霍菲一眼，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地说：“你不能让我扮演詹姆斯·邦德，飞机着陆后，抓住一个警卫人员，问他人质关在哪儿，然后去救人。”佩雷斯再清楚这位空军司令不过了。他知道此人心中已有方案，问题是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以及必要、可靠的支援系统。

佩雷斯把脸转向霍菲，要这位摩萨德头子谈谈他所应当提供的情况。佩雷斯被告之，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当日已从肯尼亚潜入乌干达。

霍菲还告诉佩雷斯，由于阿明曾派人企图谋杀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肯尼亚当局已表示对以色列的营救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佩雷斯感到事情已开始运作了，挥挥手向三位道别，然后拿起电话与在巴黎的本一纳坦联系。在电话中，佩雷斯告诉本一纳坦：“今晚你要是与哪位法国妞会面，调调情就行了，千万可别脱衣服上床。”作为长期跟随佩雷斯来往巴黎的以色列使者，本一纳坦明白，现在要照旧与法国人交涉，不要让外界看出一点儿破绽，“好戏”要在劫机者不防备的情况下开场表演。

1976 年 7 月 2 日，星期五

从清晨开始，一条一条的情报和消息就不断地传来：

以肖姆隆将军为地面总指挥的特种部队已经组织完毕，营救分队的指挥官是乔那桑·内塔尼亚胡中校……

由于 1972 年 3 月断绝外交关系前以色列一直在帮助乌干达训练它的空军，所以对恩德培机场的跑道情况、建筑物位置了如指掌。在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依赫，营救分队已在一座军用机场内实兵演练救出人质的行动方略……

摩萨德传来准确情报，被动持的犹太人质被关押在恩德培机场旧候机楼一层，法航机组人员被关在该层女厕所内，共有六男一女劫机者负责看押他们，楼外由乌干达士兵守卫……

中午 12 时 15 分，佩雷斯向内阁成员大致汇报了营救人质的准备工作，但没有涉及任何可能泄密的细节。部长们所担心是营救行动能否成功，这一点佩雷斯尽最大努力作了有利的解释。不过也有不少问题没有回答，会议一开始就定下了规矩：如果解释人认为涉及机密，可以拒绝回答。

最需要保密的时刻是在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的外交顾问布热津斯基教授正在以色列访问，指名点姓要会见佩雷斯。在晚饭桌上，这两位波兰出生的政治家用他们的母语开始了谈话。话刚一谈得投机，布热津斯基便问佩雷斯：“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用军事手段营救在恩德培的人质呢？”佩雷斯心中一颤，但面无表情，用他早已想好的对策一一列举了采取军事行动困难，尔后告诉客人，这就是军事行动不能付诸实施的原因所在。美国客人相信了佩雷斯的话，两天后才知道这是他的以色列籍波兰裔同胞所设的圈套。

1976年7月3日，星期六

佩雷斯清晨6时15分就来到办公室，立即打电话给营救行动总指挥佩莱德将军询问情况。空军司令再次确认了整个作战和支援分队的组成：

作战分队共180人，分乘四架大力神飞机：

1号机，肖姆隆将军和内塔尼亚胡中校率领的营救分队搭乘，负责袭击候机楼，保护人质；

2号机，火力压制分队搭乘，负责对付乌干达部队；

3号机，破袭分队，负责摧毁机场上的乌空军战斗机；

4号机，加油机。

支援分队由佩莱德率领，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机场待命，共两架波音—707分机：

1号机，由佩莱德率领，负责指挥、通讯工作；

2号机，医疗机，共33名医务人员负责抢救伤员。

上午7时40分，总参谋长古尔将军来到佩雷斯的办公室，汇报了他亲自乘坐大力神飞机和观看营救分队实兵演习的情况，肯定行动能取得成功。

上午9时15分，军方将领在佩雷斯办公室举行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重申要在55分钟至1小时内完成从着陆到重新起飞的全部行动。

上午10时整，佩雷斯和军方将领又来到拉宾总理的办公室。古尔将军简要地汇报了营救行动的每一个步骤，同时摩萨德特工人员也从肯尼亚发回消息，说明一切都与想定情况所差无几，现在就等拉宾最后下令实施计划了。

照理说，拉宾的命令要等内阁会议批准后才能正式下达。然而，鉴于全体行动人员需11时30分从本—古里安机场出发，到沙姆沙依赫集中，拉宾口头授权古尔将军开始行动，先期运作。

下午2时30分，内阁全体成员开会讨论批准武力营救人质计划问题。那些一生一世除了做生意时懂得珍惜时间的犹太部长不知道为什么对批准书的措辞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反反复复地争论不休。

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就到了下午3时半。佩雷斯的副官走了进来，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们已经起飞了。”佩雷斯扫了一眼，转手把条子递给了拉宾。拉宾在手中摆弄了一会儿，趁着一位部长刚刚结束慷慨陈词的空儿，向全体阁员宣布了行动已经开始的情况。就这样，内阁一致通过了“第819号决定”，上面说：“根据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参谋长所拟定的计划，批准以色列国防军营救在乌干达的人质。”短短一句话，竟然耗费了部长们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下午5时40分，佩雷斯赶回特拉维夫，但没有立即前往行动指挥所。为了保守秘密，他还去参加了一位老友孙儿的割礼仪式。夜里11时，他准时来到指挥所。特种部队出发后一直保持无线电静默，现在是依计划联络的时候

了。

夜间 11 时 03 分，安装在指挥所墙角的扬声器传来了肖姆隆将军的声音：“第一架飞机已经安全着陆。”整个房间依旧保持沉默，每个人都屏着呼吸，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11 时 10 分，又从扬声器里听到了肖姆隆的声音：“一切正常，其他容后再报。”随后是一阵嘈杂声，搞不清是无线电的噪音，还是激战中的枪炮声。

11 时 18 分，又传来一句活：“退潮。”这是暗语，说明四架飞机都已着陆。

11 时 28 分，佩雷斯等人听到：“一切正在按计划执行，我们将随时汇报。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

11 时 29 分，又传来一句暗语：“巴勒斯坦。”佩雷斯明白，营救分队正在控制整个老候机楼，人质已“抢”到了手。

11 时 32 分：“杰弗逊。”这意味着已开始撤退人质。

11 时 33 分，佩雷斯听到了“交替后撤”的命令声，这意味着营救分队也开始后撤了。

到底在恩德培机场发生了什么？

当晚 11 时，假冒英国航空公司民用飞机的大力神 1 号机顺利地恩德培机场着陆。内塔尼亚胡等突击队员搭乘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冲出机舱，直驶旧候机楼。机场上的乌干达士兵还以为来者是他们的阿明总统，让开道路，这使营救分队迅速地冲进了目的地。待到乌方士兵反应过来时，2、3 号机已经着陆，压制分队和破袭分队立即用火将力将他们抑制起来。

11 时 50 分，佩雷斯等人在总部听到了特种部队传来的第 8 个信号：“火力支援‘施凯丁’。”这说明内塔尼亚胡的营救分队已完成消灭劫机分子的任务，开始从旧候机楼撤退。“两个‘雅克特里那’。”这说明有两名队员已经负伤。整个指挥所里没有一个人动一动，连呼吸的声音都难以听到。

11 时 51 分，又是一个信号：“骆驼山。”佩雷斯明白，撤退工作已全部完成，飞机正准备重新起飞。他只觉得心中蹦出一丝喜悦，但没有带动起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11 时 56 分，肖姆隆将军传来了自己的报告词：“共救出 94 名旅客和 12 名法航机组人员，总数为 106 人。”

深夜 11 时 59 分，肖姆隆又喊话说：“纠正一下，这里只有 93 名旅客，因为有 1 人已被送往医院。”

0 时的钟声响了，佩雷斯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直到古尔将军打来电话，叙述战报详情后，他才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1976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

凌晨 1 时，佩雷斯派人找来巴列夫上校，说急切想知道阿明对恩德培营救的反应，于是巴列夫拨通了电话。

一开口，巴列夫半带揶揄地对阿明说：“先生，我应当对您的合作表示感谢。”

“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我刚从外面回来，是赶回来的。难道在最后期限前已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了吗？”阿明急切地问。

“我不知道，”巴列夫朝站在身边的佩雷斯挤挤眼儿，“只是有一位在政府的朋友要我转达对您合作的谢意。”



“好，别忘记告诉他在最后期限前拿出解决方案来。”阿明又重复了一次。

“谢谢，再见！”巴列夫搁下电话，高兴地对佩雷斯说：“不可思议！总统府距机场三公里，行动完成了一个小时，阿明居然什么也不知道？不可思议……”

清晨6时，以色列广播电台宣布了“恩德培营救行动”获得成功的消息，一下子震惊了整个世界。以色列人似乎都长高了一截：他们在六·五战争胜利后曾有过长时间的骄傲和自豪，但在十月战争初期又蒙受了灾难般的恐慌和耻辱，“恩德培营救行动”使他们觉得吐了一口气，给了他们所惧怕的恐怖分子以沉重的一击。

“恩德培营救行动”的英雄是战斗中死去的乔那桑·内塔尼亚胡中校。以色列国防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授上校军衔。新闻界在报道内塔尼亚胡事迹的同时，也把采访焦点瞄准了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没想到这进一步加深了佩雷斯与拉宾之间的矛盾。既然内阁“第819号决定”明确说明营救计划是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拟定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佩雷斯是这次决策中的主角，而拉宾不过是最后签了字罢了。再加上拉宾政府上台后难以应付十月中东战争所遗留的财政赤字扩大、失业增多的恶性势头，民意测验中拉宾的得票迅速降低，而佩雷斯的赞成率却直线上升。到了1976年年底，与工党联盟合作的民族宗教党退出了与工党的合作，拉宾只好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时间定在1977年5月17日。

## 第十二章 领袖，但是反对党……

以色列的政治制度颇为奇特，议员不是分选区竞选，而是把全国合为一个选区，由每个党按照本党候选人的地位列出一张名单，选民根据名单投某个党的票。换言之，要进行大选，每个党要先行投票，选出党内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排成名单参加选举。

工党是 1977 年 2 月 23 日进行党内选举的，这也意味着拉宾和佩雷斯为争党的领袖又有一番好斗。选举的结果，拉宾得了 1445 张票，佩雷斯得了 1404 张票，佩雷斯仅以 41 票——实际上是 21 票之差再次屈居第二把交椅。比起上次选举所得 47.1% 的票，这次的支持率已上升到 49.3%，佩雷斯心中多少有了一些满足感。

拉宾虽然再度当选工党领袖，但要使他的党在大选中取得继续执政的地位，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右翼势力结成的利库德集团人望已有所上升，前总参谋长伊加尔·亚丁建立的民主变革运动也在迅速吸引支持者。然而，最使工党担心的事情是，担任公职的工党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揭发存在受贿等腐败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工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1976 年秋，原以色列银行行长摩西·桑巴尔任满卸任，拉宾任命工党所属的以色列总工会保健基金会负责人阿瑟·亚德林接任。谁知拉宾的任命宣布不久，报纸上就揭发说，亚德林曾多次从基金会合同商那里接受回扣。于是亚德林被诉诸法庭，最后判刑入狱 5 年。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被判有罪的资深政府官员。祸不单行，到了 1976 年年底，报刊又揭发工党成员、当时担任住房部长的阿夫拉罕·奥弗尔有腐败行为。尽管奥弗尔矢口否认有这类问题存在，但 1977 年 1 月 4 日，人们在特拉维夫以北的·提尔贝鲁克海滩上发现奥弗尔躺在自己的豪华沃尔沃轿车边，手中拿着一支手枪，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身边还有一张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

奥弗尔自杀事件在以色列全国引起震惊，工党的人望也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拉宾和佩雷斯都希望事态能尽快平息下来，以便能在 5 月份的大选中尽量为工党多争一些议席，但新闻界穷追不舍，不久又揭出影响更大的丑闻。

1977 年 3 月 15 日，记者丹·玛格丽特在《国土报》披露，拉宾总理的夫人莉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银行开有美元帐户，这是违反当时的以色列通货法的。不久，报界又揭露，在开立这一帐户时，拉宾也在上面签了名，因此帐户应被叫作“拉宾—莉赫帐户”。在采访中，拉宾承认这一帐户的存在，但补充说，帐户内的存款总额只有 2000 美元。

一般说，此类罪过的严重程度是以所涉及的款额来衡量的。如果款额总数不超过 5000 美元，违法者通常不会受到严格的追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总检察长阿哈隆·巴拉克在受理此事时安慰拉宾说：“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然而，当巴拉克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求拉宾出示银行帐单时，问题发生了。拉宾显然没有说实话：他们夫妇在美国银行所开的帐户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款额总数不是 2000 美元，而是 23000 美元。巴拉克怀着失望的心情告诉拉宾，尽管拉宾本人可以不知详情为由免于起诉，但他的夫人无论如何要接受法庭调查。

1977 年 4 月 7 日晚，整个以色列都在观看卫星转播的特拉维夫马卡比篮

球队在欧洲篮球杯比赛中同意大利队对阵的电视节目。佩雷斯看了一会儿，感到有些疲乏，对妻子索尼娅道了一句别，先回卧室睡觉了。但他刚铺完床，索尼娅突然跑进来。“决来，看电视！”她说。

“哪个队胜了？”佩雷斯慢腾腾地问。

“不，不，”索尼娅显然急得有点儿说不出话来了，“是拉宾……”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拉宾苍白和沮丧的镜头。他显然有些激动，但还是以平静的口气宣布：他已决定辞去总理和工党领袖的职务。索尼娅看了看自己的丈夫，但佩雷斯脸上毫无表情。没说一句话，两人回卧室休息了。

根据拉宾的提议，佩雷斯在大选前代行总理职责。4月21日，佩雷斯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党的领袖。经过近30年的个人奋斗和几年来与拉宾不停顿的“磕磕碰碰”，佩雷斯终于走上了人生理想的最高位置。然而，他所接受的“遗产”是苦涩的，难道能设想出现奇迹吗？

1977年5月19日，以色列第9次全国大选结果揭晓，工党联盟从上届取得51个议席猛跌为32席，而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利库德集团取得了43个议席。以色列建国29年来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的工党第一次退居次位，面对国家警卫部队从工党总部移防应当产生内阁总理的利库德集团总部的场景，佩雷斯心中怀有无限的酸楚。他总算走到了党的领袖的位置，但党却成了无权执政的反对党。

以色列议会共有120个议席，利库德集团若想执政也需与其他党派进行组合。贝京曾拜访过佩雷斯，讨论联合执政的可能性。但佩雷斯觉得双方分歧太大，没有答应贝京的要求。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贝京釜底抽薪，打起工党某些资深政治家的主意来。

5月下旬的一天，摩西·达扬打来电话，以一种严肃而又确定性的语调告诉佩雷斯，他已决定接受贝京的邀请，出任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达扬解释说：“我认为，这是我为国效力的最佳途径……我并没有把这一决定首先告诉你，是因为我要防止有些人把这一决定说成是我们两人密谋的结果。”

佩雷斯对达扬的一番话几乎未作任何回答。自从政以来，他在每一次关键的场合总是站在达扬方面，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得失。然而，就在他处在最困难的时候，达扬却站在了对立面一方，这使他感到十分沉痛。不过，5月26日会见美国新任驻以大使塞缪尔·刘易斯，当后者问及达扬入阁贝京政府能否有助和平进程时，佩雷斯还是回答“会的，他是一个真诚而又具有灵活性的思想家”，没说一句达扬的坏话。佩雷斯感到沉痛，但内心并不仇恨达扬。

1977年6月20日，贝京正式组成了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新政府。两天后，佩雷斯向新任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交接工作。当他坐上离去的汽车，看到送行的军人们向他敬礼时，忍不住潸然泪下……

然而，大选的失败并没有使佩雷斯消沉下去。经过短暂的反思后，佩雷斯开始集中精力料理工党内部事务。首先，他会同前财政部长雅胡沙·拉比诺维奇等人一同整顿党的财务状况，清偿了债务，为活动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其次，他又通过建立俱乐部等方式收拢已经人心涣散的党的基层活动分子，恢复了各地区组织的活动。“无官一身轻”，闲暇之时，佩雷斯还阅读了不少书籍，在知识界也结交了一些新朋友。

1977年11月，佩雷斯和夫人索尼娅应美国犹太人联合募捐会的邀请赴美访问。18日这一天，两人搭乘飞机从夏威夷前往洛杉矶。在洛杉矶机场，

佩雷斯见到了专程前来等候他的以驻洛杉矶总领事。总领事报告说，刚刚接到国内电报，埃及总统萨达特将于次日开始他对以色列的访问，国会要他立即返回。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同埃及实现和平对于确保以色列的“生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就是工党内阁为何同意与埃及签订“脱离接触协议”和“过渡协议”的主要原因所在。贝京政府上台后，以色列先后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印度总理德赛得知，埃及总统萨达特希望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以摆脱战争给埃及带来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先贝京政府几个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急切希望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也采取各种措施促使以色列和埃及开始直接的和平谈判。1977年11月9日，萨达特总统在埃及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为了使埃及的儿童一个也不在战争中死伤，他准备到以色列议会去，“向议员们解释阿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萨达特的讲话在以色列引起震动，贝京在反复考虑后，向埃及总统发出了访问以色列的邀请。

得知国会要求其立即返回的消息，佩雷斯并不感到吃惊，因他在登机前已获悉萨达特将访以的情况。然而，由于得到通知太晚，他赶到纽约时已是次日凌晨，所有飞越大西洋的班机都已离去。有幸的是，一架以色列的货机正待返航，佩雷斯夫妇于是就登上了这架飞机。坐货机对佩雷斯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索妮亚来说却是头一遭。

飞机返回以色列后，佩雷斯又得知，他不仅受邀在议会听取萨达特的演讲，还需代表反对党在议会致辞。为此，他利用还剩下的几个小时亲自起草发言稿，还请后来担任以总统、工党内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伊扎克·纳冯为他在《古兰经》中找了几段可供引用的语录。

11月19日傍晚7时58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专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同一位以色列诗人的话说，“一个为了新一代人的时代开始了”。

佩雷斯作为重要人士参加了以色列方面接待萨达特的活动。

用达扬的话说，他在议会以反对党的名义所作的致辞“也很精彩”。但一想到萨达特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与贝京拥抱的场景，佩雷斯的心情就不能安定下来。他相信，只要贝京政府同埃及缔结和平条约，这个政府就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下去，而工党则无缘重新执掌政权，为了尽早重新成为“在朝党”，他决心介入埃以间的和约谈判。

在萨达特结束对以色列的“历史性访问”后，埃以代表开始进行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两方面：（1）埃及要以军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去，以色列则只承认有一条“国际公认的边界”，换言之，双方在边界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2）埃及要求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拒绝这样做。

埃以会谈进行到1978年1月底陷入僵局。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向佩雷斯发出邀请，打算安排佩与访美后途经奥的萨达特会一次面，了解一下谈判陷入僵局的症结所在，这给了佩雷斯一个介入埃以和谈的机会。

1978年2月10日，佩雷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见到了萨达特。谈话一开始，萨达特就告诉佩雷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喜欢非正式的、朋友般的谈话。”这使谈话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融洽。萨达特抱怨说，埃以谈判陷入僵局，这主要是由于贝京不肯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定居点问题上作让步，而且还因为以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设置了一道“避而不谈”的墙。说到最后，

萨达特提到了本一古里安，说他才是一个“敢做重大决定的政治家”。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称赞本一古里安，佩雷斯心中就会感到无限自豪，因为他本人就是在本一古里安一手栽培下成长起来的。他原想从一个以色列政治家的角度对萨达特所讲有些问题作一番解释，但考虑到初次见面，就只说了愿把埃及方面的意见转达给北京政府之类的话。

回到以色列后，佩雷斯面见北京，如实地转达了萨达特的看法。北京彬彬有礼地对此表示感谢，还对佩雷斯此次奥地利之行说了一些恭维的话。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两人用如此平和的语言互相沟通情况。

为了更进一步参与埃以和平进程，佩雷斯3、4月间还出访了罗马尼亚、加拿大和美国，结识了不少这些国家的政界人士。然而，在同时，萨达特同北京之间的谈判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在某些地方还出现倒退。埃及方面要求在和约中加入有关西岸问题的原则声明，以色列代表则强调埃以间的和平与西岸问题无关。一怒之下，萨达特宣布中止谈判，并拒绝接待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埃以和平进程出现了“危机”。

北京政府不仅在对外关系方面碰到“危机”，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有传言说，北京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必须靠吃药来稳定自己的情绪。报纸上已经出现了要求更换政府的言论，佩雷斯和他所领导的工党自然也就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注意。

就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打电话给佩雷斯，表示对目前的埃以和平进程非常关心，并认为此时佩雷斯与萨达特的会面将有助于这一进程的推进。6月30日，克赖斯基再次打电话给佩雷斯，告诉他奥地利方面与埃及总统联系的情况：萨达特愿意参加一个“四边会面”，不仅有他自己和佩雷斯，还有克赖斯基和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佩雷斯觉得，如果他拒绝克赖斯基的建议，他的工党将会失去一个与利库德集团一较高低的机会。他答应奥方说，他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四边会面”，但此事要先经北京同意。

佩雷斯按约定时间赶到耶路撒冷北京家中时，北京正忙着做接待美国副总统的准备工作。他告诉佩雷斯，他不反对佩雷斯去见萨达特，但建议佩先与达扬谈一谈，以便协调朝野两党的立场。

佩雷斯与达扬约好了两天以后正式谈一谈，没想到之中出了麻烦。报界披露了佩雷斯将与萨达特会面的消息，人们都怀疑这是埃及总统为向北京施加压力而故意透露出来的。达扬为此在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激烈抨击佩雷斯，说埃以外长已定于7月底在伦敦会谈，佩雷斯与萨达特的会面显然是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这是达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指责佩雷斯，佩雷斯感到既气愤，又有些困窘。他没有直接回应达扬，而是找到了北京，质问后者为何不反对与自己同萨达特会面，却又纵容阁员在议会发起“攻击”。北京回答说，“不反对”并不意味着“欢迎”，事实上他认为这次会面根本没有必要。

佩雷斯恼火透了。他召集工党政治委员会开会，下决心，倘若有一名成员有不同意见，他就取消与萨达特的会面。历来的政争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包括梅厄夫人在内的政治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致赞同佩雷斯与萨达特会面。就这样，佩雷斯于7月8日来到维也纳。

奥地利政府为“四边会面”提供了国宾式的礼遇，客人不论是不是在朝的领导人，出入都由摩托车队开道。会面是在总理府大厅举行的，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会议所使用的场所。克赖斯基和勃兰特仅仅是礼节性地参加

了会面，除了记者招待会和宴会上出场，他们把时间都留给了佩雷斯和萨达特。

萨达特告诉佩雷斯，尽管美国总统卡特多次要求他同贝京和达扬重开谈判，但他还是拒绝了。他觉得贝京和达扬满脑子装的都是上一代人的思想，好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无法真正实现和平共处。萨达特说，他自己的岳母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且长期与他们夫妇住在一起。从生活的经历中他相信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只可惜贝京和达扬不这样考虑巴勒斯坦人。

虽然内心中不是这样想，但佩雷斯还是决定为贝京和达扬说几句好话。佩雷斯告诉萨达特，达扬过去在开通西岸前往约旦“通道”的问题上是持积极态度的，贝京在被占领土自治问题上也作过让步。说着，佩雷斯掏出一份联合声明草案供萨达特过目。这份草案是在克赖斯基和勃兰特参与下起草和修改的，也是这次“四边会面”所要达成的主要文件。

萨达特叫副官拿来老花镜，仔细地揣摩文件用词的含义。佩雷斯临时请埃及总统把“恢复接触”一句改为“恢复萨达特开创的进程”，此外两人未再作任何修改。这一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维也纳文件”，除呼吁重开谈判外，还有两点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文件同意“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确定有关边界”，也就是恢复1967年以前的埃以边界状况；二是文件声明，“为了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有关方面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有权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参加谈判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尽管这一文件既无法律约束力也不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突破，但它毕竟是埃以和平进程停顿数月后又刮起的一场可能吹绽鲜花的春风，所以在国际舆论界也产生了重大反响，克赖斯基和勃兰特也因此获得不少赞誉。

或许是英国首相卡拉汉和外交大臣欧文不愿落在德、奥领导人后面，他们把佩雷斯从维也纳请到了伦敦。到了伦敦佩雷斯才知道，约旦国王侯赛因其时正在英国，卡拉汉有意安排二人会面，以期在约以方面取得一些突破，“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侯赛因是佩雷斯的老相识，这次又愿意同佩雷斯谈谈在西岸实行约以行政共管的问题，但佩雷斯却坚持要先取得贝京的同意。佩雷斯相信贝京不会让自己出这个风头，后来得到的消息果然是这样。当佩雷斯最终告诉卡拉汉他无法会见侯赛因时，这位英国首相显得颇有些疑惑不解。

其实，佩雷斯早就约定好要秘密会见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他离开伦敦后到了巴黎，7月17日和18日两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记者们被告之，由于旅途疲劳，佩雷斯要在某个僻静之处休息几天。事实上，他在法国政府的安排下乘飞机前往北非的拉巴特，去会见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

佩雷斯与哈桑二世见面并不构成以色列外交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在阿拉伯世界中，摩洛哥对境内的犹太人算得上是比较宽容的。拉宾担任总理时，曾于1976年秘密访问摩洛哥，其后双方也一直保持着接触。在拉巴特王宫中，哈桑二世与佩雷斯探讨了埃以谈判危机、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大国间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两人对这次会面都感到颇为满意。

7月18日晚佩雷斯返回以色列，第二天就碰到议会辩论西岸问题。贝京在发言中拿着一张登有维也纳联合声明的报纸，指斥为“拿领土作妥协”，然后愤怒地将报纸一撕为二。

北京的举动使佩雷斯感到十分气愤，站起来打断北京的谈话，说，“我没有指出这一文件的要点前，你的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然而，北京就好像没有听到佩雷斯的讲话似的，继续他的发言。佩雷斯觉得尴尬，无形中也凭添了几分气恼。

中午休会时，北京在走廊里碰到佩雷斯，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客客气气地对他说：“我们在一块儿吃午饭好吗？”

就这样，两人一同到议会餐厅就餐。席间，佩雷斯平心静气地向北京解释了“维也纳文件”得以达成的背景和基本思路，还讲述了他秘密访问摩洛哥的详情。北京在席间倒没有说什么，但下午就向新闻界透露了佩雷斯访摩一事，并把它描述为一种“乞讨般的旅行”。佩雷斯觉得北京的举动完全是“小人的伎俩”，因此打消了他原来企图在埃以和平进程方面开展两党合作的想法。

欧洲国家在埃以和平进程方面的主动行动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总统卡特，在国务卿万斯 1978 年 8 月中东“穿梭”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他于 9 月把萨达特和北京请到距华盛顿不远的美国总统休假地戴维营，力图使双方在谈判中取得全面突破。

经过 12 天曲折跌宕的讨价还价，萨达特和北京终于在卡特的劝说和压力下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埃以和平条约的纲要》，统称“戴维营协议”。前一个纲要规定：在埃以缔结和约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军在二到三年内从西奈半岛撤退到“国际边界”之后。后一个纲要规定：由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商定在西岸和加沙建立自治机构的问题；经大家同意的巴勒斯坦人可在埃及或约旦的代表团内参加谈判；以军将重新部署到指定的安全地点，而获得自治的巴勒斯坦人将拥有“合法的权利”。

与萨达特同佩雷斯签署的“维也纳文件”不同，“戴维营协议”并没提“恢复 1967 年以前的埃以边界”，而代之以所谓“国际边界”，这主要因为北京政府认为埃以边界靠红海的塔巴地区依以往的“国际边界”属以色列所有，而在 1948 年后为埃及所占领（后经国际法院裁定，塔巴地区归埃及所有）。“戴维营协议”与“维也纳文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答应未来赋予巴勒斯坦人以“合法权利”，而后者则同意巴勒斯坦人有权通过谈判来决定他们的未来。两个文件相比，“戴维营协议”显然作了更有利于以色列的规定，因此北京政府在国内的人望也有所提高。工党原希望通过推进埃以和平进程加速重新执政的可能，但“戴维营协议”破灭了他们的幻想。

出于政党斗争的需要，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要求本党议会党团在批准“戴维营协议”问题上给北京政府设置障碍。阿隆等人就提出，鉴于协议规定要拆除以色列设在西奈半岛的定居点，这将给以方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所以，工党议会党团应要求把有关拆除定居点条款从总协议中分离出来单独表决。佩雷斯虽然因利库德集团在埃以谈判中占了先手而感到气恼，但他不赞成为党派之争而拒绝批准“戴维营协议”。他告诉党员：“我们不是在一个好协议还是一个坏协议之中进行选择，而是选择和平的机会还是回到战争状态中去。”在他的努力下，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赞同批准协议，这使得“戴维营协议”得以在以色列议会顺利获得批准。1979 年 3 月 27 日，萨达特和北京又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卡特的主持下签订了埃以和平条约。在 30 余年的战争风雨过后，以色列终于同它的一个阿拉伯邻国实现了和平。

佩雷斯作为以色列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也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仪式结束后，萨达特表示愿同他进行一次私下会晤，于是两人在次日见了面。在签约的当天晚上，美国前国务卿也专门宴请了佩雷斯。虽说这两次会面都没谈什么实质性问题，但经新闻界报知公众，多少也替佩雷斯和工党挽回了一些面子。

正当佩雷斯准备重整旗鼓、与利库德集团再决高低时，麻烦又从工党内部冒了出来。早在几个月前，佩雷斯就得知拉宾所撰写的回忆录已付梓准备出版，也料到其中必有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回国不久，拉宾的回忆录问世了。出佩雷斯预料之外，拉宾在书中讲到担任总理后的情况时，几乎处处都夹杂着对佩雷斯的攻击。拉宾指责佩雷斯觊觎他的总理职位，嘲笑佩雷斯连当国防部长都不称职，更何况干总理了。拉宾还发誓说他今后决不再在佩雷斯当头儿的政府中任职。这些指责与其说没有任何事实作证据，还不如说作者根本就没能举出证据来。

由于拉宾的自传成了利库德集团攻击工党的武器，工党联盟行政委员会于1979年7月12日召开会议，讨论对拉宾著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对策。与会者质问到场的拉宾：既然拉宾认为佩雷斯在德才方面都不足以充大任，为什么因夫人外汇存款丑闻下台时还要提议佩雷斯代行总理职务？为什么在后来的大选中又赞成佩雷斯做党的领衔人物？前司法部长哈伊姆·扎多克指出：拉宾的书损害的不是佩雷斯的名誉，而是自己的威望和工党的人心。

按照会议上激发起来的情绪，佩雷斯完全有条件使工党行政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谴责拉宾破坏佩雷斯和工党名誉的行为。但佩雷斯却一时缺乏果断性，致使对拉宾的“反击”并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

佩雷斯的这种做法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基层党员在没有看到党的决议的情况下，误认为拉宾的自传纯粹是佩雷斯与拉宾意气之争的结果——拉宾固然不怎么样，但佩雷斯也未见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工党的另一个著名人物阿隆站出来，宣布他准备竞选工党领袖。

对佩雷斯来说，党内的斗争真可谓“一波未伏、一波又起”。面对阿隆的挑战，他只得硬着头皮又进行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然而，斗争开始不久，阿隆就因心脏病突发而于1980年2月2日去世。佩雷斯总算躲过一场党内“恶战”，只是不少过去阿隆的属下因派别之见投到了拉宾的门下，这使他感到颇为遗憾。为了使党内纷争有所缓和，佩雷斯决定把矛头引向党外，因此他提出争取提前大选的口号，换言之，就是要创造一种使贝京政府任期未满而不得不下台的形势。为此，他于1980年4月访问美国，希望从这个以色列最大的“施主”那里取得一些支持。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企图连任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也希望从盟友那里取得某种支持。“戴维营协议”签署后，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中遭到激烈抨击，阿拉伯联盟总部也从埃及迁到了突尼斯。除埃以之间关系发展尚属正常外，和平进程已经停滞下来。卡特告诉佩雷斯，如果以色列工党能和利库德集团中的埃泽尔·魏茨曼等人结成联盟，他相信“和平进程将会重新向前推进”。卡特这种故意不提贝京等人的话使佩雷斯深受鼓舞，相信这位民主党人再度当选后定能为工党在以色列重新执政伸出援助之手。然而，佩雷斯一回国，就发现工党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关系面临考验。右翼的泰西亚党议员果拉·科恩在议会提出议案，要求从法律上确认耶路撒冷作为一个统一的城市成为以色列的首都。

耶路撒冷旧城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1948年战



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该城西区，约旦占领了包括旧城在内的东区。1950年，以色列宣布迁都耶路撒冷，1967年又占领了整个城市。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是反对以色列将整个耶路撒冷城作为首都的。美国卡特政府在得知果拉·科恩提案后警告说，如果该议案成为法律、和平进程将会中断。将大使馆设在西耶路撒冷的11个国家中的大多数表示，如果该议案生效，它们将把使馆迁到大多数国家设馆的特拉维夫去。

然而，北京却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警告给了利库德集团一个机会。他宣布利库德集团支持果拉·科恩的议案，实际上是把球踢给了工党——你们不是与卡特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吗，那就请决定是否接受美国的警告吧！

北京踢来的球对佩雷斯来说确实是桩棘手的事。1967年战争打响后，以色列士兵冒死冲进耶路撒冷旧城，未等打扫战场，趴在犹太圣地“西墙”下放声痛哭——经过逾千年的背井离乡，他们又回到民族的发祥地，心灵与土地交织，哪个以色列领导人敢于把二者再分割开呢？佩雷斯和工党议员们最终对果拉·科恩的议案投了赞成票，但也遭到事前可以预想到的惨痛后果：世界各国几乎是一致严厉谴责，除洪都拉斯外，其他10个原在耶路撒冷设馆的国家都把大使馆迁到了特拉维夫。佩雷斯的美国之行不仅没有给工党执政带来希望，而且成了利库德集团的笑柄……

“外伤未消，内忧又患。”工党定于1980年12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但距会议不到两个月，拉宾写信给佩雷斯说：“我想通知你，我将参加工党大会并竞争党的主席职务。”一位佩雷斯的助手看了来信后说：“这意味着战争！”

的确，这是一场“战争”，而且“战火”还在不断扩大。11月22日，距各地工党机构选举代表还有三天时间，佩雷斯最得力的助手、年轻的政治学博士约西·贝林带来了更令人气恼的消息：法国《快报》杂志登载一则报道，说臭名远扬的特拉维夫“地下”建筑承包商贝特扎尔·米泽拉西在1977年贷给拉宾一笔款子，用以支付拉宾夫人因在美国开设非法帐户所交的罚金，而佩雷斯手中握有一张米泽拉西贷给拉宾夫人的支票的复件。换言之，报道希望读者理解：佩雷斯手中握着拉宾的短处，他会随时在竞选党的主席席位过程中把这张牌打出来。抓人家的小辫子，这是政治家所应有的道德吗？

拉宾抓住时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在简短地否定了法国《快报》对他与米泽拉西关系的报道后，一口气向记者们提出了好几点疑问：是谁把这样一种粗制滥造的谣言告诉给《快报》的呢？其意图何在？……到了最后，拉宾说了这样一句话：“要猜是谁，这并不难，当然不会是真正关心我的人。”

多亏约西·贝林提前得到消息。就在拉宾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同时，佩雷斯也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指责法国《快报》的歪曲性报道，并坚决否认自己存有一张贷给拉宾夫人款项的支票复件。结果，佩雷斯与拉宾的“政治战争”变成了分别接受记者采访的“防御战”，还真有一个人守不住“阵地”了。拉宾开始时告诉记者，为了替夫人支付罚金，他借了两笔钱，但都不是从米泽拉西那里来的。一笔钱借自一位亲戚，金额为7万以色列镑，到采访时已经还了；另一笔钱借自一位叫诺曼·伯恩施坦的美国朋友，金额为1万美元，当时还没有还。拉宾还向记者出示了他的存款簿，从上面的情况看，这位政治家存款几乎已到了“零位”。

然而，没过两天，报界就透露出一个新消息：拉宾在另外一家银行还有一笔存款，其数额相当7.3万美元，在一个老百姓看来，可真是一笔不小的

数字。人们不免要问，拉宾既然有钱，为什么还要向诺曼·伯恩斯坦去借？反过来说，这个美国人为何又这么大方地把钱借给拉宾？记者没能向拉宾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退却了……

党的代表会议的选举结果这下子是可以预测的了，但谁也没想到佩雷斯能以得到 71.12% 的选票大获全胜。在热烈的掌声中，佩雷斯走到讲台边，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就宣布他愿和拉宾言归于好。坐在一边的拉宾似乎是坐不住了，他走过来，伸出了自己的手……

### 第十三章 苦撑求变

佩雷斯再次当选工党联盟主席不仅增强了他自己的自信心，也鼓动起全党通过大选重新执政的情绪。利库德集团的经济政策连遭败绩，国内通货膨胀率连续三年直线上升。贝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伊加尔·赫尔维茨宣布辞职，贝京不得不于1981年2月19日宣布将原定于该年11月的大选提前到6月30日进行。

代替赫尔维茨出任贝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尤拉姆·阿里多尔系律师出身，以前从未有过理财的经历，但他一上任却推行了一条出乎人们预料的经济政策。

多年来，以色列的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以军火工业为主轴的产业方面，耐用消费工业品的生产几乎等于零。因此，轿车、彩色电视机和空调等商品全依赖于进口。保护性的关税和销售税使这些耐用消费品对中产阶级来说都成了奢侈商品，再加上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货币贬值，简直让人觉得成了可望不可即的东西。阿里多尔一上台，第一项措施就是宣布削减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和销售税30—40%，一下子刺激了国内的消费欲望，引起了购买潮。

阿里多尔的政策显然是利用在朝的有利地位为利库德集团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收买人心，人们也不难想到这一政策不可能持续很久。佩雷斯和工党的其他议员在议会向贝京政府提出诘难，但贝京和阿里多尔却诡称，这一做法旨在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来以色列设点开店，从而打破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经济封锁——政党政治被说成了为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正义之举。

消费者更多地是看中眼前利益，因此阿里多尔的减税政策取得了政治红利。在1981年4月举行的以色列总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这个有史以来一直是工党一统天下的地方竟然让利库德集团抢去了26%的位置。然而，利库德集团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又为大选的胜利迈出了新的步伐。

1981年6月7日黄昏，8架以色列空军的F—16战斗轰炸机携带16吨炸弹，在6架F—15歼击机的掩护下从南部沙漠中的军用机场起飞，沿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边境低飞进入伊拉克。飞机组合成密集队形，在雷达屏幕上就如同一架大型民用客机。机群飞临巴格达东南的塔穆兹，开始对一组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的建筑群实施轰炸，仅用两分钟就将整个目标夷为平地，然后迅速返航。

以色列空军所摧毁的，是根据1974年伊拉克与法国签订的核技术合作协议所建设的乌西拉克核反应堆。尽管这个功率为70兆瓦的核反应堆根据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但以色列许多人仍认为它是伊拉克发展原子武器的基础设施。6月8日下午4时，以色列广播电台宣布了摧毁乌西拉克核反应堆的消息，立即在国内引起一片欢呼声。贝京的利库德集团又为大选胜利赢得了一分。

佩雷斯在议会就轰炸行动的时机提出疑问：在大选前进行这次军事行动是必要的吗？贝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说国家情报机关已得到消息说，乌西拉克核反应堆将在7月份达到“临界状态”，如果那时再进行轰炸，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将对平民造成伤害。换句话说，轰炸是不得已而为之。

以色列的轰炸行为在国际上遭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激烈抨击，所以佩雷斯又从另一个侧面向贝京提出质疑。他指出，自从“以色列人的朋友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法国在对乌西拉克核反应堆的设备和原

料供应上一一直采取极严格的控制手段。在没有通过外交途径与法国会商、进一步限制伊拉克的核潜力的情况下就采取军事行动，显然有害于以色列的对外关系。

对于佩雷斯的指责，北京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他拿出一封 1981 年 5 月 10 日佩雷斯给他的来信，要求在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成员间传阅。信中表明，早在轰炸行动开始的六个月前，北京就把政府的轰炸计划告诉给佩雷斯。佩雷斯来信主要是建议轰炸不要在 5 月进行，以免对法国的大选产生于以色列不利的影晌。北京反问：既然佩雷斯事前知道轰炸计划，政府也接受了他的建议，未在 5 月份实施这一计划，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疑问呢？

看来，北京显然是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又赢了一分。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利库德集团将在议会领先工党 20 个席位之多。听到这一预测后，佩雷斯觉得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最艰难的一天。他召来自己的助手，向他们表示了自己打算辞去工党主席的想法，但助手们却劝他“再坚持一下”。五天后，新的民意测验表明，利库德集团的领先地位可能仅有 6 席。双方的差距在缩小，佩雷斯的信心也越来越增强。6 月 30 日的大选中，利库德集团赢得了 48 个议席，工党得到了 47 席。虽然因一票之差未能取得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工党从上一届国会占 32 席一跃上升到 47 席，不能不说是令佩雷斯还感到宽慰的事情。

工党已在反对党的位置上苦熬了三年半，下一步怎么办？利库德集团由于也没得到议会多数所需的 60 个议席，所以提出要和工党建立联合政府。

佩雷斯颇有些动心。他召集工党左翼人士开会研究对策，相信只要说服他们，全党在参加联合政府问题上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歧见。佩雷斯告诉与会者，有消息说，如果利库德集团联合其他党派执政，该集团领导成员中的沙龙就会担任国防部长一职。按照沙龙的本性，他担任国防部长后所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应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参加联合政府，不让沙龙执掌兵权，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

然而，佩雷斯的一番话却不为工党左翼人士所理解。在他们看来，利库德集团的所有领导成员都是好战分子，工党入阁只会败坏自己的名誉。佩雷斯见到此番光景，只得承认“民族的团结意味着工党团结的终结”，不情愿地放弃与利库德集团建立联合政府的打算。不幸的是，他对沙龙的预见言中了，新的利库德政府上台不到一年，就发动了侵略黎巴嫩的战争。

黎巴嫩是以色列邻国中唯一不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阿拉伯国家，占人口 49% 的基督教徒——特别是天主教马龙派在政治上掌握实权，而占人口 51% 的穆斯林，相对势力较弱。1969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把总部迁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这个国家教派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1975 年 4 月 13 日，马龙派长枪党民兵与巴解游击队在贝鲁特发生武装冲突，由此引发了至今尚未彻底结束的以基督教徒为一方、以穆斯林为另一方的多派别全面内战。

黎巴嫩内战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叙利亚部队的进入，以色列也派兵进入南黎巴嫩，支持基督教徒组成的哈达德部队。1981 年春天，以色列军用飞机在支持长枪党民兵作战时击落两架叙利亚直升机。叙军迅速调遣部队部署在贝卡谷地，还运来了苏联制造的萨姆—2 型地空导弹。若不是美国新总统里根派特使从中调解，叙以之间在黎巴嫩的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后来双方虽达成停火协议，但剑拔弩张的气氛却没有消除。

沙龙担任利库德政府的国防部长后，一心想以战争手段摧毁巴解在贝鲁

特的总部。为此，他曾亲自乔装打扮赴贝鲁特作实地考察，并且为此拟定了详细的“闪击”计划。沙龙所要等待的是时机和借口，这一天终于让他等来了。

1982年6月3日，以色列驻英国大使施罗姆·阿果夫在出席完一个宴会后从伦敦多切斯特饭店走出来，直冲他的汽车停放地走去。突然，一名男子从不远的黑暗处跳出来，没等阿果夫和他的保镖反应过来，便举枪进行射击，然后逃之夭夭。阿果夫身负重伤，被人紧急送往医院。经过几个昼夜的奋力抢救，阿果夫总算保住了性命，但也成了终生躺在床上的瘫痪者。

6月4日，沙龙下令以空军轰炸贝鲁特以南几处巴解游击队的营地，并声称这是“恐怖分子”的藏身处。以军的行为自然遭到巴解游击队的报复，几发苏制卡秋莎火箭弹从黎巴嫩南部打到了以色列的科亚施莫特村。

佩雷斯6月5日得知科亚施莫特村遭袭击事后，立即召集包括前以军总参谋长巴列夫在内的工党军事专家，研究本党对事态的看法和建议。最后大家同意建议政府派兵赴黎南部进行绥靖作战，肃清距以边界40公里以内的“恐怖分子”。40公里的距离是巴列夫提出的，这是卡秋莎火箭弹的最大射程。

6月6日是星期天，佩雷斯正吃早饭时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与拉宾、巴列夫和工党左翼领导人维克多·申姆托夫于10时45分到办公室来一趟，“贝京有要事相商”。

佩雷斯等四人来到总理办公处时，看见走廊里挤满了军人。沙龙一身“短打”，周围都是手中拿着地图的参谋人员，简直就像古罗马的恺撒在指挥战争。

看到沙龙这股神气劲儿，佩雷斯在总理办公室坐下后心情甚感不平静——沙龙指挥的这支军队是在佩雷斯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它所使用的武器也大多出自佩雷斯筹划建立的军工厂，就是目前同以方紧密合作的黎巴嫩基督徒，也是佩雷斯搭上的线——但现在神气的是沙龙……

佩雷斯回忆起那是1960年的5月4日，一位叫斯莱德·贝克尔的年轻英国陆军上校走进了佩雷斯在国防部的办公室。贝克尔告诉佩雷斯，黎巴嫩将于5月12日进行大选，军队受命监督各选举站的投票，并准备制止暴乱。贝克尔受黎巴嫩军队总司令、基督教徒谢哈布将军之托告诉佩雷斯：谢哈布将军认为他的军队中有不少崇拜埃及纳赛尔的军官，他担心这些人在监督选举过程中进行宣传，结果使选民投了那些“左倾分子”的票。为此，谢哈布希望以色列军队能在以黎边界制造紧张局势，为期一周，这就能使他把那些“亲纳赛尔”的军官派往黎以边界，使他们不能影响选举。

埃及总统纳赛尔当时被以色列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佩雷斯痛快地答应了谢哈布的要求，而且在实际操作上也颇能合作。自此以后，以色列与黎巴嫩基督教派人物的联系悄悄地展开，到了黎巴嫩内战爆发，这种合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76年4月1日，佩雷斯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来访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政治书记、贝鲁特及沿海区长枪党民兵司令约瑟夫·阿布哈里尔。双方在共同对付巴解游击队方面达成了不少共识，阿布哈里尔保证要创造一个“新的黎巴嫩，即把以色列看作是盟友的黎巴嫩”。

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976年的7月29日，佩雷斯又在特拉维夫会见了另一位黎巴嫩基督教领导人丹内·夏蒙。在这次会面中，佩雷斯确定了后来

被称之为“黎巴嫩纲领”的政策原则：“以色列将继续援助各黎巴嫩基督教派，不加任何先决条件，也不作任何政治指示。”在这次会面中，佩雷斯还建议夏蒙在南黎巴嫩建立一支由基督教徒组成的部队，并保证提供一切装备、给养和训练所需。于是，哈达德少校领导“南黎巴嫩军”得以建立，尽管它在巴解游击队增强了自己在黎南部的力量后并没有完全实现当初佩雷斯所预想的目标……

佩雷斯的思绪被贝京的讲话所打断。贝京严肃而又正式地告诉所有在座者：当日11时整，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已跨过黎以边界向北挺进。有人问，战斗将持续多久？不等贝京回答，沙龙说道：“我们将在21个小时内完成任务。”显然，贝京对有人打断他的讲话有些不满，他补充一句说：“战斗将最多持续24个小时。”

事实上，这场在当时列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用先进兵器最多的战争打了87天：

6月6日，以色列军队兵分三路，以贝鲁特为合围目标向北发起了进攻。

6月8日，以色列军队在中部战场取得重大突破，在沿海地区也进展顺利，只是东路部队在与叙利亚军队的作战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6月9日，叙以两国军队在贝卡谷地上空开展了激烈的空战。以空军的E—2C预警机和波音—707电子干扰机对叙军防空导弹部队实施电子欺骗和干扰，同时，F—16战斗轰炸机向叙军防空导弹阵地发射美制百舌鸟式反雷达导弹，几乎摧毁了所有的目标。当日的空战也进行得异常激烈，以空军的突袭和电子干扰造成60多架叙军战斗机被击落。

6月11日，叙以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全面向贝鲁特挺进。

6月12日，以军包围了贝鲁特，以色列和巴解同意开始停火。

战争打响的第二天，以色列议会就有人提出对贝京政府的不信任案。佩雷斯作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的领袖，表态极为“谨慎”。在他的影响下，除了一名工党议员外，其他工党成员都对不信任案投了反对票，结果便利库德集团避免了一场“信任危机”。

6月8日，沙龙到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作证，正式宣布将此次作战命名为“加利利和平行动”。在问及此次行动的界限时，沙龙有意回避，这使一些工党议员找到佩雷斯，要求为避免过多伤亡而把行动界限定在距以黎边界40公里的地方。

对于本党议员的要求，佩雷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尽管他内心中希望以军的行动有助于壮大黎巴嫩基督教派的势力，不想让进攻立即停止下来，但同时也不希望出现由于沙龙指挥的军事行动大获全胜而导致利库德集团的威望上升。为此，他找到贝京，要求后者公开声明：以色列军队将不对贝鲁特实施合围，也不会切断贝鲁特至大马士革的公路，从而造成以叙两军的激烈战争。贝京一口答应了佩雷斯提出的要求，并声称次日将在议会宣布此事。

贝京第二天果真在议会发言中重复了前一天对佩雷斯的许诺，他还特别提到佩雷斯的姓名，表现出一副愿意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中进行两党合作的样子。事实上，就在贝京讲话的同时，沙龙指挥的以色列军队已开始向贝卡谷地的叙利亚军队发动大规模空袭。贝京不仅欺骗了世界舆论，也欺骗了佩雷斯本人，这使佩雷斯极为恼火——利库德集团又不择手段地赢了一分，根本就没能把他这个反对党领袖放在眼里。

佩雷斯原想动员力量与贝京等人在议会较量一场，但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大趋势已不允许他这样做。以军的快速推进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民族精神”的热潮，沙龙一下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即使对他的间接批评也会受到匿名信的恐吓，更甭说直言加以谴责了。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不得不采取等着瞧的消极守势。

6月12日，以军完全包围了贝鲁特，巴解游击队与以色列军队的一场殊死巷战已迫在眉睫，美国里根政府担心苏联的军事介入，会同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把多国部队开进贝鲁特以隔离交战双方。8月21日，经过多方斡旋与磋商，巴解总部及所属游击队开始从贝鲁特撤往北非的突尼斯，整个撤退工作至9月1日基本完成。

贝京重用沙龙并未给自己带来许多好处。这位桀骜不驯的国防部长几乎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就连贝京有时也不知他到底在干什么。1982年9月18日晚，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未经任何盘查和阻拦地通过以色列军队在贝鲁特的防区，进入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内。自从巴解游击队从贝鲁特撤出后，这两个难民营内往满了手无寸铁的巴解游击战士的家属。两天后，当基督教长枪党民兵从这两个难民营撤出时，人们发现营地出现了1000多具尸体：妇女在被强奸后惨遭杀害，儿童胸口上淌着鲜红的血迹，脸上至死还留着生命垂危时的恐惧。在现代社会竟然出现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真是骇人听闻！

发生在夏蒂拉难民营和萨布拉难民营的暴行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以色列军队故意放纵的行为自然也使这个国家成了被谴责的对象。埃及召回了自己的驻以大使，美国政府和美国犹太人组织也提出了警告，就是在以色列境内，也有不少群众上街示威，要求追究沙龙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利库德政府只得同意成立以大法官卡汉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对贝鲁特的难民营事件进行调查。经过数十次的听证和出示了几千页文件，调查委员会认定沙龙对难民营事件负有“间接责任”。沙龙为此不得不辞去国防部长职务而改任不管部长。

然而，贝京政府并没有就此感到日子好过些。国内经济陷入空前的萧条状态，通货膨胀率已达到数百个百分点。就在此前，贝京的妻子阿丽扎也因病去世。内外交困的贝京感到心竭力衰，因此于1983年9月2日在提名原外交部长沙米尔为接班人后辞去了内阁总理职务。

伊扎克·沙米尔上台没几天，就主动邀请佩雷斯到耶路撒冷与其见面。沙米尔向佩雷斯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佩雷斯则表示，这需要与工党领导层商定后才能作答复。

在工党领导层举行的会议上，佩雷斯完整地转答了沙米尔提出的建议，不过他补充说：就他个人的看法，利库德政府已接近走到自己的尽头，工党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爬上”利库德集团的“大篷车”。这一次让佩雷斯言中了。由于工党拒绝合作，沙米尔政府于1984年1月25日——也就是上台后不足四个月时宣布：大选将提前在当年7月23日举行。

从现实情况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的胜利：沙米尔已经68岁了，缺乏贝京那种口若悬河的辩才，再加上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的压力，以及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进退两难、屡遭当地阿拉伯什叶派游击队的袭击，怎么能阻止工党夺回失去了已七年多的执政权呢？

然而，工党内部却不平静。许多党员认为，佩雷斯是一个命里注定的失利者，虽然无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决说不上是一位杰出的领袖。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工党党员企盼着能出现一位新的领袖——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党的领袖位子上呆久了，党员也未必不企盼能有新的面孔出现在领导层的圈子里。

拉宾是一部分党员瞩目的人物，但历史覆盖在他身上的阴影还没有消失，于是不少党员又把目光转到了当时担任以色列总统的伊扎克·纳冯身上。

在以色列，总统虽是国家元首，但却是个虚职，有雄心的政治家都把眼睛盯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既然有人企盼纳冯出马，纳冯也不推辞。他在任期还有一年的情况下提前辞去总统职务，通过一些党员提出竞选工党领袖从而进一步竞选总理职务的要求。

从本一古里安当政的年代开始，纳冯一直是佩雷斯私交甚厚的老朋友，纳冯的出马使佩雷斯觉得处境很尴尬，佩雷斯于是找到纳冯，许诺让后者在党内稳居第二把手的位置，从而退出对领袖职位的争夺。没想到纳冯告诉他，已有不少党内资深人士劝说拉宾东山再起，因此在党的领袖之位竞争中鹿死谁手还难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纳冯决定不放弃竞争党的主席的机会。换言之，与其让拉宾“篡位”，还不如让他——纳冯来争夺一番。

政治有时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事情。佩雷斯见纳冯不肯回心转意，于是掉过头来去找他的老对手——拉宾。使他难以想象的是，拉宾早已成竹在胸，“交易”进行得极为顺利。

确有拉宾一派的人士建议拉宾竞选工党主席之职，理由是：佩雷斯与纳冯原属一派，现在鹬蚌相争，拉宾参选可坐收渔人之利。然而，拉宾经过周密盘算，拒绝了本派党徒的建议。在拉宾看来，倘若纳冯登上工党主席宝座，第二把手的交椅未必自己就坐得成；不如支持佩雷斯连选连任从而保住第二把手的既得位置来得更为可靠。就这样，佩雷斯与拉宾达成谅解：如果后者支持佩雷斯连选连任，一旦工党取得组织新政府的机会，拉宾将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不消说，这个职务在工党内部已成了第二把手的当然位置。对拉宾来说，真可谓“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啊！

纳冯在得知佩雷斯与拉宾达成谅解后也表现得十分知趣，他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放弃竞选工党主席的打算，支持佩雷斯连选连任。就这样，佩雷斯在1984年4月2日举行的工党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主席一职，并被推选为工党总理候选人。

工党内部的分歧化解了，利库德集团也失去了乘人之危的机会，于是把矛头对准了佩雷斯。他们造谣说，佩雷斯是一家叫塔德兰的电子公司的合伙人，过去曾以权谋私，给了这家公司以大量的定单。这一谣言不久就不攻自破，因为佩雷斯担任公职时，这家公司还没有成立。后来又有谣言说，佩雷斯把儿子和女婿送到国外以拒服兵役。事实上，佩雷斯的儿子是空军的飞行员，女婿是空降兵部队的中校，两人都参加了在黎巴嫩的作战，因此谣言还没流传开就自生自灭了。

佩雷斯与利库德集团候选人沙米尔竞争的高潮是在电视台举行的现场直播辩论。佩雷斯为了在辩论中取胜，特地请来党内的“公共形象”专家约西·萨里德进行指导，并导演模拟辩论活动。

萨里德的指导无疑是成功的，同时也更增强了佩雷斯的信心。

在实际的竞选辩论中，佩雷斯一开始就占了上风。他彬彬有礼地主动与



沙米尔握手，给人以一个“费厄泼赖”的印象。他有意假作礼貌让沙米尔先发言，从而保持了后发制人的主动性。不论沙米尔说什么，佩雷斯总是抓住贝鲁特难民营事件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利库德集团的难言之隐大做文章。沙米尔本来就木讷、不善言辞，让佩雷斯这么一攻，几乎完全乱了方寸。工党的竞选顾问都相信，佩雷斯不仅已经胜了这场辩论，而且也将在选举中获得全胜。

辩论进行到最后，沙米尔提出两党在大选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对此，佩雷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立即予以回绝。后来的事实说明，佩雷斯显然低估了利库德集团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选民中产生的积极影响。

## 第十四章 “没有爱情的婚姻”

大选投票之日，天空一片晴朗，阳光为赶往地区选举站投票的佩雷斯带来无限的希望。在选举站，佩雷斯与在场的选民一一握手，并摆出微笑的姿势让记者们尽情地摄影。投票后，佩雷斯乘车来到特拉维夫雅尔孔大街上的工党选举总部。整个白天，佩雷斯为与来自各地的工党积极分子见面而出出进进选举总部。他的身边比往常多了几名身强力壮的保镖，但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本来嘛，当总理的人身边哪能没有几个保镖呢？

晚上，许多工党的老党员都来到竞选总部，等待选举的最终结果。佩雷斯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视机，同老朋友们有说有笑，专等以色列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哈伊姆·亚文公布消息。亚文每隔 15 分钟就在屏幕上露一次面，言语诙谐风趣。但由于计票工作的延误，他一直未能告诉观众最后的结果。晚上 12 时，亚文又在屏幕上出现了，办公室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亚文告诉大家，由于某些选举站的计票工作出现纰漏，需要重新计票，现在只能告诉听众一个带有很大估计成分的数字：工党在选举中赢得 46 个议员席位，而利库德集团是 43 席。

什么？屋子里没人走动，但也没人张嘴说话。在黎巴嫩战争和高通货膨胀率长期困扰以色列政治、经济形势后，工党仅领先于利库德集团 3 个议席，而且绝对的得票率还有所下降！

放在走廊里作为夜餐的三明治没有人动，工作人员和朋友们也渐渐地离去，只有佩雷斯还留在办公室里，沐浴着“惨遭胜利”的气氛。既然已经成了议会第一大党，佩雷斯必须思考如何组阁的问题：拉那些宗教意识强烈的小党一起干吧，工党内的左翼势力会激烈地予以反对，而左翼所拥有的 6 个议席又是组阁所不可缺少的。思前想后，他觉得只有与利库德集团组织联合政府一条路可走——选民们的投票反映了他们对两党争斗的厌倦，而诸如治理通货膨胀问题又不是一党为主的政府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

利库德集团在拉拢其他小党组阁的努力失败后，也同意与工党探讨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于是两党领导人开始了历时几个月的磋商。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由谁来担任总理职务，佩雷斯提出，在政府的四年任期内，前两年由一个党的一把手担任总理，另一个党的一把手任外交部长，后两年相互对调。佩雷斯的建议没有提哪个党的一把手先担任政府总理，也没说国防部长这一重要职位由谁承担。沙米尔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反建议：由佩雷斯先担任两年总理职务，但国防、外交两个重要部门留给利库德集团执掌，两年后对换。

佩雷斯将沙米尔的建议带到工党行政委员会上进行讨论，坐在旁边的拉宾伏过身来，细声细语地对他说：“西蒙，你知道，国防部长这一职务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佩雷斯来说，拉宾的这一提醒不能忽视，两人刚刚缓和的关系以及在党内选举中彼此默契都不能允许他接受沙米尔的建议。于是佩雷斯又去找沙米尔，要求后者全盘接受自己提出的方案，结果使权力分配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打破僵局的帮助来自一个出乎预料的角落。佩雷斯过去采买军火时一位老朋友、商人阿兹里尔·艾内夫来电话，说沙龙愿意伸出“友好之手”帮助打破僵局。政治啊，昨天的死敌，只要有利益驱动，今天立刻可以成为朋友！

佩雷斯与沙龙的会晤在艾内夫的乡间别墅进行。佩雷斯向沙龙介绍了存

在于权力分配方面的僵局，而且还谈到，为了减少两党在政治方面的分歧，他打算主政后成立一个“小内阁”，双方各有五名部长参加，处理日常事务，而重大问题则由所有部长参加的内阁加以讨论。沙龙听完介绍后显得异常爽快，他表示将劝说沙米尔接受如下方案：前两年由佩雷斯担任总理，沙米尔担任外交部长，两年后对换；在执政的四军中，拉宾将一直担任国防部长。不过，他要求自己能在新政府中担任某一比较重要部门的部长职务，而且还要进入“小内阁”。佩雷斯答应了沙龙的条件，沙龙后来也确实说服了沙米尔接受自己的方案。就沙龙本人来说，后来担任了工贸部长，无论如何也比以前担任的不管部长重要得多。

佩雷斯将权力分配方案拿到党内讨论时受到了少数左翼派别人士的批评，但70%的与会者还是支持这一方案的。1984年9月13日，佩雷斯向议会递交了包括24名阁员的新政府名单，而且立即得到批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经过七年多的反对党领袖的政治生涯，佩雷斯终于坐到了他的引路人、导师和庇护者——本—古里安曾经坐过的总理交椅上。当记者问及他此时此刻的感受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感到我坐在本—古里安曾经坐过的位置上，而是走在他曾经走过的道路上。我从他‘老人家’那里学到的是：不要惧怕批评；只要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就可克服任何困难；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不受羁束的信心！”

自然，佩雷斯出任总理的年代已与本——古里安那时毫不相同。他承认：“这个政府是建立在一块分割的地基上，是依据一个没有先例的框架构造的，而且还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作才得以建立起来。”不过，正因如此，这届政府也要解决许许多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具体说，有如下三点：

(1) 稳定经济，恢复增长，在不增加失业和保证工作人员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遏制通货膨胀；

(2) 在保证加利利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的前提下将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回；

(3) 与约旦国王侯赛因举行谈判，恢复已中止的“戴维营和平进程”。

许诺不难，把许诺变为现实可不容易。佩雷斯从利库德政府手中所接过来的经济形势之糟糕，任凭怎么想象都不过分。通货膨胀率已从1983年的191%猛增到1984年的445%，对外贸易赤字已达25亿美元，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已到20亿美元的警戒线之下。换句话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

佩雷斯对所面临的困难并非没有预先准备。早在选举进行前的两个月，佩雷斯就在工党内部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就扭转经济颓势拟定具体的计划。这项计划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冻结物价与工资；以及发行新货币。佩雷斯上任当天，就把利库德集团成员、财政部长伊扎克·莫达伊和工党成员、经济部长盖德·雅科比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雅科比是自己人，况且还参加了经济计划的草拟过程，佩雷斯对他自然无忧无虑可言。对莫达伊，佩雷斯可有点儿担心——如果经济颓势可以扭转，人们一定会把功劳记在工党身上，同时还会加倍指责执掌上届政府的利库德集团无能，莫达伊自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为此，佩雷斯并没有把计划合盘端出，只是以某些想法为名叙述了计划的要点，没想到莫达伊还是提出了不同意见。

莫达伊声称佩雷斯提出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然后他告诉佩雷

斯，前届政府已有了一个实行美元与以色列货币挂钩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案，他要求召开内阁全体会议讨论这个方案。

熟悉官场运作的佩雷斯知道，在一个两党组成的内阁里，无论讨论什么方案，少不了无休止的辩论和争吵，最后的结果又往往是议而不决。所以他引用前届政府的某些削减预算的方案未能在内阁通过为例劝说莫达伊改变自己的主张，没想到莫达伊死硬地要坚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使出了“撒”手锏，说要将两个方案拿到内阁去不经讨论而以投票决定采用哪一个。莫达伊显然对表决的可能结果心中无数，也不愿一上任就被别人否决自己的方案，丢失面子，于是被迫同意了佩雷斯的打算。就这样，佩雷斯在两天后举行的第一次内阁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削减 10 亿美元政府开支的计划。

尽管大卫·列维和沙龙等利库德集团的部长在发言中用“悲剧”、“社会危机”等词语来形容佩雷斯的削减开支计划，但包括沙米尔在内的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赞成这样做。消息传出，公众虽认为这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但还是表示欢迎，佩雷斯于是打响了担任总理的第一炮。

自然，佩雷斯没有为公众初次的良好反应所陶醉。削减开支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事业投入和居民补贴的减少，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那些从亚非国家移居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这是佩雷斯心中非常明白的事情。东方犹太移民初入以色列时大多一贫如洗，对工业化社会的生活节奏也很不适应。利库德集团当政时，对这些移民提供额度颇高的生活补贴，从而赢得了他们的选票，一下子稳据执政地位七年之久。佩雷斯深知这是一个“不能得罪的群体”，因此决定赴美国争取援助，以保障对东方犹太移民的补贴不做大幅削减。

佩雷斯上任后第三天就收到了美国总统里根发来的访美邀请。对于提高美国对以援助一事，他也和里根有电报往来。应当说，里根的回电带有故意作出的“模糊性”，他一方面承诺美国将帮助以色列克服经济困难，一方面又定下先决条件——“以色列应表现出独立克服自身困难的意愿”。为此，佩雷斯在访美前以一票的优势在内阁通过了实行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的决议。

然而，佩雷斯踏上美国国土时，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人认为他做得还不够：里根的共和党政府被人看作是削减福利开支的“能手”，美国国会会不会赞成自己国家的政府在削减开支的同时又增加对别国的援助。

佩雷斯又拿出年轻“闯美国”时所施展的手段。正如美国前驻以大使莱维斯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他对以色列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作了出色的分析，这给里根总统、舒尔茨国务卿、白宫的助手们、国会的领袖以及报界著名专栏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结束时，以色列政府同美国领导层的个人联系恢复了，公众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有了回升，从而使两国间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更加紧密和相互信任的新水平。”临回国前，里根许诺说，美国将提供 15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问题是要找到一条能说服国会的理由。

显然，许诺兑现的时间还未确定。佩雷斯返国后的第四天，出现了一次美国兑现许诺的机会——里根总统写信给佩雷斯，要求允许在以色列国土上建立一个巨大的“美国之音”转播站，“以便让苏联公民听到西方的声音”。换言之，如果以色列政府同意了这个要求，里根可以告诉美国国会：让我们给以色列一些补偿吧！

佩雷斯清楚，美国曾对不少欧洲国家提出过类似要求，但都被这些国家

拒绝了。如果以色列接受这一要求，在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怎么办呢？思前想后，他还是回信接受了里根的要求，没想到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新条件。

舒尔茨国务卿来信提出，美国政府最近要卖一批先进武器给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希望以色列不要在这方面制造麻烦”。说穿了，就是让以色列劝说美国犹太院外活动集团不要游说国会阻止这两笔交易。

武器可以杀人，与转播站的性质截然不同。佩雷斯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请沙米尔和拉宾共同商讨对策。沙米尔虽是利库德集团的领袖，但却大胆他说出了佩雷斯和拉宾不敢说出的话：“以色列现在是乞讨者，你怎么能去咬喂你吃饭的手呢？”于是三人同意转告有关美国犹太院外集团负责人，希望他们只对向约、沙出售武器事采取“消极反对”的行动。几天后，他们接到消息说，即使犹太院外活动集团只采取了“消极反对”的行动，美国国会也还是决定推迟考虑政府关于向约、沙出售武器的建议——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的势力真是太大了！

当然，佩雷斯在等待外援的同时也在积极深化反通货膨胀的措施，而以色列银行的两位前行长和现任行长的“一揽子协议”方案尤其对他具有吸引力。三位行长的看法是，单纯削减开支和控制进口会造成大量失业，结果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他们建议政府与拥有大量工人和相当数量企业的以色列总工会达成一个包括削减开支、冻结工资和物价的“一揽子协议”，从而把抑制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点。

扭转经济颓势措施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是数月来一直困扰佩雷斯的问题。听了三位行长的建议，佩雷斯立即去找以色列总工会总书记伊斯瑞尔·克萨尔。由于工党势力一直在总工会占优势地位，佩雷斯认为克萨尔一定会积极支持“一揽子协议”方案。没想到一端出方案，克萨尔即出于本组织的利益一口气提出许多保留意见。政府若不一条一条地与总工会谈判这些问题，“一揽子协议”决不可能出台。

整个1984年12月佩雷斯都投入到与克萨尔的谈判之中，好不容易在月底达成了一个从1985年1月开始执行的为期八个月的“一揽子协议”，主要包括对工资和物价的全面监控，取消大多数补贴和削减10%的政府开支。若说佩雷斯此时可以松口气，那可是大错特错了。在与总工会谈判的同时，从美国获得“紧急援助”的可能性不是变得越来越大，而是似乎更渺茫了。美国《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封署名为“失业和无家可归的纳税人”的来信，大声疾呼：“总统先生，停止那种无休止和不道德的每年付给每个以色列公民1000美元以上的无偿援助吧！”

1984年12月8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写信给佩雷斯，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美国“紧急援助”到位的时间表：“除非你们整顿经济的计划已取得初步成效，否则，美国将不会把紧急援助的款项划拨到以色列政府的帐户上。”以色列政府与总工会“一揽子协议”拟就后，从美国国务院又传来对该协议决心不果断、措施不严厉的指责，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到这是佩雷斯经过几昼夜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才得来的成果。“一揽子协议”本来就是建立在国内削减开支、国际争取援助基点上的，现在协议“缺了一条腿”怎么能在实际中见到成效呢？

佩雷斯的容忍和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限，他在接见来访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兰·沃里斯时，针对后者曾说过“以色列白白浪费了美国12亿美元”

的话，直言不讳地指责道：“这是不公正和侮辱性的言论！我们从美国得到的钱都用来还债了，没有一分钱用在保持生活水准或现金开支方面，我们到哪里去浪费这些钱呢？”沃里斯看到佩雷斯真的动气了，只好表示“收回”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他还同意派遣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到以色列，与以有关方面共同研究如何使美国的援助具体到位的问题。

由于美国援助迟迟不能到位，佩雷斯不得不着手制定第二个——措施更为严厉的“一揽子协议”方案。后来的事实说明，他的这一举措的确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保住了政府，也保住了他的政治前途。

时间到了1985年5月，以色列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由于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滞后效应”，对物价和工资的监控根本起不到作用，削减10%的政府开支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通货膨胀率已接近四位数。佩雷斯召来以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汕依和自己的经济顾问诺巴克为首的经济小组，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天24小时地呆在这里，直到拟定出全部经济计划细节为止。”大家夜以继日地干了整整10天，终于完成了第二个“一揽子协议”方案。第二个“一揽子协议”将执行一年，其中包括头三个月实行“经济紧急状态”：货币贬值20%，两年内削减7.5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而且第一年就要削减4亿美元。货币贬值意味着工资收入下降，削减政府开支更意味着停止以往的补贴和福利，因此首当其冲受到损害的就是那些来自东方国家、文化水准较低的犹太居民。特别是，经济紧急状态期间还要裁减某些公共部门的雇员，受损害最大的当然也是“东方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利库德集团的第二把手、历来被认为是“东方犹太人”代表的大卫·列维，故意把计划细节在正式公布前透露给新闻界，一下子引起“东方犹太人”的激烈反对。

事不宜迟。7月4日晚8时，佩雷斯召开内阁全体会议通过第二个“一揽子协议”方案。会议一开始，列维、工贸部长沙龙和福利部长卡萨夫等利库德集团的头面人物就指责方案损害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并且明确表示要对方案投反对票。利库德集团成员、不管部长阿伦斯提出了一个美元化以镑的方案，虽然比起财政部长莫达伊以往曾提到过的方案没有多什么新见解，但还是占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工党多数内阁成员赞成第二个“一揽子协议”方案，但拉宾反对削减军费，于是又引起几位部长从“本位”出发，反对削减本部门的预算。会议创记录地开了25个小时，这也是佩雷斯有生以来开得最长的一次会议。7月5日晚9时，争吵得精疲力竭的内阁成员们开始投票了。利库德集团除沙米尔、莫达伊和运输部长哈伊姆·库尔夫外都投了反对票，工党成员中只有拉宾未投赞成票——方案通过了。

第二个“一揽子协议”对以色列经济来说真是一剂“苦药”：货币实际贬值18.8%，加上冻结工资，使人民一般收入水平下降了25%，因此被人冠以历史上迫害犹太人的基督教教皇令，称为“经济教令”。然而，苦口的药往往是良药，这个包括有70项具体措施的“一揽子协议”出台不久就遏制了流行已数年的通货膨胀，

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就由前一年的445%下降到185%，1986年又降为20%。不久，佩雷斯政府以1:1000的比例用新的“谢克尔”代替了旧以镑，国家的金融形势开始进入稳定状态。1985年底，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开始将15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款拨入以色列政府的帐户中，以色列的外汇储备“危机”一下子得到缓解。过去一度有些恼怒的群众在得到稳定

的经济形势面前转变了态度，佩雷斯在民意测验中的满意率上升到了70%——一个连本—古里安也未曾达到过的数字！

财政部长莫达伊对第二个“一揽子协议”是投了赞成票的，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复苏，他对协议以及联合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86年4月，值佩雷斯出访美国之际，他对几家报纸的记者发表谈话说，工党的经济政策有“倾斜性”，以色列总工会和许多“基布兹”都因与工党有历史联系而从佩雷斯的“一揽子协议”中获得了好处。莫达伊还把佩雷斯称作“飞行总理”，意思是说他热衷于国外旅行，而把国内事务推给别人去做。最让佩雷斯不能接受的是，莫达伊告诉记者：“佩雷斯在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方面没干什么事情……这是因为他对经济事务纯属外行。”

佩雷斯美国之行本来就因为在地区和平问题上受挫而感到沮丧，看到报纸上莫达伊的那些话，更是恼火透了。他找到沙米尔，通知后者要解除莫达伊的财政部长职务，让沙米尔提出新人选。但沙米尔却说，根据两党联合执政的协议，总理在未得到另一党领袖同意前是不能解除该党部长职务的。对此，佩雷斯反驳说，协议中提到的部长是“多数”，因此不包括解除某一部长的情况。沙米尔没办法，只好召开本党阁员会议研究对策。

在会议上，莫达伊要求自己的同事以集体辞职的方式迫使佩雷斯收回他解除自己职务的建议，没想到这一要求立即为沙米尔所打断。事实上，沙米尔的做法是正确的：集体辞职意味着联合政府垮台和提前举行大选，佩雷斯因第二个“一揽子协议”取得成功，个人威望正如日中天，大选只意味着利库德集团的失败，所以不能这样做。几天后，沙米尔提议莫达伊在利库德集团内部的老对手摩西·尼西姆接任财政部长一职。为了保住利库德集团的既得利益，沙米尔狠心演了一场“丢卒保帅”的戏……

## 第十五章 武器与军队

如果说第二个“一揽子协议”是佩雷斯在联合政府时期的得意决策，那么这一时期他还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决策——雄狮飞机研制计划。

70年代，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在完成了幼狮型战斗机的仿制、生产后，开始研制完全由自己设计的雄狮战斗机。按照国防部的文件，雄狮战斗机旨在执行90年代的防空和战斗轰炸任务。但从1974年到1980年的七年间，雄狮战斗机项目还一直停留在绘图设计阶段。1980年，前以色列空军司令、当时担任以国防部长的埃泽尔·魏茨曼要求开始雄狮飞机的试制阶段，理由是，国际上军用飞机的价格不断攀升，以色列不久将无力为购买国外军用飞机支付巨额开支。政府批准了魏茨曼的建议，一种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F—404发动机为主动力的飞机开始装配和进行试飞。

魏茨曼不久离开了政府，由总理贝京兼任国防部长职务。1981年5月，当时担任以空军司令的大卫·艾维里将军向贝京报告说，以F—404发动机为主动力的雄狮样机是一种体积较小、只能用于截击任务的飞机。这样，以色列空军还免不了要向美国购进可以同时执行地面攻击任务的F—16战斗机。如果未来雄狮飞机要成为以空军的主战兵器，就要研制一种发动机功率较大、可携更多弹药，同时可执行截击与地面攻击双重任务的样机。贝京批准了艾维里的建议，结果雄狮样机又由小改大，进行试飞。

雄狮战斗机总体设计思想改来改去，说明研制开发的费用也随之加大。特别是其研制费用基本上来自美国的援助，所以发动机和飞机的主要构件也必须使用美国的产品，而由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承担的只不过是有关电气和空气动力操纵系统。这样算下来，未来生产一架雄狮战斗机的成本将高达1500万美元，与从美国购进一架同类型飞机的价格相差无几！

佩雷斯担任联合政府总理时，雄狮战斗机的定型工作还未完成。可巧正碰上拟定削减政府开支计划，他的经济顾问诺巴克建议，为进一步削减5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必须停止雄狮飞机的研制工作。佩雷斯知道他正面临一场需要严肃对待的决策过程，所以于1985年5月底请数位经济学家和官员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商讨是否继续执行“雄狮”研制计划问题。

拥有2万余名员工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是佩雷斯“一手拉扯成长起来的企业”，而“雄狮”研制计划又被看作是该公司“王冠上的宝石”。不知怎么的，佩雷斯这位力主大幅削减预算的内阁总理，一到讨论起“雄狮”计划，竟成了最反对削减该计划开支的“保守派”，因而也成了其他与会者攻击的对象。不论经济学家用多少公式来估算停止“雄狮”计划所能带来的好处，佩雷斯总是硬着头皮辩解说：“再等一分钟吧！一个国家要没有储蓄，将来就无法投资。‘雄狮’计划是我们安全上的‘储蓄’，请不要把它扔掉！”在佩雷斯的坚持下，“雄狮”计划的拨款虽然有所减少，但总算保留下来。不过，他私下里向朋友们承认，倘若今生他只犯过一次感情战胜理智的错误的话，对“雄狮”计划的钟爱说不定就是这一次……

1987年1月，佩雷斯刚刚按联合执政协议与沙米尔对调担任外交部长，美国国防部就派来了以部长助理多夫·扎克哈伊姆为团长的代表团。扎克哈伊姆是美籍犹太人，笃信犹太教，并能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是美国政界有名的“以色列通”。会谈一开始，扎克哈伊姆就要求以色列取消“雄狮”计划这个由美援资助的项目。为了不使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员工因停产而失



业，扎克哈伊姆表示，美国国防部可向以订购一批可用于 F—16 战斗机的部件。

没等佩雷斯开口，拉宾便以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身份先作了发言。他认为扎克哈伊姆对“雄狮”计划的态度过于悲观，并说再有 20 亿美元，以色列就可研制出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到那时，雄狮飞机的市场前景将非常广阔，所有研制费用都将得到补偿。扎克哈伊姆冷冰冰地听完拉宾的发言，反驳说，休说 20 亿美元的费用显然是不够的，就是足够，美国国会也难批准再向“雄狮”计划提供援助。

美国人不给钱，无疑是宣布“雄狮”计划的死亡，佩雷斯已经激荡起来的心情立刻冷却下来。他告诉扎克哈伊姆，以色列政府将认真考虑美国代表团的建议，已经快“谈崩了”的事总算暂时缓和下来。

事实上，沙米尔等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也不赞成停止“雄狮”计划，所以研究对策的内阁会议拖到 5 月 20 日才召开。虽然拉宾和不管部长、空气动力专家阿伦斯都在会上表示不同意停止“雄狮”计划，但新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肖姆隆将军的一席话却不啻是给大多数人泼了一盆凉水。肖姆隆通过幻灯和图片向内阁成员表明，由于雄狮战斗机造价过高，与之配套的精密武器系统将失去应有的开发资金，所以用这种飞机装备部队将无助于提高以军的火力。

或许是受肖姆隆的影响，拉宾在访问美国后也表示赞成放弃“雄狮”计划，于是在以色列内阁出现了工党阁员只有佩雷斯赞成继续“雄狮”计划，而利库德集团阁员只有财政部长尼西姆反对继续该计划的局面——12：12，佩雷斯第一次站到了对手们的立场上。

在理智与感情的相互撞击中，佩雷斯想到了老朋友、同样也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创建人的施韦默。当时这位老友正住在美国的纽约，佩雷斯亲自打电话请他回来——“有要事相商”。

在自己的家里，佩雷斯把自己的苦恼一古脑儿地全倒给了施韦默。然后，两人就像 1951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那样，趴在地毯上对“雄狮”计划作了最精确的成本—效益分析。最后的结论是：雄狮战斗机的确造价昂贵，且最终定型的周期太长，因此该计划应当被放弃。佩雷斯舒了一口气——在施韦默的帮助下，他终于战胜了自我。

在最后公开自己的见解前，佩雷斯找到了美国驻以大使托马斯·皮克林，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皮克林似乎完全明白他应当干什么，两天后他告诉佩雷斯，美国政府准备增加向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 F—16 战斗机部件定货；另外，今后以色列向美国的军事定货，一律按照美国的北约盟国才能享受到的最低标价供货。在 1987 年 7 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24 名阁员就是否取消“雄狮”计划进行了最后的表决：12 票同意中止该计划，包括佩雷斯和利库德集团阁员尼西姆；11 位利库德集团阁员投了反对票；工党阁员、卫生部长阿贝利—奥莫斯利诺女士弃权——她的丈夫是以色列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取消“雄狮”计划意味着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必须解雇 6000 名员工，总工会的领导人当然反对这样做……

如果放弃“雄狮”计划是为了削减开支，拯救以色列经济，从黎巴嫩撤出以色列部队将不仅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而且还有助于拯救以色列士兵的生命——在黎巴嫩这个派别丛生、山寨林立的国度，各式各样的游击队终日里用打冷枪、放汽车炸弹的方式威胁以色列占领军士兵的生命，以致士兵的

父母们在国内自发地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压力集团，要求政府将部队撤回国内。

佩雷斯在大选前曾组织专家班子拟订了一个撤军的“百日方案”。这个方案建议，不论能否与黎巴嫩有关方面达成停火协议，以军都应分阶段在100天内撤出黎巴嫩。佩雷斯担任联合政府总理后，却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拉宾与利库德集团的阁员站在一起，声称“一个坏协议总比没有协议而撤军好得多”——他们在内阁形成了多数，佩雷斯只好放弃“百日方案”。

1984年11月，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两个月后，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大使开始了他在中东的穿梭外交行动。在叙利亚同意的情况下，黎巴嫩武装部队的代表和以色列国防军的代表在黎南部的内库拉开始就以军撤出进行谈判。

正如报界所指出的，黎以谈判的最大特征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自己的军队撤出后由联合国部队来填补真空，而黎巴嫩方面和谈判的实际决策者——叙利亚却反对联合国军进驻距黎以边界40公里的利塔尼河北岸地区。40公里，这是卡秋莎火箭的最大射程。倘若阿拉伯游击队在利塔尼河北岸发射这种火箭，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正处在这种武器威胁的“边际地带”，这真是一个难以下决断的问题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宾逐步认识到以色列不可能在这种浪费时间的谈判中得益，他下令以军总参谋部研究单边撤军计划。佩雷斯听到这一消息后颇感高兴，因为一旦撤军行动开始，终日在总理府门前示威的群众就会离去。他一直认为面对这一群士兵的父母是代利库德集团受过。

1985年1月13日，拉宾和总参谋部的官员向内阁提交了分阶段撤军的计划：第一阶段，用5周时间撤退到利塔尼河一线；第二阶段，视情况撤退到从哈斯巴亚到地中海一线；最后，留少量部队在以色列支持的“南黎巴嫩军”的“安全区”内，重武器撤到国际边界之后。

方案一提出，阿伦斯就表示反对，说计划是“拿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做赌注”。沙米尔倒是不反对撤军，但要求整个计划在不事声张的状态下进行，因为“公开声明无异是宣布我们投降了”。最后的选择还是以投票方式做出的。由于利维和杰德诺·派特两位利库德集团阁员对计划投了赞成票，撤军计划顺利获得通过并立即付诸实行。

撤军计划获得通过正是联合政府组成不久之时，这使佩雷斯感到异常兴奋。新闻界原来预测新政府难以在重大问题上作出决策，佩雷斯认为撤军一案的通过“是对这种煽动性评论的最有力回击”。更重要的是，撤军计划是以色列在墨菲第一次中东“穿梭”后作出的，无形中给了美国里根政府以很大的面子，佩雷斯憧憬着华盛顿能为此给以色列以必要的补偿。

然而，困难不久又出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1985年6月14日，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748号班机在从雅典飞往罗马的途中被两名黎巴嫩穆斯林什叶派游击队员劫持到贝鲁特机场。机上载有135名美国乘客，劫机者提出释放人质的条件是：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764名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

美国驻南欧部队曾制定计划，派特种部队到贝鲁特营救人质。但劫机者将机上人质中的13名转移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营救计划只好予以取消。在本国国内，人质的亲属向白宫提出要求，要里根政府压以色列释放全部被关押的什叶派穆斯林。整个世界的电视网都行动起来了——看看佩雷斯和拉宾如何应付这一局面。

从内心里讲，佩雷斯是准备帮助里根政府化解这场“人质危机”的，问

题是采取怎么样的一种方式。简单地答应劫机者的要求？这恐怕不行，因为里根已表示拒绝向劫机者妥协。而且，就是以色列主动向劫机者妥协，新闻界也会猜想这是出自美国的压力，同样不利于保护里根政府的面子。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以色列对劫机事件无动于衷，美国公众舆论将会谴责以色列忘恩负义，对美国人质的生命漠不关心，同样不利于里根政府今后对以采取“亲近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决定发表一个声明，表明以色列政府准备接受劫机者的要求，但只有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才会这样做。这也就是说，妥协是以色列政府“主动”作出的，美

国只不过是“被动地”接受了这样一种安排。然而，声明一公开发表，佩雷斯就感到此举可能有失策的地方，后来的情况果然证实了这一点。

一天以后，以色列驻美大使米尔·罗森纳转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一个口信，措辞激烈地质问道：“你们清楚我们已表示拒绝向恐怖主义分子投降，我们也不会要求你们向他们投降的！来自耶路撒冷的声明纯属自找麻烦，请让你们的政府明白这一点。”

佩雷斯听到这一口信颇感震惊，于是决定给里根写一封长信，全面地澄清一下问题。在信中他写道：“众所周知，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用在押的恐怖主义分子交换被劫持的无辜百姓。因此，任何一个友邦在确有困难的时候向我们提出类似要求，我们都不会、也不应加以拒绝。我们准备尽自己的努力与您合作，并按您所希望的方式保持高层联系。”

去信没有得到正式的答复，但三天后，白宫的一位高级顾问直接打电话给佩雷斯，告诉他：虽然里根总统不可能对以色列发出呼吁，但总统感兴趣的是，如果人质获释，以色列能否释放在押的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凭着多年从政的敏锐，佩雷斯立即觉察到，虽然以色列没有参与其事，但一定有别的国家正在为释放美国人质而从中斡旋。几天后他得知，从中斡旋者是法国总统密特朗。

6月26日，也就是劫持事件发生12天后，法国外交部向以色列政府发来照会，通报法国方面为解决“人质危机”所做的努力已取得“积极的进展”，劫持者已同意将人质全部送往法国驻贝鲁特大使馆。法方询问，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是否同意释放劫机者要求释放的在押“犯人”。经与沙米尔和拉宾磋商后，佩雷斯及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6月28日，全部人质得到释放。7月1日，以色列也释放了300名被其关押的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相对满足了劫机者的要求。

看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佩雷斯从政多年，可谓经验丰富，为什么会在“人质危机”的初期有上述莽撞的举动呢？事实上，在劫机事件发生前，以色列应美国方面的要求，正为被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绑架的七名美国人质而奔忙。知道这一点，佩雷斯的唐突也就不难理解了……

## 第十六章 处置情报界“丑闻”

1985年5月29日，一位名叫霍华德·泰克尔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来到了以色列总理府，要求见他在美国费城读书时的老同学、佩雷斯的政治顾问尼姆罗德。两人见面后，泰克尔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的名义要求尼姆罗德转告佩雷斯，请他这位以色列总理见一个叫米歇尔·莱丁的人。莱丁的身份是麦克法兰的中东、特别是伊朗事务顾问，但泰克尔嘱咐尼姆罗德一定不要把莱丁的身份透露出去。

6月3日，莱丁走进了佩雷斯的办公室，两人进行了单独谈话。自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推翻巴列维王朝，接管政权以来，美以两国都视这位宣传伊斯兰革命的宗教领袖为它们最危险的敌人。莱丁在谈话中希望加强两国在对付伊朗方面的合作，佩雷斯表示他将选一个合适的人与莱丁共同研究这个问题。

当晚，佩雷斯打电话给前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负责人、当时担任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的施洛莫·盖齐特，要他到耶路撒冷来一趟。几个小时后，盖齐特就像过去当军人那样出现在佩雷斯的办公室里。佩雷斯向盖齐特介绍了莱丁以非官方身份为麦克法兰工作的情况，并强调由于美方对伊朗内部情况不熟悉，所以请求以色列给予帮助。在佩雷斯的安排下，盖齐特与莱丁于次日晚见了面。

1980年盖齐特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研究工作期间曾见过莱丁，所以两人间的谈话开门见山，没绕什么弯子。莱丁自我介绍说，他是麦克法兰所雇的一个“自由枪手”，没有正式的官方身份，且求见佩雷斯的举动也是他自己而不是麦克法兰决定的。他找以色列人士的目的是对付伊朗的霍梅尼政权，但“美国的法律禁止从事直接的和公开的颠覆外国政府的行动”，所以要从美国之外寻求“合作的力量”。当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数年，所以盖齐特询问美国和伊拉克在对付伊朗方面是否“开展了某种合作”。莱丁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言语支吾，这引起了老道的盖齐特的怀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手下的伊朗问题专家，难道对美国在两伊战争中的作用也了解得如此浅薄？谈话结束后，盖齐特向佩雷斯建议说，与莱丁的联系可以保持下去，但要对他本人的身份作认真的调查。

没等下一次接头，拉宾便接到了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打来的电话，询问莱丁以“白宫名义”进行的“神秘使命”是怎么回事。原来，莱丁在耶路撒冷的一举一动都已让美驻以大使莱维斯侦知，于是报告给舒尔茨。多亏佩雷斯事先把情况向拉宾作了介绍，于是拉宾支支吾吾地就把事情搪塞过去了。

舒尔茨对莱丁耶路撒冷之行感兴趣，在于他预见到事情发展下去“将成为一场灾难”——麦克法兰越过正常的外交机关，派一个非官方人士去从事如此重大的工作，如果走漏风声，里根政府将在美国国会陷入一场“民主危机”。舒尔茨为此提醒麦克法兰，后者把问题全推在了莱丁身上，结果莱丁再没有来以色列商量双方的“反伊朗合作”。

莱丁这条线虽然断了，但佩雷斯希望美以在伊朗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情结却没有解开。他一直认为黎巴嫩的真主党是受伊朗支持的反以组织，但由于该党游击队绑架了七名美国人质，美方一直不主张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严厉打击措施，以免伤及自己的人质。倘若先使人质获得释放，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不就取得行动自由了吗？就在这时，另一伙人又闯入了他的眼帘。

以色列商人雅可夫·尼姆罗迪在巴列维王朝统治伊朗时曾当过以驻伊秘密军事联络官，他告诉佩雷斯，伊朗曾想通过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阿迪南·哈肖吉从以色列采购一批美制军火，以补充两伊战争之需。伊朗方面经手此事的人叫马努切儿·高拜尼法，他的钱是从北爱尔兰共和军那里筹来的。尼姆罗迪抱怨说，这笔买卖已经搭上了线，但由于军方不批准，没能成交。佩雷斯又介绍尼姆罗迪去找盖齐特，实际是让盖齐特考察一下能否通过这重关系使美以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得以展开。

6月19日，盖齐特向佩雷斯汇报说，如果有助于介入伊朗事务，他不反对卖武器给伊朗人，但最好先听听美国政府——特别是麦克法兰的意见。前摩萨德特工人员——当时担任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大卫·金奇正巧要去美国进行工作访问，佩雷斯要求他造访麦克法兰，看看后者是否同意武器换人质的交易。金奇去见麦克法兰一事佩雷斯告诉了拉宾，但没有告诉沙米尔，尽管沙当时的正式职衔是外交部长。

金奇去见麦克法兰之前，在美国纽约邂逅佩雷斯的老朋友施韦默。施韦默告诉金奇，经过哈肖吉的介绍，他已经结识了高拜尼法和莱丁（！），并说高拜尼法对伊朗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金奇回国后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向佩雷斯和盖齐特作了汇报，说麦克法兰已为卖武器一事“开了绿灯”。他还强调说，麦克法兰为此请示了里根总统，里根对此予以首肯。

尽管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但盖齐特凭着多年的经验仍感到有些疑问：麦克法兰请示里根总统时，正值后者因鼻癌住院动手术，麦克法兰有机会把问题的前因后果全面地进行汇报吗？迄今为止，哈肖吉与高拜尼法同伊朗政府的联系还是出自他们自己之口，要想做成交易，把握有多大？佩雷斯对盖齐特是既信任，又不像他那样非等到有十分把握才肯起步。他指示盖齐特先与高拜尼法联系，看看武器换人质的路能不能走得通。

盖齐特第一次与高拜尼法联系时只探听了一些伊朗国内的情况，没有提武器换人质问题。但在同时，尼姆罗迪和施韦默已先行了一步，卖给伊朗408枚陶式导弹。几天后，七名人质中的一个叫雷弗兰德·韦尔的被释放了。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谁也不知道，因为伊朗方面从来没对武器换人质给予一个明确答复。唯一明确的事就是，盖齐特不久找到佩雷斯，宣布他退出“伊朗交易”。

时间到了1985年11月，武器换人质的交易出了麻烦。尼姆罗迪随飞机运18枚霍克式导弹飞抵伊朗德黑兰，伊朗人在验货时发现运来的导弹不是他们在定单上所要求的東西，而是过时的旧货。盛怒之下他们把尼姆罗迪扣下来，直到通过一家瑞士银行取回他们的预付款后才放人乘机返回以色列。当然，人质问题也因此没有进展。

不久，麦克法兰也辞去了他所担任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职务，由海军中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接任。这件事对武器换人质行动的一个影响就是：佩雷斯的反恐怖问题顾问阿米拉姆·尼尔向佩雷斯建议，由他来代替原来由金奇、尼姆罗迪和施韦默组成的“铁三角”负责武器换人质工作，因为他与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几位顾问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可巧佩雷斯也盘算着“换马”的事，于是就答应下来。没想到，由于涉及存在瑞士银行的几个秘密帐户及款项的流向，尼尔接手后，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1986年5月，麦克法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奥利弗·诺思中

校和尼尔乘坐一架载有军火的以色列飞机在德黑兰机场降落了。在伊朗人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后，他们公开打出武器换人质的招牌要求进行谈判。尼尔后来说，由于“伊朗人要更多的武器”，所以谈判没能成功。他们在德黑兰经历了四天近乎关押的生活后回到了以色列。

尼尔似乎还不死心。7月份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以色列时，他前往布什下榻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求见。布什向随行的诺思中校征求意见，诺思说尼尔的来访是佩雷斯推荐的，于是布什就单独接见了尼尔。不过，后来出了问题，佩雷斯却一口否认他曾建议尼尔去见布什，布什也否认尼尔曾向他谈起过以武器换人质的事情。

10月份，不知是不是伊朗方面的努力，又有两名美国人质——劳伦斯·詹科和戴维·雅各布森——在贝鲁特得到释放。正当尼尔与诺思电话频繁往来，商讨武器交易与人质获释二者间关系时，黎巴嫩《船桅》周刊突然于11月2日披露了麦克法兰秘密访伊和运送武器的消息。两天后，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公开证实了这一报道，武器换人质交易就此败露。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1月25日，美国司法部在调查中发现，国家安全委员会违反国会通过的禁止向尼加拉瓜内战双方提供援助的决定，把售伊武器所得的部分款项秘密地用来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消息传出，被称作“伊朗门”的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哗然，一场“民主危机”被炒到了热点以上。

伊朗门事件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之时，佩雷斯已与沙米尔对调了位置，当上了外交部长。由于诺思中校在国会作证时说送钱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是尼尔出的主意，国际新闻媒体的注视焦点又转到以色列来，当然更跑不了佩雷斯。

佩雷斯曾邀请沙米尔和拉宾一同找尼尔谈话，劝他实话实说，把真相公之于众。尼尔发誓说他仅参与了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而对尼加拉瓜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佩雷斯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面来对付新闻记者。

佩雷斯告诉新闻记者，他相信尼尔没有参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活动。至于以色列方面参与向伊朗出售美制武器事，佩雷斯解释说，这是为了报答美国在空运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到以色列方面所提供的援助，并促使在贝鲁特的人质获释，以色列本身并无私利。他许诺说，以色列政府已成立了以内阁秘书埃列亚金·鲁宾斯坦为首的专门小组，配合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搜集有关以色列人士参与此事的情况。所有调查材料经以色列内阁批准后，将全部移交给美国方面。

不论事实究竟怎样，佩雷斯在记者面前处乱不惊的举止与神态确实又将国际新闻媒体的聚焦点转回美国。然而，伊朗门事件还是给佩雷斯担任总理期间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泼上了很大的一块斑点：首先，武器换人质行动越过了美国政府的正常外交机构国务院，这使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佩雷斯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停留在极其冷淡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两伊战争的缘故，武器交易引起了许多海湾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的不满，也使得佩雷斯在担任外长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于和平进程方面迈不开手脚；最后，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佩雷斯对伊朗的政策都没有取得成功，伊斯兰旗帜下的伊朗倒逐渐变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如果仅仅有一个伊朗门事件，佩雷斯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或许还好过些，然而，事情显然没有沿着这条轨道前进。

1985年11月19日，佩雷斯的军事秘书爱兹里尔·奈夫急匆匆地向他报告说，几个小时以前，一位名叫乔纳森·波拉德的美国海军文职人员在华盛顿以色列驻美大使馆门前被美国保安人员逮捕。佩雷斯初听报告，习惯性地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在美国，很多犹太商人因偷税漏税而遭逮捕前，总是幻想他们一钻进以色列大使馆内就会受到保护。结果他们还是要走出使馆去应诉，以色列可不愿因这些小事而得罪自己最重要的盟友。他拿起电话与拉宾联系，交谈了一会儿才发现事情不妙——以色列的“罪恶之手”被当场抓到了。

电报像雪片似的一封一封从以驻美大使馆发回，而且报告的内容越看越使人觉得问题严重。美国副国务卿米歇尔·阿马克斯紧急召见以驻美使馆临时代办，在场的还有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法和司法部副总起诉官马克·理查森。阿马克斯告诉以色列临时代办，波拉德已招供曾经出卖美国的情报文件给以色列政府的代表。因此，美国政府正式要求以色列方面为调查取证提供协助，并且把曾与波拉德接头的以色列人姓名告诉美国方面。阿马克斯还要求以色列政府迅速开始自己的调查工作，并把调查结果告诉美方。

乔纳森·波拉德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被捕当年31岁。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他经过考试被美国海军聘为文职情报分析员，先后在“海军行动监视与情报中心”、“海军情报与支援中心”和海军调查局等单位工作过。特殊的工作性质使波拉德几乎能接触到美国政府和国防机构的一切情报材料，除了拥有一台可与联邦情报系统数据库联网的计算机外，还有一张可进入机密文件库并把文件带回办公室分析的借阅证。不用说，这样一个人物若为美国之外的国家服务，他给美国带来的损失是无法用数字计量的。

就佩雷斯初步所知，波拉德是1984年5月首次与以色列情报人员接触的。问题是：以色列情报界的机构繁多，如摩萨德、阿默恩、辛贝特等，究竟是哪一家机构的情报人员和波拉德接上线的呢？经与沙米尔和拉宾研究，佩雷斯觉得国防部科技联络局最有可能。该局实际上也是一个情报机关，简称拉卡姆，当时的局长是曾任沙米尔反恐怖问题顾问的拉菲·艾坦。

佩雷斯找来埃菲·艾坦。该人虽从事情报工作，倒也是快人快语，承认与波拉德的联系是拉卡姆建的，同时也承认此事未经上级批准并且也从未向上级透露过。不过，艾坦强调说，波拉德在向拉卡姆情报人员提供有关材料时说，他本人是美国情报界的“半官方密使”。如果是这样，那么情报就是美国有关机构主动提供的，说不上是在美国搞间谍活动。

为了妥善处理这一事件，佩雷斯、沙米尔和拉宾常碰头儿研究对策。第一次碰头儿是在1985年11月22日，当时已得知，波拉德招认了两个与他接头的以色列人：一个是以色列驻美国使馆空军武官阿维姆·塞勒，另一个是外交官约瑟夫·雅各尔。艾坦在碰头儿会上承认波拉德说的是事实，但又一次强调了波拉德的“半官方密使”身份。听到这些，佩雷斯多少舒了口气。他让外交部通知美国人，以色列愿意在调查工作中与美国有关机构充分合作。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佩雷斯在睡梦中被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打来的电话所惊醒。未等舒尔茨客套性地表示歉意，佩雷斯抢先告诉他：“波拉德的案子有些特殊性，我以前不晓得此事，我的同事也不了解。这完全是一个未经授权的冒失行为，官方从来未予首肯。”他还告诉舒尔茨，艾坦将被解

职，拉卡姆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被解散。

在12月1日举行的三人碰头儿会上作出了建立以色列与美方合作的协调小组的决定。根据沙米尔的提议，佩雷斯任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哈南·巴昂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不过，巴昂建议小组里应有非官方身份的检察人员，于是佩雷斯又把自己的朋友拉姆·卡斯比介绍了进来。卡斯比和巴昂在与有关机构研究了波拉德的案子后，决定在美国调查组抵达以色列前应先赴华盛顿做些事前的了解工作。他们希望有一个部长级的人物带队，佩雷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阿伦斯。

小组到华盛顿后，阿伦斯先以私人身份走访了舒尔茨，然后才在美国国务院法律总顾问索法尔的主持下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官约瑟夫·迪哥诺瓦为首的美方调查组举行了会谈。话题刚开，卡斯比和巴昂就急忙声明，根据维护以色列独立与安全的原则，以政府将有权反对任何阻碍以色列情报机关进行调查工作的行为与举措。这一表态引起美方的质疑，结果仅就这几句话就辩论了三天。

谈到双方的合作原则，也少不了一番争论。美方说波拉德的行为是“反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但卡斯比却坚决要求把这一说法改为“在美国进行的间谍活动”。的确，波拉德提供给以色列的情报多数属于美国情报机关所得到的有关中东地区的信息。特别是那些美国认为属于阿拉伯温和阵营国家的信息，一般是不愿透露给以色列的。说波拉德把这些信息出卖给以色列是“反对美国”，似乎多少有些牵强。经过几次“拉锯”，美国方面终于答应了卡斯比的要求。最后，美以就波拉德事件的调查合作达成三条原则协议：

(1) 美国国务院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波拉德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以色列政府政策的结果；

(2) 基于上一点，以色列决定尽最大可能与美国政府通力合作，以调查破坏美国法律的行为；

(3) 为达此目的，美国将向以色列派遣一个调查团。本协议的达成将有助于使美国政府相信以色列政府的真诚，并为维护两国间历史形成的伙伴关系作出贡献。

原则自然是“原则性”的，说到为美国调查团提供的合作条件时，规定可就具体多了：

(1) 美国政府确信，这项合作协议是以色列政府根据自主权利自愿地与美国方面达成的；

(2) 为了搜集有关这一重大间谍案的信息，美国调查团将询问以色列境内有关这一事件的人员，并从他们手中收回有关文件；

(3) 询问行动将尊重被询问的个人权利并事先取得他们的同意；

(4) 美国政府宣布，它将依据美国法律程序使有关当事人依法得到合法的豁免权，并同意考虑这些当事人的其他要求，如自由进出美国等；

(5)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美国调查团在以色列进行询问时所取得的材料不应被作为证据；

(6) 在以色列境内对以色列公民的询问范围将限于波拉德事件的情况，以色列政府将不允许它的公民回答任何有关情报搜集的问题；

(7) 美国政府保证不泄漏这次调查所得到的任何信息；

(8) 以色列政府同意将目前在它手中原属于美国政府的文件通过适当渠道交还美国方面；



(9) 在保留其为国家安全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的前提下，以色列政府将尽全力与美国政府合作；

(10) 在调查工作结束时，两国政府将研究继续合作的办法。

阿伦斯、巴昂和卡斯比回国后把拟定的两个协议交给佩雷斯，在与沙米尔和拉宾讨论后，协议得到批准。然而，合作一开始，双方又发生了点儿小摩擦。

美国方面要求在自己的调查团未到达以色列前以方人士不得单独询问可能要被询问的人，但巴昂和卡斯比认为，既然协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美国方面就无权禁止他们这样做。于是，巴昂和卡斯比先后询问了艾坦、塞勒、亚戈尔和另一位曾在以驻美使馆工作过的伊里特·厄布。

艾坦在询问中重申，美方的文件是波拉德主动提供的，所以他以为波拉德的举动是经美官方授权而为的。塞勒的说法就更离奇。本来，他是负责与波拉德接头、领取文件并付钱的直接当事人，但他却矢口否认这样干过。他还声称，他的所作所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都知道。巴昂和卡斯比听了这些回答颇感吃惊——要是情况属实，让美国人知道了可如何得了？

更使巴昂和卡斯比吃惊的是，美国人提出的被询问人名单上竟没有塞勒的名字！按照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以色列方面自然无义务把塞勒的名字提出来。但巴昂和卡斯比认为，如果美方调查团在询问其他人时得知塞勒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情形将对以色列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法律总顾问索法尔一抵达以色列，卡斯比就反复向他暗示，在被美方指控为同波拉德联系的亚戈尔背后还有一位“X先生”，但美方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甚至在询问亚戈尔时，亚戈尔也说他与波拉德的相识是通过“X先生”介绍的，然而怀有先入之见的美国人连问“X先生”系指何人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巴昂和卡斯比向佩雷斯作了汇报。经与沙米尔和拉宾商定，佩雷斯告诉以方调查组成员：不承认以色列方面用金钱从波拉德那里窃取机密是站不住脚的，但既然美国人还没有发现塞勒，就应当尽量淡化他在其间的作用。

美国调查组在经过五天的询问后“满意地”离开了以色列，舒尔茨甚至写信给佩雷斯，对以色列方面的“紧密合作”表示感谢。佩雷斯觉得波拉德事件的风头已有所减弱，于是开始考虑艾坦和塞勒等人的职务安排问题。既然拉卡姆已经暴露，这个单位是否继续存在和人员的去留当然应当重新加以考虑。

艾坦与当时担任工部长的沙龙私交甚厚，未等佩雷斯替他选定职务，就由沙龙任命为以色列化工公司的董事长。沙米尔和财政部长莫达伊这两个利库德集团的阁员也在任命书上署了自己的名字——按照以色列法律，这是任命大型国营工业公司领导人所必需的。然而，对艾坦的任命却激怒了美国人。美官方说，这一任命违背了以色列政府不久前关于要惩治波拉德事件以色列方面当事人的承诺。对于这一指责，佩雷斯倒是找到了一条解脱的途径。过去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谴责沙龙时，沙龙曾请当时还担任律师工作的索法尔为其代理起诉《时代周刊》的业务。于是佩雷斯告诉索法尔，既然他与沙龙是旧交，艾坦的任命是否得当可找沙龙加以解决。

塞勒从美国回国后被提升为准将，并被任命为以色列最大的空军基地特尔诺夫基地的司令。就在美国人对艾坦的任命提出指责的同时，他在波拉德

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被美国方面发现。特别是美国人了解到塞勒担任了特尔诺夫基地司令时，下令只要塞勒还在任上，就不许任何美国官员前往该基地，连当时担任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 1986 年访以期间也拒绝了以方的参观该基地的安排。由于特尔诺夫基地一直是以美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的场所，美国的决定使这种合作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塞勒准将辞去了他所担任的一切军职。

佩雷斯等人替艾坦、塞勒等人“淡化罪责”的手法自然使美国人感到恼火，殊不知以色列方面在淡化波拉德本人的罪责方面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波拉德被捕后，以色列立即开始了秘密的游说活动，而且为这种游说和诉讼花费了 200 万美元的钱财。然而，美国人的恼怒也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卡斯珀·温伯格写信给法庭说：“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会比这位被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一位美方调查团的成员甚至说，就波拉德的间谍活动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在艾坦和塞勒等人背后“还应当有一名更高级别的谍报系统领导人”。1987 年 3 月 4 日，波拉德被美国法庭判处终生监禁，他 26 岁的妻子也以从犯判处 5 年徒刑。自那时开始，历届以色列总理（不论他属于哪一个政党）每年都要向美国总统求情，恳请美国当局释放波拉德。1989 年，波拉德未经申请而被批准加入以色列国籍。以色列当局还曾提出以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三方互换间谍的方式换回波拉德的建议。在本书写作之时，波拉德仍身陷囹圄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灵魂似乎已返回了这个民族梦中的天堂……

拉卡姆是佩雷斯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期亲手创建的机构，但因波拉德事件而不得被解散。然而，佩雷斯并没有因解散拉卡姆而避免在他与美国情报界、美国犹太人和美国资深政治家的关系上受到损害。一个时期内，美以之间出现了疑惑的阴影，美国犹太人也受到了“双重忠诚问题”的困扰。但是，在美以之间，感情上的伤害不知为什么总能为“战略的现实”所替代，美国总统里根的任期未届满，双方又找到了新的、更加灵活的合作途径。

波拉德事件对佩雷斯是一个考验。如果人们知道当时他在情报界遭遇的其他事情，人们就会明白，那仅仅是一个考验……

1985 年 11 月的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第二把手鲁文·哈扎克突然要求会见当时担任总理的佩雷斯。尽管只是在几次重要的会议上与哈扎克见过面，但佩雷斯知道，这位相貌堂堂的保安负责人是自己的老朋友，是辛贝特领导人阿弗拉姆·沙洛姆的内定接班人，于是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谁知，这次会面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一场激烈争论：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否可以有违于法律的制约？

引发争论的事件发生在 1984 年 4 月 13 日。当天傍晚，一辆公共汽车在驶往加沙的途中被四名据说是“阿拉伯恐怖分子”的人所劫持。四人将乘客扣为人质，要求把车开过边界，进入埃及，但在阿什克隆附近被辛贝特领导的保安部队所拦截。晚一些时候，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阿伦斯和沙洛姆都赶到了被巨大的探照灯照得有如白昼的现场。在通过电子设备监测到恐怖分子手中并没有速射武器后，保安部队发动了营救行动。夜间，以色列官方报道说，在营救行动中，除一名妇女被恐怖分子打死外，全部人质都已获救，而四名劫持者皆被击毙。

在辛贝特的历史上，类似成功的营救行动已进行过 20 余次，像往常一样，致敬信和鲜花纷纷向保安部队的突击队员们飞来。然而，就在这时，一

名叫亚列克斯·利巴克的记者却报道说，在执行营救作战中，只有两名劫持者被击毙。换言之，另两名劫持分子是在被捕后未经法庭审判而被保安部队枪杀的！利巴克还出示了照片，那上面清晰地表明突击队员正将一名劫持者从汽车中带出来。

未经法庭审判就枪杀被俘者，这是破坏法律的行为，同时也严重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阿伦斯声称他不敢肯定杀害被俘者的事件是否发生，于是指派了一个由预备役少将梅尔·佐雷亚为首的委员会调查此事。不久，又成立了以国家检察官约纳·布拉特曼为首的司法调查委员会。根据这两个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当时指挥突击部队的伊扎克·莫德凯准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审。不过，军事法庭在听取了莫德凯准将的辩护后几次推迟了宣判，实际上使被告摆脱了杀害被俘者的指控。结果，杀害被俘者事件在公众中引起反响，他们要求司法当局说明白是谁杀了那两名营救行动结束时还活着的劫持者。这就是佩雷斯接见哈扎克前的全部案情进展情况。

哈扎克告诉佩雷斯，沙洛姆在法庭审讯莫德凯准将时为被告准备的一些证据是伪造的，所以他认为只有解除沙洛姆的职务才能有助于案件的审理，同时也能使辛贝特组织更加纯洁。说到这儿，佩雷斯似乎明白了问题的所在——哈扎克这个一直受到沙洛姆重用的少壮派人物现在要夺沙洛姆的权，而杀害被俘者只不过是这一目的的借口罢了。于是佩雷斯问哈扎克：“既然伪证不是今天作的，那么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呢？”哈扎克解释说，在沙洛姆的压力下，辛贝特中的成员有五人在布拉特曼委员会调查时作了伪证，为了不使这五个人受到伤害，他必须等布拉特曼委员会调查结束后再把这件事报告上来。

哈扎克走后，佩雷斯立刻找来他的老朋友沙洛姆。听完佩雷斯的一番话后，怒气冲冲的沙洛姆说，按照有关规定，他本人应当于1986年底退休，但哈扎克急于接班，所以伙同辛贝特的两名处长——皮莱格·拉戴和拉菲·马尔卡想把他搞下台。沙洛姆还暗示说，前总理沙米尔和前国防部长阿伦斯知晓全部事实。换言之，伪证是在沙米尔和阿伦斯的指使下作出的。

从一般的政治规律上讲，既然沙米尔和阿伦斯已经卷入此事，揭发出来肯定对这两人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这不正是削弱利库德集团的影响、增强工党实力的天赐良机吗？然而，50年代拉冯事件对佩雷斯的印象太深了——揭露对手的丑闻不一定对自己有利，本—古里安和拉冯不就是闹得两败俱伤吗？出于这种考虑，佩雷斯找沙米尔谈了自己的看法：把辛贝特的创伤公之于众将损害这个国家安全机构的形象，从而影响到国家安全本身。沙米尔当然不愿“丑闻”暴露，于是两人决定：哈扎克、拉戴和马尔卡——不是沙洛姆，应当辞职。看来哈扎克依照辛贝特的纪律别无选择，于是他们三人递交了辞呈。

杀害被俘人员的事情还没搞得水落石出，辛贝特未来的负责人又辞职了，议论自然会产生出来，而且还传到国家总检察长、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律系主任伊扎克·扎米尔的耳朵里。扎米尔找到哈扎克等三人，在了解完情况后要三人各自写了陈述，并把这些陈述交给了佩雷斯。扎米尔以一个法学权威的身份告诉佩雷斯，他确信包括莫德凯准将在内的许多人在法庭上作了伪证；现在要调查的是：是否有人在这方面施加了非法的压力。

以色列毕竟是一个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国家，佩雷斯知道自己难于掩盖一切，于是又找来了沙洛姆，要他想办法“以某种方式”满足法律

所提出的要求。没想到沙洛姆直截了当地提醒佩雷斯：在法庭上不讲真话对辛贝特这样从事某种秘密行动的机构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国家安全，这是完全必要的。佩雷斯打心眼儿里赞同沙洛姆的这种看法，再加上沙本人又是当年把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克曼抓到以色列受审的功臣，所以决定由自己想办法，“以某种方式”在国家安全和遵守法律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为了自己的老朋友，佩雷斯采取了一项他后来不愿向人谈起的办法：扎米尔几个月前已经因个人原因向政府提出辞去总检察长一职的请求，而这一请求与辛贝特内部的情况毫无关联，佩雷斯抓住这一点，批准了扎米尔的辞呈。他并且找到司法部长摩西·尼西姆，要求后者加快推荐新的总检察长的工作。不用说，扎米尔对此时佩雷斯的一系列举动当然感到不满。

佩雷斯还找来老朋友拉姆·卡斯比，要其为沙洛姆想想办法。于是卡斯比找到沙洛姆，说想听听后者“对问题的看法”。

沙洛姆对卡斯比倒是开诚布公，一谈话就告诉后者：被俘者遭杀害的次日他就向当时担任总理的沙米尔作了报告，并要求由自己来承担一切责任。沙米尔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并且还要沙洛姆派一个人去佐雷亚委员会，目的很显然——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沙洛姆选派了一个叫吉诺萨的辛贝特资深官员进入佐雷亚委员会，果然，他通过与调查委员会将要询问的辛贝特成员先碰头、修改证据等方法使得佐雷亚委员会认为莫德凯准将是事件中地位最高的当事人，从而忘记了沙洛姆的存在。

沙洛姆如此坦白地告诉给卡斯比全部事实真相，这更加强了卡斯比要为沙洛姆想办法的决心。1986年4月6日，卡斯比向佩雷斯、沙米尔、拉宾和司法部长尼西姆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新的总检察长就职前停止一切审理活动，而且今后的调查与审讯也不应拘泥在前任总检察长所定的框框内。

正当佩雷斯准备以卡斯比的报告为蓝本处理杀害被俘者一案时，扎米尔迈出了他离任前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利用总检察长的合法职权找到了被解职的原辛贝特处长拉菲·马尔卡，不仅了解到沙洛姆指使工作人员作伪证的情况，还得知许多过去辛贝特成员为搞到更多活动经费而进行走私活动的细节。1986年5月18日，他向内政部警察事务总检察官——除总检察长外唯一可以调查辛贝特活动的合法官员——大卫·克劳斯递交了一份正式控告书，要求对辛贝特所从事的非法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杀害被俘者事件就这样成了辛贝特事件。

事情的进展已迫使沙洛姆不得不出来为自己辩护，他承认那两名公共汽车劫持者是在被俘后“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而丧生的。但他又指出，事件发生前五个月，当他为一般性反劫持行动去请示当时担任总理职务的沙米尔时，后者曾下达过“不许生擒俘虏”的指示。沙洛姆的说法被沙米尔一口否认。由于总理与情报机关负责人谈话时通常都没有第三者在场，谁也无法证明究竟是沙洛姆还是沙米尔讲了真话。

事情到了类似当年拉冯事件的关键时刻，佩雷斯不得不召集内阁全体成员秘密开会。或许是考虑到把问题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内阁作出了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扎米尔曾建议过的决定：沙洛姆与哈扎克、拉戴和马尔卡都被解除职务，同时赦免包括莫德凯准将、吉诺萨在内的11名辛贝特违法人员。佩雷斯没有实现保住沙洛姆职位的初衷，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也没像本一古里安那样在拉冯事件中被搅得精疲力竭。

为了安慰沙洛姆，佩雷斯利用自己与以色列富翁肖尔·艾森伯格的私交

给这位辛贝特的前负责人找到一份收入颇为可观的工作。至于佩雷斯自己，他好像是对错综复杂的国内事务感到了一种特别的厌倦，因此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外部活动中去。

## 第十七章 国际会议问题

利库德集团当政七年，除了在与埃及的和平进程中取得突破外，在与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关系中毫无进展。约旦国王侯赛因曾表示愿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条件是归还 1967 年后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这一点是利库德集团政府坚决拒绝接受的。为了防止有朝一日工党上台执政把西岸地区还给约旦或巴勒斯坦人，利库德集团政府采取了在西岸扩建移民定居点的政策，其中最得到鼓励的，是青年犹太教极端主义分子组成的“信仰者集团”。然而，真正愿意移居西岸被占领土的以色列公众只是极少数。从 1967 年以后，只有一两千户居民移居该地，而且大多数人还是白天到以色列本土上班，晚上才回到定居点。

准确地说，在被占领土建设定居点的政策来源于以前的工党政府，佩雷斯与拉宾都曾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吹者。然而，经历了反对派的生涯，看到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佩雷斯的思维逐步发生了变化——“从 70 年代初期的鹰派变成了 80 年代中期的鸽派”，口号是“土地换和平”——以色列撤出它 1967 年占领的别国土地，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并与其实现关系正常化。正是出于这一点，工党在参加联合政府的协议上写上了“不在西岸建立新的定居点”的条款。换言之，也就是“冻结现状”。

“土地换和平”，用土地与谁换和平呢？在这方面，佩雷斯并非愿意跨入每一扇向他敞开的大门。到他担任联合政府总理时，他依然相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是和平伙伴，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对以色列的生存是一种威胁。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了“约旦选择”，也就是与约旦实现和平，把西岸的土地交还给约旦。

佩雷斯成为以色列联合政府的总理，约旦国王侯赛因明白，这是开展以前停顿了的约以对话的极好机会。然而，侯赛因在这方面也面临困难：如果他抛开巴勒斯坦人单独同以色列对话，他将在阿拉伯世界中承受难以负担的压力。出于这一考虑，他在 1985 年邀请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到安曼，签订了一个由约旦和在西岸的巴勒斯坦实体组成邦联的协议。两人还同意，应当召开一个国际会议，邀请“所有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参加”，从而和以色列展开谈判。

侯赛因和阿拉法特的协议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美国方面认为，如果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苏联的插手就难以避免，所以拒绝了这方面的建议。佩雷斯就更不用说，他告诉记者，不管是国际会议还是其他什么论坛，只要有巴解的代表参加，以色列决不会在这种场合开始谈判。他的这番话在以色列国内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这倒是他事前没有想象到的。

还有一件令佩雷斯想不到的事，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似乎从其中悟出了什么道理来。在访问美国期间，穆巴拉克告诉《新闻周刊》的记者，有关各方在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并不像新闻界说得那么大：约巴代表团中的巴方代表只要声明不是直接隶属巴解组织的人士，以色列方面还有什么不可与其直接谈判的理由呢？如果美苏参加这个国际会议仅从事构造直接谈判的“框架”，又有什么“插手中东事务”可言呢？最后，穆巴拉克呼吁美国召开一个有以色列代表团和约巴代表团参加的“预备会议”，为直接谈判打开通路。

穆巴拉克的看法在巴解方面遭到“冷遇”，但却引起了佩雷斯的注意。

他找来拉宾、内阁秘书约西·贝林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埃胡德·巴拉克，共同商定了一个分三个阶段进行谈判的计划：第一阶段，由美国、埃及和约旦进行谈判，把约旦“拉回”和平进程；第二阶段，由美国、埃及和以色列进行谈判，改善因黎巴嫩战争而“冷却”的埃以关系；第三阶段，举行以色列、埃及、美国和约巴代表团（只包括非直接隶属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士）之间的四边会议，谈判涉及西岸地区的约以和约。

佩雷斯把计划寄给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并建议后者派一名特使赴中东推行这一计划。舒尔茨对这一计划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派出了自己的私人助理理查德·墨菲前往中东。墨菲使命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墨菲幽会”，因为按照舒尔茨的指示，他可以在安曼秘密会见“可以接受的”巴勒斯坦人士。

然而，“墨菲幽会”在推行三阶段谈判计划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1984年11月底，墨菲在结束对安曼的访问后来到耶路撒冷。他告诉佩雷斯，尽管侯赛因对美国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表现出兴奋的心情，但却坚持说国际会议是最理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约旦国王建议这个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由联合国秘书长或美国总统主持都可以。显然，侯赛因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表明，他与以色列人的谈判并没有“出卖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后来舒尔茨在给佩雷斯的信中又概括了约旦国王的立场：要求对话，但必须是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新闻界无不揶揄地评论道：“墨菲幽会”千古，国际会议万岁。

佩雷斯自然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在他看来，僵局是比任何细微的推进更危险的事情。尽管他对国际会议仍抱着抵触的态度，认为那只不过会给一些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制造攻击以色列的机会，但他也不愿因此长期僵持下去。1985年10月他赴美访问途中，专程在英国伦敦停留了一下，去会见他的老朋友——约旦国王侯赛因。

侯赛因在伦敦的寓所距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只有数百码之途，安排一次秘密会面并不是一件难事。两人已经有数年没有见过面了，所以相互寒暄也花了不少时间。

或许是“他乡遇故知”的缘故，佩雷斯在与侯赛因进行实质性问题讨论时第一次有条件地接受了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想法。他告诉约旦国王，他不赞成大国在国际会议上扮演“太积极的角色”，而愿会议开始不久有关冲突各方就分头进行直接谈判。后来佩雷斯把这一想法告诉给在国内的沙米尔，沙米尔也表示加以支持。

在美国，佩雷斯就他与侯赛因的秘密会谈向美国总统里根和国务卿舒尔茨作了通报，得到了两人的积极支持。美国方面决定，原先打算提供给约旦的一批武器将于侯赛因国王宣布解除与以色列的战争状态后再发货，从而“促使”约旦尽早与以色列进行公开接触。在结束对华盛顿的访问后，佩雷斯又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宣布以色列准备接受国际会议作为解决中东冲突的办法，这一立场得到了一些西欧和美洲国家的支持。然而，在中东，佩雷斯的表态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约旦国王在得知美国把军售与和平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消息后，公开宣布他“不准备支付销售者索要的政治款额”。在以色列国内，尽管沙米尔并不反对“国际会议”的主张，但利库德集团几名阁员却站出来加以反对，为首的就是以粗鲁莽撞闻名的工贸部长沙龙。

自从联合政府成立后，沙龙一直在内阁中扮演着“坏小子”的角色。过去他明知以色列的财政状况已不容许它在西岸地区建立新的定居点，但却在

公众中散布佩雷斯的“冻结定居点政策”有如当年英国禁止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的谬论。这一次，他不仅向新闻界透露约以间伦敦秘密会谈的情况，还指责国际会议将把国家带到“灭亡的边缘”，抨击佩雷斯把政府领上了“一条洒满鲜血的邪路”。

佩雷斯觉得自己不能再忍耐了，他决心把沙龙从内阁中赶出去。根据当年建立联合政府的协议，免去某党一位阁员的职务要得到该党领袖的首肯。佩雷斯就此事找到沙米尔，但被沙米尔一口拒绝。于是佩雷斯召集内阁工党成员开会，一致作出决定：如果不严厉处置沙龙，工党将退出联合内阁——一场“内阁危机”爆发了。

佩雷斯执掌内阁 14 个月来，以色列的经济状况已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倘若此时工党退出政府，利库德集团的政治地位只能恶化而决不可能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沙米尔只好压沙龙让步。于是，沙龙向报界表示，他对自己抨击佩雷斯的言论表示“深深的遗憾”，工党阁员在开会研究后也决定不再坚持要沙龙退出内阁，联合政府因此也从分裂的边缘回到了继续下去的道路上。如果能以“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这次“内阁危机”的结局，那就是，议会通过了佩雷斯以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佩雷斯的个人主张由此成了以色列的国策。

时间因素对佩雷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10 个月以后，他将把总理职位转让给沙米尔，因此迫切要开创一条沙米尔上台后想挡也挡不住的约以谈判之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佩雷斯相继提出了由经济发达国家向中东地区投资的“中东马歇尔计划”，开通红海至死海运河以利用水流落差发电的“红海—死海工程计划”，由以色列提供适用技术改造沙漠和盐碱地的“绿化中东计划”。这三个倡议，是希望以经济援助方案吸引有关阿拉伯国家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

为了推行“国际会议方案”，佩雷斯还秘密地赴约旦的亚喀巴市，再次会见了侯赛因国王。看来侯赛因并不希望巴解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他要求以色列方面在国际会议召开前应满足约旦对西岸地区的某些要求。在这方面，佩雷斯与侯赛因持几乎一致的看法，所以爽快地请约旦国王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几星期后，侯赛因在访问华盛顿时通过美国方面转来了被称为“约旦计划”的 11 点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1. 在西岸地区 4 至 5 个市镇指派亲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士担任市长；
2. 扩大西岸 8 个市镇行政当局的管辖面积，从而使 1967 年战争后约旦政府一直在西岸征收的地方税款额能有所增加，其他 6 个市镇和 24 个村庄在稍后也应扩大管辖面积；
3. 允许约旦银行在西岸地区重新开设分支机构；
4. 以色列当局应降低上述区域外的巴勒斯坦人的税赋；
5. 取消巴勒斯坦人经过阿仑比桥赴约旦时所收的过桥费；
6. 以色列应投资扩大西岸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
7. 以色列应停止在西岸征用土地，并把原先进行农业生产、后被以方征用的土地发还原所有者；
8. 采取措施对西岸地区的亲巴解报纸进行控制；
9. 采取措施阻止巴解在西岸的学校中扩大影响；
10. 冻结建设新的犹太定居点，原有的定居点也不应扩大；
11. 批准目前流寓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回西岸与家人团聚。



对于这个“约旦计划”，尽管内阁中有不少人反对，但佩雷斯还是尽可能满足其要求。根据约旦方面所提的名单，西岸的以色列当局任命了三名亲约的巴勒斯坦人担任市长。一家约旦银行也被允许在纳布卢斯市开设了分支机构。对于亲巴解组织的报纸，不用说，以色列更是严厉加以控制。不过，出于安全的考虑同时也根据拉宾的建议，佩雷斯在发还被征用土地、同意亲人团聚和扩大市镇行政当局管辖范围方面还是没作让步的。在佩雷斯看来，约旦国王提的是“高要价”，而自己所作的让步应当能使侯赛因得到一定的满足感。

为了在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上取得突破，佩雷斯还加强了与另外一位阿拉伯君主的联系，这就是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1986年7月22日，佩雷斯抵达摩洛哥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与以往来去行踪诡秘不同，这次访问是公开进行的。尽管机场上并没有铺红地毯，与哈桑二世的会谈也没有涉及最实质性的问题，但公开会面本身就增强了佩雷斯推进国际会议召开的信心。这一期间，他除了这一点，几乎没有想过别的事情。

9月11日，佩雷斯率领包括埃泽尔·魏茨曼、阿巴·埃班和利库德集团议会党团领袖麦里多尔等重要人士在内的代表团抵达埃及。戴维营协议所遗留的埃以塔巴领土争端在利库德集团当政时长期得不到解决，佩雷斯担任总理后说服各派人士，同意将争端交由国际法院裁决，这使黎巴嫩战争后变冷的埃以关系得到改善，由此访问也得以成行。在亚历山大城机场，佩雷斯享受到了检阅埃及仪仗队的殊荣，但最使他惊喜的是，他发现采访记者中出现了中国记者的身影。他不禁想起了本一古里安，这位“老人家”一生都想到新中国的领土上去看一看，但到头来还是抱恨终生。佩雷斯暗下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实现本一古里安未实现的理想。

从埃及返回后佩雷斯只在国内呆了一天，然后就乘飞机飞往美国。到华盛顿拜访美国总统里根和副总统布什是这次访问少不了的“节目”，但更重要的是，1986年9月22日，佩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里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自从1967年苏联中止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后，两国高级别的领导人还从来没有这样会晤过……

佩雷斯非常耐心地向这位格鲁吉亚血统的苏联外长介绍了中东政治形势和关于召开解决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工作的进展情况。最后他强调说，恢复苏以外交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他希望谢瓦尔德纳泽在接替曾经是世界上担任外长职务最长的葛罗米柯后能把它作为一项“新举措”展现在世界面前。

尽管佩雷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谢瓦尔德纳泽却保持着葛罗米柯式的矜持和冷漠。他先说时间很紧，没时间多谈，随后又说佩雷斯谈的问题很重要，所以，需要时间加以研究。但他开口谈正经事情时，却给人以口若悬河的印象。他说：“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苏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为此感到骄傲。我们当时是以历史的公正性为指导的。我们认为犹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也有权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今天，当我们谈起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时，我们也应为巴勒斯坦人争得公正。自从我们两国中止外交关系以来，你和你的人民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所以，目前还谈不上恢复我们之间的联系。”

佩雷斯劝谢瓦尔德纳泽不要太激动，没想到却使苏联外长失去了冷静——“你们的政策是公开反苏的！比如，你们参加了危害和平的‘星球大战计划’，从而造成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我们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另外，‘美国

之音’和‘欧洲之声’在以色列共建了三个发射台，用以对苏联公众进行广播宣传。所以，当你们谈起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你们应当感到压力在你们一边。总理先生，我很遗憾地说，是你们一直在人为地制造障碍。”说到这里，谢瓦尔德纳泽缓了一口气，脸色似笑非笑，看着佩雷斯说：“你倒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我读过好几遍你的传记。”

正当佩雷斯的助手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时，佩雷斯倒是诙谐地对上了一句：“你说得太可怕了”。随后两人放声大笑……

当笑声停下来时，谢瓦尔德纳泽的口气平静下来，话题也转到了国际会议问题上。他说，苏联方面的看法是：只要会议是“积极的”，苏联将不反对以这种方式解决中东问题；同时——“苏联希望知道，既然你已说过你们不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你能告诉我你们是如何界定这个民族和它的权利吗？巴勒斯坦人是否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有自决权吗？”

佩雷斯回答说：“我们承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在这方面毫无异议。如果事情是一块土地上只居住着一个民族，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然而，现在是一块土地上住着两个民族，因此和平相处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划分成两个国家，或是像苏联一样，实行联邦制。”

谢瓦尔德纳泽笑了笑，冷冷地说：“苏联各族人民是自愿结成联邦的，而且是以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为基础的……”

没等谢瓦尔德纳泽话音落下，佩雷斯紧接着说：“我熟悉列宁的著作，而且也熟悉斯大林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论述，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建立联邦或实行民族自决必须以协议为基础来执行。”

“好！”谢瓦尔德纳泽忍不住叫起来，“你学到了我们的方法，那就让我们按这种办法来准备中东国际会议吧！”

佩雷斯的目的是达到了——苏联至少是已不反对召开中东国际会议。更使他感到兴奋的是，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谈结束时突破了事前约定的礼宾规则，亲自送佩雷斯到电梯门口，并且在记者的镁光灯下长时间地与佩雷斯握手——这也是佩雷斯事前没有预期到的。

1986年10月20日，佩雷斯打点自己的个人物品离开总理办公室，根据联合政府协议与沙米尔对调，去外交部担任部长职务。虽然仍对召开国际会议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不得不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付国内的问题。这是因为，沙米尔对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态度已从基本赞同转向了公开的反对。他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国际会议是“与魔共舞”，是以色列的“自杀陷阱”。

按照代议制政体的一般常规，佩雷斯本应把沙米尔对国际会议设想的攻击“扩大”为一场联合政府的“危机”，从而迫使这位既是对手又是合作者的总理在行为上有所收敛。但政治上的直觉告诉佩雷斯，同意“以土地换和平”，同阿拉伯邻国实现和平的人在以色列国民中还处于少数，任何在议会或全民投票中就这个问题与沙米尔决一雌雄的打算都是愚蠢的行为。看来中东和平之路只能按这样一种程序加以推进：先实现“领导人之间的和平”，再实现“人民之间的和平”——这两个阶段或许可以统称为“国家间的和平”。

出于这种考虑，佩雷斯对沙米尔的谈话并没有作出直接反应，只是以只有他、沙米尔和拉宾三人知晓的秘密行动作了回答。出任外长不久，佩雷斯通过美国方面的安排前往伦敦，再次秘密会见正在那里的约旦国王侯赛因。

作为一名资深政治家，侯赛因显然明白倘若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单独执

政，会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局面。秘密会谈虽然没有太大的进展，但侯赛因提出，应当把双方已经同意的东西落实在某种文件上，这一建议已足以使佩雷斯喜出望外。陪同佩雷斯会见侯赛因的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约西·贝林根据双方的看法整理出一个文件，文件的时间与地点记录为：1987年4月11日，伦敦。

第一节关于召开国际会议并开始以色列同其邻国之间面对面谈判的协议。

双方对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会议中的作用以及国际会议本身的作用有如下相同看法：

1. 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在邀请有关方面参加国际会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为开始以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和 338 号决议为基础，旨在实现本地区全面和平、保障各国安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的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将向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阿以冲突的有关各方发出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

2. 关于国际会议邀请有关方面参加双边和地区间和平谈判问题。

与会各方同意，谈判的目的是以安理会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为基础以寻求阿以争端的和平解决，并和平地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会议将邀请有关方面参加双边委员会，从而在双边基础上进行谈判。

第二节以色列在进行直接谈判、确定会议参加者和其他相关事项上的立场。

1. 程序。

a. 会议一召开就应立即开始在以色列和它的邻国间进行和平谈判，会议本身并不是为谈判进行准备工作的论坛；

b. 谈判应是直接和面对面的，而且应在双边基础上进行；

c. 未经进行双边谈判的各方一致同意，第三方不得介入；

d. 双边谈判应独立进行，不受其他双边谈判的影响；

e. 会议不得将某一解决办法强加于进行双边谈判的各方，也不得取消它们已达成的协议；

f. 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应在约巴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之间以双边方式进行；

g. 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同意，任何谈判程序的改变和与会者成分的改变都将导致以色列代表团退出会议。

2. 会议参加者。

a. 作为与会者的条件，所有会议参加者都必须接受安理会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并表明他们与暴力和恐怖活动没有任何牵连；

b. 如果巴解成员参加会议和谈判，以色列代表将退出会议和谈判；

c. 苏联和中国的代表参加会议应恪守政策平衡的义务，特别是应首先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另外，苏联代表参加会议的先决条件是改变该国政府对苏联犹太人的政策，特别是承认他们有移居以色列的权利。

第三节与美国政府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同意请美国国务卿起草一谅解备忘录，说明美国政府对下列各款所作的承诺：

1. 美国政府支持上述第二节有关程序事项的各个条款；

2. 如果有第三方破坏会议的程序规定，美国代表团将与以色列代表团一

起退出会议，并宣布该第三方应对谈判的中止负全部责任；

3. 美国是否继续恪守它的承诺，要依据它 1975 年所作出的与巴解组织对话的先决条件而定；

4. 只要以色列和其任何一个邻国所进行的谈判还在继续进行，美国将承诺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就所有谈判所涉及的事项作出决议；

5. 美国承诺在与第三方共同提出有关程序或技术性建议前与以色列保持不间断的磋商。

第四节关于落实本文件第一、二、三节的有关事项。

双方同意尽早邀请美国国务卿访问以色列，就下列事项进行美以间的双边磋商：

1. 拟定美以有关上述国际会议的谅解备忘录；

2. 就有关各方是否同意参加上述国际会议共同进行探寻。

佩雷斯摸清了约旦国王只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会议中同以色列开始双边和谈，所以他在满足了这项要求后，一下子加进了许多对以色列有利的条款。佩雷斯原本认为这样做会使沙米尔至少保持沉默，没想到一提到内阁会议上，沙米尔就表示，通过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已完成了安理会 242 号决议所规定的一切“义务”，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可以享受某种自治，但要把它还给约旦、甚至巴勒斯坦人，那是绝不能答应的。两党的部长们又进行了投票，结果仍是 50% 对 50%，这意味着，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计划在以色列内部就通不过。

佩雷斯希望美国人能对利库德集团施加一些压力，没想到美国驻以大使传来消息——贝林起草的文件要美国承诺的条件太多，倘若那样做了，就有把和平条件强加给阿拉伯国家之嫌。不消说，这也是向佩雷斯的计划亮了红灯。

直到 1987 年 10 月佩雷斯访美时才有可能再一次向舒尔茨重提国际会议问题。这一次舒尔茨告诉他，由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同意和美国签订中程导弹协议，他想乘机机会说服苏联领导人同意召开一次小型中东国际会议，参加国除苏美外，还有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舒尔茨相信，这种小型国际会议，既容易说服有关国家参加，也容易在某个方面取得突破。

佩雷斯是怀着乐观的心情把舒尔茨的小型国际会议计划告诉沙米尔的，但沙米尔提出的前提条件却无疑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除了复交和允许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外，还要求苏联在小型国际会议召开前正式邀请他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能买里根的帐，但却不会“屈就”沙米尔，佩雷斯知道沙米尔这是在存心制造障碍。

如果说佩雷斯的热情受到冷落，舒尔茨的境遇也不太好。在约旦首都安曼，侯赛因告诉这位美国国务卿，“正常的征询意见的程序是先问叙利亚和巴解组织是否同意这个计划”，这也无异于说他本人是不会首先表态的。待到舒尔茨飞往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游说小型国际会议计划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中程导弹协议与中东问题是两个不应当“绞在一起的课题”。显然，中程导弹协议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舒尔茨不假思索就把小型国际会议计划放在了一边。

几乎在舒尔茨游说失败的同时，1987 年 12 月 8 日，在加沙发生了以色列人驾驶的卡车撞死数名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当日下午，千余巴勒斯坦人抬着死者的棺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送葬游行。送葬的队伍随着沿途不断加入的

巴勒斯坦人而越来越大，太阳快要落山之时，队伍里突然打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人们高呼反对以色列的口号，悲痛的送葬迅速变成了愤怒的示威。

次日，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像冬季草原上的火星一样迅速在加沙和西岸地区蔓延开来。青年人拿起石块向以色列军队的巡逻车投去，道路上每隔一段就出现被点燃的汽车轮胎，一场被占领地区的“大起义”爆发了。

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起义”进行了严酷的镇压，结果引起包括美国高层人士在内的世界舆论的谴责，1988年6月，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的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专门讨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首先让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实现自决，然后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约旦国王侯赛因鉴于这一决议，宣布约旦断绝与西岸的“法律和行政联系”。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是以约巴合为一个代表团为基础的，现在约巴间的“法律和行政关系”被切断，实际是宣布国际会议计划的彻底破产，佩雷斯四年来的努力也完全归于失败。

## 第十八章 回归第二把交椅

1988年11月对佩雷斯来说是一个沮丧的月份。月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19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特别会议宣布正式建立巴勒斯坦国，并由巴解执委会行使临时政府的职权。任何人都知道，如果今后以色列同意“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解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难以避开的谈判对手。

不过，对佩雷斯来说，当月最不幸的事情还是刚刚结束的以色列第12届大选。工党在议会取得了39个议席，比上届减少了一席。而利库德集团取得了40席，以一票之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按照利库德集团的竞选纲领，沙米尔完全可以联合几个右翼宗教小党执政，但他却再一次找到佩雷斯，建议再一次联合组阁。

经过与党内人士痛苦甚至是有些悲哀的磋商后，佩雷斯接受了沙米尔的建议。不过，工党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虽然拉宾保住了国防部长的职位，但佩雷斯却不得不把外交部长一职让给利库德集团“鹰派”人物阿伦斯，自己去充任财政部长；工党还被迫同意1989年在两岸地区新建5至7个犹太定居点，而在以前，为了促成和谈，它是一直拒绝这样做的。报界评论说：工党主席这个位置，佩雷斯“怕是坐不长了”。

佩雷斯忍辱负重，自然也有自己的道理，1988年12月，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发表谈话，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放弃恐怖主义，谋求与以色列直接会谈，实现以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两主权国家并存为基础的和平。阿拉法特的这一立场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温和派的阿拉伯产油国的积极支持，这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出于自身利益而变换自己的政策。当月，美国驻突尼斯的外交官第一次直接与巴解官员对话，并商定将这一对话不定期地继续下去。佩雷斯考虑到美国政府今后将会劝说以色列在被占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为防止利库德集团在这方面“贪天功为己有”，最终同意加入联合政府。政治有时就是这样，右翼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左翼，戴维营协定不就是利库德集团的贝京主政时签订的吗……

1989年4月沙米尔访美时，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果然要求他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向巴勒斯坦人作出一定的让步。回国后，沙米尔与佩雷斯协商，就这一问题拟定了一个包括20项条款的计划，主要内容有：在被占领土举行巴勒斯坦人的“自由选举”；以色列政府与选举出的巴勒斯坦代表进行谈判，并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巴勒斯坦人自治；至迟在自治过渡期的第3年，双方代表开始就巴勒斯坦问题的“永久解决”进行谈判；埃及和约旦的代表被邀请参加谈判，并在未来“永久解决”谈判时享有提出主张的权利。这一计划同时强调：除非符合以色列的条件，以色列才与巴解组织举行谈判；在谈判过渡期，被占领土要“避免暴力、威胁和恐怖行动”；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另外，计划还回避了东耶路撒冷居民是否有投票权、以色列军队是否应在投票前撤出被占领区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等要害问题。5月14日，以色列内阁通过了这个方案，后被称作“选举计划”。

“选举计划”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但巴解方面认为，初期就自治问题进行的选举和谈判若不与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挂钩将“没有任何意义”；另外，被占领区以外的巴勒斯坦人士也应有权参加以巴之间的谈判。

未等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巴解的建议，利库德集团内部由利维、沙龙和莫

达伊组成的“三人帮”对“选举计划”提出了挑战。“三人帮”声称：“选举计划”纯粹是向美国和工党寻求妥协的产物，其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一个巴勒斯坦国雏形的建立，因此是“以色列历届政府都未曾通过的最危险的计划”。“三人帮”要求修改“选举计划”。这一要求开始并未被利库德集团的议会党团所接受，但在利库德集团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7月5日，沙米尔按照利库德集团代表大会的意见提出了对“选举计划”实施的四项先决条件：不平息起义就不进行选举；东耶路撒冷的14万巴勒斯坦人无权参加选举；必须继续在被占领土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不承认巴解并不与之对话。

在不承认巴解和拒绝东耶路撒冷居民参加选举等问题上，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分歧，所不同的是工党不赞成把事情搞得太露骨、太突出。除此以外，佩雷斯还认为，利库德集团的“三人帮”要求修改“选举计划”，实际是想在权力斗争中进一步贬低工党。因此，7月10日，佩雷斯代表工党宣布，如果利库德集团坚决要修改5月14日通过的“选举计划”，工党将退出联合政府——又一场“内阁危机”爆发了。

80年代末的世界被舆论界称为“使热点冷却的时代”：苏联同意从阿富汗撤军；各有关方面已就柬埔寨问题达成“框架协议”；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也终于停止下来。唯独巴勒斯坦问题反反复复无所进展，这当然要受到包括美国犹太人在内的各方舆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沙米尔不得不作出妥协。7月23日，经与佩雷斯磋商并获内阁批准，沙米尔发表声明，宣布“选举计划”依然有效，“没有任何改变和修正”。佩雷斯则在8月8日宣布，工党将继续参加联合政府，并把“以土地换和平”作为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的指导原则。一场“内阁危机”总算开始降温。但谁知“一波未伏、一波又起”的权力之争不久又激化起来。

以色列拒绝让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和被以色列驱逐出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参加“选举计划”，这实际上排除巴方“政治精英”于巴以对话之外。美国方面认为这种做法将阻碍“选举计划”取得进展，从而也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巴解对被占领土居民的影响力。为此，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89年10月建议以色列与上述两方面的巴勒斯坦人代表在埃及开罗进行直接对话，以寻求推进“选举计划”的实施。

佩雷斯对“贝克计划”的用心是非常理解的，所以代表工党方面表示完全支持。然而，在利库德集团内部，“三人帮”借口苏联与东欧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需要“安置空间”，不仅反对“贝克计划”，而且公开叫嚣“大以色列方案”，要求把新移民安置在作为被占领土的西岸地区。换言之，“选举计划”是否应当实行的问题又被“三人帮”提出来，沙龙甚至在1990年2月12日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他宁愿辞职也决不接受任何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计划。

在“三人帮”的鼓噪下，沙米尔再一次使用先决条件的办法对“贝克计划”作出反应：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代表不应对此问题提出异议；如果任何与巴解有联系的人参加巴方代表团，以色列将立即退出谈判。沙米尔的这种表态，实际是把实施“贝克计划”的路堵死了，还能设想会取得突破吗？

就沙米尔所提先决条件的实质而言，佩雷斯并无不同见解。或许是看到利库德集团内部出现分裂苗头，从而有利于工党的“倒阁”活动，佩雷斯于3月6日向沙米尔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无条件接受“贝克计划”，工

党将退出联合政府——又一次以“内阁危机”相要挟。

精明的沙米尔从来信奉“政治上最好的防守是进攻”的原财，在佩雷斯的“最后通牒”面前，他先发制人，于3月13日作出了解除佩雷斯财政部长职务的决定。工党阁员集体宣布辞职，并在议会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3月15日，议会以60票对55票通过了工党提出的不信任案，沙米尔也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被议会赶下台的政府总理。

沙米尔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佩雷斯的胜利。许多其他党派的议员投票赞成工党的不信任案是出于对利库德集团当初未延揽该党入阁的报复。当3月20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授命佩雷斯筹组新内阁时，这一点立刻显现出来。

80年代末的以色列，社会舆论出现“右翼化”的趋势。东欧一些国家的政局变化使得原来被抑制的犹太移民状况出现了“新的浪潮”，右翼人士在被占领土上安置移民的叫嚣一时得到拥护，且有甚嚣尘上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以土地换和平”的工党当然难以拉到其他党派的支持，经过六个星期的努力，佩雷斯只好向赫尔佐克承认，工党的组阁努力已告失败。

4月27日，赫尔佐克授命沙米尔筹组新政府。尽管也碰到了重重困难，但沙米尔最终把六个右翼宗教小党拉到了利库德身边。6月8日，议会以62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沙米尔的组阁方案：沙米尔任总理，阿伦斯任国防部长，利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沙龙任与安置移民密切相关的住房部长，莫达伊任财政部长；“三人帮”在政府中占据重要职位，以色列内阁实实在在地成了“右翼内阁”。

沙米尔组阁成功在工党内部掀起了怀疑佩雷斯领导能力的狂风。然而，这股狂风刚起于青萍之末，一场冷战结束前冲击世界形势的飓风又向中东刮来，一时把工党内部的狂风压抑下来。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10万伊拉克大军在千余辆坦克的引导下秘而不宣地突然侵入它的邻近小国科威特，待到天色大亮，伊拉克政治强人萨达姆·侯赛因向世界宣布，一度被人们称为海湾明珠的产油国科威特，已在这个世界上“不复存在”……

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的行径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应。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2日当天通过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其立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出全部军队。8月7日，美国政府应科威特流亡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请求，开始实施“沙漠盾牌”计划，迅速将陆海空三军力量调往海湾地区。英、法、埃及、叙利亚等27国也陆续把部队派往海湾。由此在该地区形成了一支由68万兵力、3100架飞机、包括6艘航空母舰在内的202艘舰只和3673辆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组成的多国部队。鉴于频繁的调解活动并未导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安理会于1990年11月29日通过第678号决议，规定1991年1月15日为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否则国际社会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安理会的决议并未被伊拉克所接受。萨达姆声称，占领科威特的目的之一是增强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力量，如果多国部队开火，伊拉克就会用飞毛腿导弹袭击以色列。

萨达姆的上述言论的确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中东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约旦邻近伊拉克，经济上也有难以割断的联系，所以没有参加各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行动。巴解主席阿拉法特认为萨达姆是反对以色列的强硬派，因此反对采取削弱伊拉克的措施。美国总统布什怕萨达姆借“阿拉伯大义”分化阿拉伯国家，特向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表示，海湾行动结束后，



美国将采取有效步骤尽快召开解决阿以冲突的国际会议。

1991年1月17日凌晨，在伊拉克未按安理会的最后期限从科威特撤军后，多国部队出动几百架飞机轰炸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事设施。美国同时宣布，解放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行动开始。2月24日，在经过38天的空袭作战后，多国部队又开始了地面进攻行动，部队向伊拉克境内挺进。

1991年2月27日，伊拉克在损失了71%的坦克、65%的装甲车和67%的火炮后宣布无条件接受安理会关于海湾危机的全部12项决议。当日夜，布什总统宣布停火，“沙漠风暴”行动终以多国部队的胜利而告结束。

以色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海湾战争，但这场战争给以色列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战争期间，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尽管这种导弹的携药力小，命中极不准确，但它却告诉以色列人民一个事实：在现代战争中，随着导弹等武器投送能力的迅速发展，防御空间的作用大大降低了；仅靠占领别国的土地加大防御纵深已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最可靠的办法是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这才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一度存在于以色列的“大以色列思想”受到削弱，“以土地换和平”的想法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加以接受。

1991年10月30日，在美国总统布什的促成下，中东和平会议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了。来自美、苏、英、法、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代表团出席开幕式；以色列代表团由总理沙米尔带队；在以色列的强烈要求下，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只能作为约巴代表团的成员与会，而且按照以色列提出的先决条件，这些巴勒斯坦代表还不得是巴解或与巴解有直接联系的人。电视记者对开幕式进行了现场转播，全世界的人看到阿以双方在43年兵戎相见的对抗后坐在了一起，无不为之感到激动和欣慰。

和会从第二阶段起移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叙以、黎以和约巴代表团与以色列代表团分头就他们两国问的和平进行谈判。一谈到实质性问题，前景不仅不容乐观，而且还数次出现破裂的苗头，沙米尔政府拒绝“以土地换和平”，只承认巴勒斯坦人享有自治权，反对把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这些都成了谈判难以取得突破的障碍。到1992年5月止，阿以双方共进行了五轮谈判，由于以方的僵硬立场，谈判简直说不上有一点儿进展。

沙米尔在中东和谈中采取僵硬立场，还有他对国内政治的考虑。按日程，1992年11月要举行大选。考虑到利库德集团与工党势均力敌，胜负只在一两个席位之间，于是争取更多的前苏联与东欧移民的选票成了输赢的关键。据民意测验机构统计，这批人中有20万合格选民，决定着6到8个议席的归属。在沙米尔看来，争取这20万合格选民的选票再容易不过了，这就是反对“以土地换和平”——如果把被占领土还给巴勒斯坦人，把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到哪儿去安置这批不断汹涌进来的犹太移民呢？到年初宣布把大选日期提前到6月时，沙米尔仍相信他的判断是百分之二百正确的。但后来的事实否认了这一点。

工党的党员早憋足了劲儿要与利库德集团在大选中拼个输赢，但佩雷斯的心中却蒙了一层灰色的雾。他担心的倒不是党外的胜负，而是党内的争夺。既然要参加大选，就要在党内先排好候选名单，他对自己能否再次当选党的主席从而在名单上列为第一名感到怀疑。果然，党内投票一开始，他的老对手、离开党的主席的位置已有15年的拉宾就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佩雷斯曾幻想能出现奇迹，但奇迹最终还是没有到来——当选为党的主席的人不是

他，而是拉宾。然而，奇迹也出现了。拉宾就任党的主席后的第一次演讲就号召党员们把佩雷斯放在党的竞选名单的第二位上。不少拉宾派的青年党员对此感到不理解，佩雷斯派的青年党员感到惊讶，但佩雷斯心中非常清楚——大选临近，要是工党分裂了，怎么能够战胜利库德集团？

摆在拉宾和工党面前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要害也是如何争取前苏联和东欧移民的选票。利库德集团处于在朝的位置，政策上给点儿好处就能拉走不少选票，这一点是工党不具备的。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美国总统布什拉了工党一把……

1992年也恰逢美国的大选年，以外交见长的布什总统由于忽视内政，民众支持率已从海湾战争后的80%以上下降到不足40%，甚至比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还低几个百分点。为了推动中东和谈，从而也为大选捞上几票，3月18日，他通知沙米尔说，他的政府已拒绝为以色列所要求的10年内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提供担保，除非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土内增建和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布什的通知在美以关系中激起波澜，利库德集团政府的国防部长阿伦斯在访美时激烈抨击了布什政府的决定。然而，阿伦斯在美国犹太人中的游说没起多大作用，因为美国大多数犹太人也认为沙米尔政府的政策太僵硬，要求有所改变。

布什的决定可让拉宾和工党抓住了。本来，那20万来自前苏联和东欧的犹太人多是高层次人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音乐家……要让他们学着本世纪初的犹太移民那样在荒原上胥手胥足地进行农业垦荒，那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呢。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把他们留在城市里，与美国人合办高科技试验室，用他们的智力去养活他们自己。拉宾抓住这一点，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说，正是由于利库德集团的僵硬政策，以色列才得不到新移民所急需的100亿美元，而想把新移民引导到安全得不到保证的新定居点简直缺乏“基本的人道精神”。拉宾和工党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6月23日的投票中，工党在议会120个议席中取得了44席，比上一届增加了5席；而利库德集团仅得3席，比上一届减少了8席。不消说，工党取得了它事前所没有准确预料到的胜利。

7月10日，经与左翼的梅雷茨党和赞成“以地换和平”的宗教小党沙斯党协商，拉宾完成了组阁工作：拉宾任总理兼国防部长，佩雷斯得到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拉宾上台后就决定冻结100多个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七天后，布什总统作出了提供100亿美元担保的承诺。中东和平进程又启动了，佩雷斯也重新振作起精神来……

## 第十九章 从“挪威丛林”到白宫南草坪

1992年8月24日至9月24日，中东和平进程在华盛顿开始了第6轮谈判。这是以色列工党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阿以谈判，因此引起了各国新闻媒介的极大注意。

会谈开始前，以色列方面的态度就表现出不少新变化：与沙米尔政府回避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不同，拉宾政府公开宣布接受该决议作为和谈的基础；与沙米尔政府只讲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拒绝“以土地换和平”不同，拉宾政府表示，如果达成巴以自治协议，以军将首先撤出西岸和加沙的人口稠密区，并在五年内就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鉴于从第三轮会谈开始以色列代表已同巴勒斯坦代表单独进行谈判，拉宾政府进一步允许东那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和谈和境外巴勒斯坦人参加某些诸如水源、军备控制的多边会谈；尽管拉宾政府仍拒绝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性，但对巴方代表团内出现众所周知的巴解人士采取了“不闻不问”的“开明”政策。

会谈就实质性问题一展开谈判，就露出了取得进展的迹象：在叙以谈判中，以色列第一次表示同意在戈兰高地问题上作有条件的让步，叙利亚则第一次表示愿与以色列媾和；在巴以谈判中，以色列一改原先只同意在市镇进行选举的政策，同意在西岸和加沙举行全体巴勒斯坦人的普选，并由此产生一个实施自治的行政委员会。尽管这一轮谈判的进展到此止步，但国际舆论还是表现出较高的希望与企盼。阿以对峙、冲突几十年，和平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1992年10月至11月举行的第7轮谈判和12月举行的第8轮谈判都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其原因主要是布什总统在大选中被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所击败，各方静待美国新政府中东政策亮相，从而放慢了脚步。

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是原在卡特政府任副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此公擅长“悄悄外交”，又挟当年戴维营协议的经验，因此一开始就被新闻媒体视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克林顿入主白宫才两周，就宣布要派克里斯托弗赴中东执行恢复阿以和谈的使命，这就更加深了舆论界对这位美国国务卿的印象。1993年2月18日至24日，67岁的克里斯托弗用一周的时间访问了埃及、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黎巴嫩和以色列，主要精力放在重新启动中东和谈方面。

在那路撒冷，克里斯托弗破天荒地会见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代表和参加中东和谈的巴勒斯坦代表，他透露说，美国决心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完全伙伴”的作用，改变以往那种“只搭框架、不介入具体谈判”的办法。为此，美国打算向巴以双方提供一份由美国人综合巴以双方观点的巴勒斯坦自治方案。克里斯托弗的此次“中东穿梭”虽然没被新闻界炒得火热，但给中东和谈的前景还是带来了一缕粉红色的光芒。

4月27日至5月13日举行的第9轮谈判又出现了一些新进展的迹象：以色列第一次允许两名来自被占领土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参加巴方代表团；巴以双方还决定建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土地和水资源、巴勒斯坦人自治与国际监督选举等问题，然而，双方在讨论美国事先提供的“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自治文件”上却产生严重分歧。以美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谈判的克里斯托弗表示愿意以巴以双方的意见修订“自治文件”，谈判这才在没有出现“险情”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6月15日至7月1日举行的第10轮谈判中，克里斯托弗抛出了修订过的“自治文件”。为了打破僵局，这一文件建议巴以双方先冻结被占领土管辖权方面的争论，集中讨论巴勒斯坦人自治政府的职能问题。巴方代表团因文件有意回避东那路撤冷问题和自治区域的地理范围，拒绝了美方的建议。在叙以谈判中，双方也在“先撤军还是先和平”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结果谈判也无成果。英国《中东月刊》评论道：“目前的和平进程除非发生重大的改变，否则只能给中东带来一个新的不战不和的时期。”

舆论界的悲观论调使克里斯托弗感到空前的压力，所以在8月2日至6日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东穿梭”，先后访问了埃及、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各方领导人谈起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承诺时调子都挺高，但一接触到实质性问题却纷纷作出难以妥协的姿态。在向记者陈述此次“中东穿梭”的成果时，克里斯托弗只能低调他说他“挽救了中东和平进程”，同时也承认“前面还有许多障碍”。

8月下旬，克里斯托弗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度假，满脑子想的还是如何弥合中东各方的分歧。正当他为第11轮谈判如何举行冥思苦索之时，他在23日接到了佩雷斯从那路撤冷打来的电话：巴以双方已就“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和“加沙—杰里科自治方案”达成谅解，佩雷斯不日将来美向他通报情况。

在政坛上栉风沐雨多年的克里斯托弗也不禁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要想知道这一爆炸性信息的原委，那还要回顾一下，从1992年5月谈起。

1992年5月正是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以色列大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挪威工党议员、“法福研究所”所长特那·吕德·拉尔森恰好到以色列参加特拉维夫大学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题目是“自治后的被占领土同以色列的经济合作”。在会上，拉尔森遇到了被人称作佩雷斯门徒的约西·贝林。贝林是特拉维夫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博士，当时又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母校召开这样的讨论会当然少不了要邀请他。两人交换名片后就中东形势进行了讨论，拉尔森告诉贝林，他曾为调查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去过加沙和北非等国，认识不少巴解高层官员，如果贝林愿意与他们接触，他可以从中介入。

一个月后，以色列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佩雷斯执掌外交部，贝林因此也当上了副外长。不久，拉尔森又来以色列求见贝林，一是就其升迁表示祝贺，二来也旁敲侧击地反复谈论以色列官员与巴解人士会晤的设想。一向少年气盛、直言不讳的贝林这时却变得十分老成，他没有直接回答拉尔森的设想，却把拉尔森介绍给了以色列海法大学中东历史系教授希斯菲尔德。

拉尔森在听了希斯菲尔德的自我介绍后才明白了贝林为两人牵线并非出于搪塞和回避，希斯菲尔德是以色列国内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巴以争端的开明人士，与佩雷斯的私交颇深，同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89年1月，他就安排佩雷斯、贝林跟后来成为中东和谈巴方代表团成员的侯赛尼、阿什拉维等人会晤过。拉尔森了解到这一点后，立即向希斯菲尔德提出安排以色列官员与巴解人士会晤的事，并说挪威政府将同意为这种会晤提供方便。

希斯菲尔德很赞赏拉尔森的建议，但对拉尔森是否有能力安排好此类会晤将信将疑。9月10日拉尔森再访以色列，带来了挪威外交部秘书长伊格兰达，希斯菲尔德才真正相信拉尔森所说的不是虚言。其实，拉尔森的夫人就

在挪威外交部当司长，而当时担任挪威国防大臣的约翰·约根·霍尔斯特特的妻子海贝格又在拉尔森领导的“法福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凭着这样几重关系，拉尔森要实现他的许诺并不困难。

伊格兰代表挪威政府正式向贝林提出安排巴以官员会谈之事，经贝林请示佩雷斯后，决定先进行“非直接的秘密会谈”，并以希斯菲尔德作为以方的代表。

1992年12月，巴解代表同以方代表的第一次授权接触在英国伦敦一家大饭店的餐厅里“公开”——也是秘密地开始了，巴解派来的人是该组织经济部主任阿布·阿拉。此人通晓经济与外交，深得阿拉法特器重。阿布·阿拉也常来往于欧洲各国，所以他出入伦敦已不为新闻记者所注意。拉尔森介绍希斯菲尔德与阿拉认识后，寒暄了几句就借故离开。希斯菲尔德于是告诉阿拉，从1991年以来，他一直留意着阿拉就地区合作所讲的一些话，觉得其中不少与佩雷斯的看法一致。他希望能与阿拉就巴以关系“寻找一些井同点”，看看有没有“可松动和灵活的地方”。……待到拉尔森回到餐桌旁，他发现阿拉与希斯菲尔德已谈得很投机。尽管拉尔森不知道两人是否已进入正题，但明确地以挪威政府的名义表示，他的国家今后将进一步促进两人“保持接触”。

1993年1月，以色列议会经过表决，取消了原来禁止以色列人士与巴解成员接触的禁令，这就为希斯菲尔德与阿拉的进一步会谈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1月20日，希斯菲尔德动身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

为了使巴以会谈保持高度机密性，挪威方面作了极为精心的安排。希斯菲尔德和阿拉乘坐不同的航班在不同的机场降落，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多时的轿车接走。挪威政府把会谈的地点选在奥斯陆东南80公里处保尔高德庄园，这里曾是中世纪挪威国王的夏宫，至今仍是一处四周被丛林掩盖的幽静之地，巴以秘密谈判后来因此被称作“挪威丛林会谈”。

在古朴典雅的庄园内，挪威外交大臣斯托尔滕贝格礼仪性地为希斯菲尔德和阿拉相互作了介绍，然后把两人留在屋内，正式开始谈判。庄园院外的挪威特工人员受命严格人员进出，庄园内的服务人员受指示说，未经许可不得进入两人谈话的会场。他们只是感觉到两人所谈的事非常重要，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近30年中被人看作是“死敌”的巴解官员与以色列人士的谈判。

2月份，阿拉同希斯菲尔德在挪威第二次会面，双方所谈的事情已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希斯菲尔德提出双方应先解决加沙问题，并表示以色列可以从这一地区撤军，使加沙率先自治。阿拉指责这一构想是企图使加沙与西岸地区分离，要求以方同时也在西岸采取相应的政策。谁都知道，邻接埃及西奈边境的加沙地区面积只有363平方公里，却居住着近百万人，是世界上人口居住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缺乏资源、淡水不足使得加沙居民的生活极端贫困，暴力事件经常发生，因此早已成为以色列的一块心病。阿拉指责希斯菲尔德只让加沙、不让西岸的主张有失公平，希斯菲尔德要阿拉提出新建议，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阿拉返回巴解总部所在地突尼斯，向阿拉法特汇报时已到了2月底，阿拉法特在同助手们经过几天的研究后，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豹斑”的计划。具体说，阿拉法特要求以军未来不仅要撤出加沙，而且也要撤出西岸的所有巴勒斯坦市镇，如：纳布卢斯、拉姆安拉、伯利恒、杰里科等。如果未来

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市镇先行自治，从地图上看，就如同豹子身上的斑点一样，计划也因此得名。

3月份，阿拉带着“豹斑”计划再赴挪威与希斯菲尔德谈判。方案一摊开，希斯菲尔德就表示反对，谈判陷入僵局。两人似乎觉得都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谈判不欢而散。

如果巴以就此结束了“挪威丛林谈判”，实在难以想象它们还能在什么地方取得突破。好在“车到山前必有路”，当阿拉法特派阿拉带着“豹斑”计划赴挪威时，他也把巴以“挪威丛林谈判”和“豹斑”计划的事告诉给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在得知巴以谈判陷入僵局后，决定把问题放在“高一点儿的层次”上寻求变通办法。

3月底，佩雷斯应埃及外长穆萨的邀请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访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接见他时，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派车把佩雷斯送往附近的一个机场。在机场，佩雷斯登上埃及武装部队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在机舱里，他见到了穆巴拉克刚刚告诉他的那个人——巴解组织的第二号人物阿布·马赞，以及陪同他在场的阿布·阿拉。

飞机起飞了，越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上空。阿布·马赞告诉佩雷斯，他参加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要表明巴解组织对“挪威丛林谈判”的严肃认真性，向佩雷斯介绍“豹斑”计划已在适当时候得到以方的“反建议”。阿布·阿拉摊开地图，将巴解的想法逐一作了介绍。佩雷斯不时提出问题，马赞和阿拉尽可能地详加解释。两个小时后，当飞机降落在原起飞的机场时，佩雷斯已大致有了自己的基本构想。

到此时为止，拉宾只是知道有一个“挪威丛林谈判”正在进行，而具体进展和细节全是由佩雷斯一手掌握。佩雷斯回国后，将整个谈判的进程和自己对解决问题的设想向拉宾作了全面汇报。通过认真的研究，两人拟订出后来被称作“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的方案，具体说，就是以色列从加沙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岸的杰里科市撤军，把这些地方交给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4月中旬，佩雷斯将这个方案通过秘密渠道交给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穆巴拉克在收到方案三天后又一次邀请佩雷斯到埃及去。在埃及总统府，穆巴拉克问佩雷斯：“没有更多的东西了？”佩雷斯沉默了好久，然后回答说：“很坦率地讲，总统先生，我想是这样。”穆巴拉克同佩雷斯的谈话从来都是这样：语言简练得惊人，但对方话里的意思却明明白白地被理解了。埃及总统明白，现在是他找阿拉法特的时候了。

几天后，阿拉法特坐在了佩雷斯来访时坐的那把椅子上。穆巴拉克问阿拉法特：“你可能很容易争取到加沙自治，可是你要求以色列从西岸的所有大城镇撤军，这绝对得不到。”阿拉法特想到埃及总统已得到了某些消息，于是忙问“高见”。穆巴拉克说：“除了加沙外，你应当要求收回杰里科，这将是未来巴勒斯坦在整个西岸自治的雏形。”

“杰里科？”阿拉法特想到了以色列方面不会满足他的全部要求，但绝没想到以色列仅仅给了一个杰里科。说实话，他确实感到吃惊。过了一会儿，他对埃及总统说：“给我几个小时研究这个问题。”

阿拉法特的政治顾问纳比勒·沙阿斯等人就在隔壁房间，要商量一件事没有什么难的，但他们足足商量了两个钟头。

阿拉法特再次走进穆巴拉克的房间后，摊开了腋下夹着的地图：在加沙和杰里科之间用红线划了一条穿过以色列的走廊。穆巴拉克似乎一下子就明

白阿拉法特在这两个小时中和他的顾问们商量了些什么，他指着那条“走廊”说：“这个方案行不通。”阿拉法特又一次感到吃惊，连忙说道：“不仅要有这条路，而且这条路还要享有‘城外管辖权’！必须有某种东西表明我们领土的两部分是连在一起的，表明我们组成的是一个唯一的实体……”

穆巴拉克边听边摇头，终于忍不住打断了阿拉法特的话，他说：“我很了解拉宾，他永远不会接受你的方案的。眼下，你就满足杰里科吧。在谈判中，你要指出加沙和杰里科以后是不可分的。”

阿拉法特沉默着离开了埃及总统府。穆巴拉克明白，对这位巴解主席来说，选择是痛苦的。不过，一天后，阿拉法特来电话说，他接受“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

待到5月恢复“挪威丛林谈判”时，不仅障碍减少了，便利条件也在增多。4月，霍尔斯特被任命为挪威外交大臣，他对巴以间的秘密谈判从一开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安排起来也很得心应手。为了安全和保密，霍尔斯特决定经常更换谈判地点。从第4次谈判开始，谈判地点一会儿在保尔高德庄园，一会儿在某家旅社的32层楼上，还有几次是在霍尔斯特的奥斯陆郊外别墅里。由于谈判已进入细节制定和文件草拟阶段，谈判代表也有了一些变化：以色列方面的代表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萨维尔，外交部国际法专家辛格担任他的顾问；巴方的代表仍是阿布·阿拉，但他请曾参加过埃以谈判的埃及前大使沙西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

从5月到8月中旬，萨维尔与阿拉共进行了11轮谈判。虽然总的框架已经存在，但就细节的磋商还是进行得十分激烈，几乎每一条、每一款都要发生争吵。有趣的是，当谈判在霍尔斯特的乡间别墅举行时，有时进行不下去了，萨维尔和阿拉就跑到另一间房子里，和霍尔斯特4岁的男孩爱德华做一些游戏，放松一下情绪，然后再进入严肃甚至有些让人感到冷酷的谈判。经过让步和妥协，他们终于在8月中旬完成了全部文件文本的准备工作。

8月20日，佩雷斯飞往挪威。近几个月来他出访不断，还在5月访问了他久已向往的中国，所以新闻界对此次出访并没加以注意。由于奥斯陆夏季昼间极长，所以霍尔斯特为佩雷斯举行的欢迎晚宴在晚上10点钟才开始举行。热热闹闹的宴会结束时，时间已接近午夜。挪威外长摆出殷勤待客的风度，亲自陪佩雷斯返回下榻的旅店。

然而，车队在大街上拐了几个弯，从后门进了帕克路45号的挪威外交部大楼。在那里，佩雷斯又一次见到了阿布·阿拉，后者为了保密，也是刚刚乘车从下榻的奥斯陆广场饭店秘密来到帕克路45号的。在一间极僻静的小会议室里，佩雷斯和霍尔斯特出席了萨维尔和阿拉草签他们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达成的三个文件的仪式，第一个文件后来被称作“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它规定了巴勒斯坦人在加沙—杰里科实行5年先行自治以及巴以继续谈判的基本原则；第二个文件后来被称作“加沙—杰里科自治方案”，主要涉及以色列军队在先行自治区域的“重新部署”问题；第三个文件涉及成立一个双边经济委员会，以为先行自治区域如何吸引外国资本制定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文件都没有提到巴解的名字。所以，当霍尔斯特挥手让侍者端来香槟酒以庆贺文件草签时，佩雷斯也没有忘了提醒阿布·阿拉，以色列和巴解如何正式相互承认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以色列在这方面的条件是：巴解更加明确地宣布不再采取“恐怖行动”，删除巴解宪章中有关消灭犹太国的内容。站在一旁的霍尔斯特热情地表示，挪威政府将为解决这

一问题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走出挪威外交部大楼时，早已是 21 日凌晨时分。一阵凉风吹过，佩雷斯才猛然想到，这一天正是他 70 岁的生日……

8 月 29 日，巴解组织批准了阿拉与萨维尔所草签的“奥斯陆协议”；30 日，这个协议在以色列议会也获得通过；全世界都为这一过去连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所震惊，随即是一片欢迎与赞扬声。但是，巴以相互承认的事情还没有找到妥善的方式加以解决，所以 9 月初，佩雷斯前往巴黎与在那里的霍尔斯特商讨解决的办法。年轻的挪威外交大臣不愧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在他的安排和作证下，阿拉法特和拉宾在 9 月 9 日以互致信件的方式实现了巴以相互承认。阿拉法特的信件全文如下：

总理先生：

原则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中东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由于确信这一点，我要确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以下承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的权利；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42 号和第 338 号决议；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保证参加中东和平进程，保证要和平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并且宣布：有关永久地位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将通过谈判求得解决。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放弃恐怖活动和其他暴力行动，并将负起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切分支组织和人员的责任，以便确保他们遵守宣言，防止暴力和防止出现违反纪律的人；

鉴于新纪元带来的希望和原则宣言的签署并以巴勒斯坦接受安全理事会第 242 号和第 338 号决议为基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郑重声明，巴勒斯坦宪章中否定以色列生存权利的条款和巴勒斯坦宪章中不符合此信作出的承诺的规定从现在起已不生效，而且今后不再有效。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诺要将有关巴勒斯坦宪章的必要修改提交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正式批准。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1993 年 9 月 9 日霍尔斯特在拿到阿拉法特的信后，把它交给拉宾，拉宾也发出了回信，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为了回答您 1993 年 9 月 9 日的来信，我要向您声明：鉴于来信中包括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作的承诺，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并开始在中东和平进程的范围内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

以色列总理 伊扎克·拉宾

1993 年 9 月 9 日

内行的人无不对这两封来往信件中蕴含深刻且又字句简练的外交语言加以赞叹，它们可称为现代外交场上的杰作。可又有谁知道，佩雷斯和霍尔斯特在巴黎为了这两封来往信件曾多次且长时间地与驻地在突尼斯的巴解官员反复协商？还有霍尔斯特的夫人海伯格，她也曾在电脑上为信件的草稿字斟句酌地一遍又一遍反复修改……

正式签订“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等文件的障碍已被全部克服，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为签约确定了地点。在近九个月的时间里，美国被排斥在这个当代世界上最秘密的外交活动之外，现在当然不能让它与自己失之交臂。克林顿总统向有关各方发出邀请——请到美国华盛顿的白宫来签约！

1993 年 9 月 13 日上午，刚刚摆脱夏季酷暑的华盛顿天气一片晴朗，微



风吹来，使人似乎品尝到一股收获季节的果香。在白宫南草坪，当年签订戴维营协议的那张长桌已被摆在草地上。在人头攒动的来宾席上，人们又发现当年曾在中东外交场上活跃的美国知名人士：尼克松、卡特、布什、基辛格……

上午 10 时整，克林顿总统陪着拉宾、阿拉法特和佩雷斯等人走到了长桌前。在克林顿等人致辞后，佩雷斯和阿布·马赞坐在长桌前，代表以巴在文件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热烈的掌声响起来，克林顿伸手与阿拉法特握起来。之后，他向后微微退了半步，向阿拉法特打出一个朝向拉宾的手势。阿拉法特的手伸向拉宾，这两个过去被人们看成是“终生死敌”的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紧接着，阿拉法特越过拉宾身边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向佩雷斯走来，他把手伸向了这位以色列方面的“和平设计师”……

## 第二十章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佩雷斯成了“中东和平的设计师”，就连他的朋友也不免要问：他是如何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武装保卫以色列”转变为积极推动和平进程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佩雷斯认为“没有理由表示歉意”，而应当向世人作出自己的解释。在1993年忙于“挪威丛林谈判”的同时，他也在撰写一本题为《新中东》的著作。是年底，这本著作问世了。

佩雷斯认为，转变的原因是“世界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进程迫使我们用符合新的现实的态度去取代已经过时的概念”。然而，这还不够。在新时代的面前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还需要远见。为此，佩雷斯在《新中东》一书中中文版序言中，意味深长地引用了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的两段话：

“见胜不过众人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

古之所谓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

《新中东》中文版的译者为方便读者理解原文，将英译文照字面译成白话，笔者也在此把其引出来：“只是在人人都看得见胜利的时候，才预见到胜利，这不能算好中最好的，打了胜仗，天下的人都叫好，这也不能算是好中最好的。举起一片落叶，不表明力气大；看得见太阳和月亮，不表明眼睛明亮；听得见雷霆之声，不表明耳朵灵。古时所说的善战者……不是由于打了胜仗而得到智慧名声，不是靠这些胜仗而成就勇敢的功名。不犯错误的人才打胜仗。避免错误，是举措肯定和致胜的基础……”

1993年5月，佩雷斯有季以外长身份访问中国，这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对上述两段出自《孙子兵法》的引文的理解是：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事家，要使他们制定的政策或战略取得成功，一是要预见事态的发展并及时为此作好准备，二是要在实施过程中避免错误。

佩雷斯是如何预测中东未来的呢？他认为，由于新的军事技术的广泛采用，“战略纵深”的概念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导弹可以越过高山、河流和沙漠飞向预定的目标，因此原有的物质障碍就失去了战略上的重要性；过去在战争中处于危险的是军人，但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武器已使人口众多的居民区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仅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手段已不足以保障个人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作为国际关系的手段之一已不再可取，因为战争只能激起新的、连续不断的战争，却不会带来什么解决办法。

适应上述变化的选择是实现和平——不是为下一次战争进行准备的和平，也不是两国间局部的临时和平，而是能够面对未来挑战的持久的区域和平。佩雷斯认为，中东的贫困和苦难是战争的根源，而战争又反过来加深了贫困和苦难。为了避免战争，要把过去以军备竞赛为基本特征的“冲突经济”转变到“和平经济”的轨道上去，而使各国受益的和平经济将最终有助于消除战争。

佩雷斯认为，许多中东国家都是经济规模很小的实体，要积攒足够的资金来开发新产品或对现有的产品更新换代以适应当今的世界大市场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搞“兼容经济”，开展大规模的多国经济合作。根据欧洲共同体的经验，佩雷斯提出了“区域经济”的概念——各国相互承认他国的生存权，同时开展超国家的经济合作。

佩雷斯承认区域经济共同体不可能一步建成，因此提出了一个“三阶段金字塔式合作计划”：第一阶段，开展地区内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如合作建立海水淡化工厂等；第二阶段，引入国际财团进行大规模投资项目，如开凿红海到死海的运河，合建以色列、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港口等；第三阶段，按照西欧模式，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

由于中东地区各国政治体制不同，经济水平发展不一，佩雷斯认为应当用四条“纽带”把这个地区“捆”在一起。第一条纽带是裁军，如果把中东每年 600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削减一半，既有利于稳定，也使开发活动拥有资金，从而都将有助于合作的开展。第二条纽带是水源的合理使用；在这方面，以色列既需要水，也拥有农业和治沙方面的优势，可以通过合作使中东“由褐变绿”。第三条纽带是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佩雷斯建议修建三条跨国高速公路系统：一条沿地中海东海岸，从埃及到土耳其，把北非与欧洲连接起来；一条穿越中东，从北非到波斯湾；第三条连接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自身形成“环路”。第四条纽带是旅游业，这不仅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机遇——实行包价旅游，让中东以外的游客一次可游览几个国家，而且本身更有助于迅速实现中东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应当说，《新中东》一书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对中东地区未来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佩雷斯的这本书在国内外受到了不少知名人士的好评。然而，中东的现实和平似乎是更迫切、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以色列国内，不少人担心未来的“巴勒斯坦实体”会成为“恐怖活动的集结地”，而恢复 1967 年的边界会使以色列无法防御。一切都需要积极、稳步地继续推进巴以协议和整个中东和平。

1993 年 9 月 13 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巴以协议，其所确定的“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仍是原则性的规定，具体解决“安全安排、民事权力移交、法律管辖和经济关系”诸问题，仍需一件一件地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比如，先行自治的杰里科地区面积究竟有多大，巴解要求 345 平方公里，而以色列只同意 25 平方公里，可见双方分歧之大，不容易一下子就达成妥协。

更难处理的是，先行自治问题遭到了来自巴勒斯坦人内部的激进派和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地干扰了谈判的气氛。1994 年 2 月 25 日清晨，西岸希伯伦市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内突然响起了连续不断的枪声。几分钟后，人们发现数十名穆斯林倒在血泊之中，而凶手——一名叫戈尔斯坦的极右翼犹太派别的门徒也开枪自杀。易卜拉欣清真寺本身是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和犹太教会堂混合在一起的宗教建筑，犹太人从一个门进出，穆斯林从另一个门进出，各自祈祷的地方也有墙隔断。然而，隔断墙有若干门相通，这就使戈尔斯坦在穆斯林祈祷处行凶成为可能。

“希伯伦事件”是西岸武装的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盲动的“复仇”行为，但却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巴解方面为此中断了正在开罗进行的巴以谈判，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第 904 号决议予以强烈谴责。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希伯伦事件”也教育了多数以色列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和平与安全不仅以色列需要，巴勒斯坦人也需要。这就为直接参与谈判的佩雷斯增加了继续推进谈判的余地。

1994 年 5 月 4 日，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直接推动下，拉宾与阿拉法特在开罗签署了几个月来由佩雷斯和阿拉法特直接谈判达成的“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尽管在签字

仪式上阿拉法特还因以方只同意杰里科地区的管辖面积为 62 平方公里而与拉宾发生不快，但在克里斯托弗担保巴以将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下，在最后一分钟使这一阶段的谈判划上了一个尚令人满意的句号。三个星期后，以色列军队按协议撤出了杰里科和加沙除边境及犹太人定居点以外的地区，巴解组织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先行自治。

巴以“开罗协议”的签署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长期以来在和平进程中观望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约旦与以色列之间本无太复杂的利害关系，多年来两国实际上已形成和平相处的局面，1993 年 9 月巴以协议签字后两国也签订了有关谈判议程的框架协议，然而，这位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历来善于把握时机以取得最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情势。巴解在加沙—杰里科开始实行自治，这对多年来生活在约旦的 200 万巴勒斯坦人不可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同时也在美国减免债务等条件的吸引下，侯赛因于 1994 年 7 月 25 日和拉宾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签署了结束两国战争状态的“华盛顿宣言”，实现了两国间的和平。

约以间的“华盛顿宣言”，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拉宾亲自导演的，于是点燃了拉宾与佩雷斯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的“宿仇之火”——1994 年诺贝尔和平奖角逐战之火。

说到 1994 年诺贝尔和平奖，人们最初瞩目巴以协议的“红娘”——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遗憾的是，这位出色的政治家因心脏病突发而于 1993 年底英年早逝，于是人们才把目光转向了巴以双方的领导人。

在巴解方面，阿拉法特是顺理成章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在以色列方面，虽然人们可以肯定地说，拉宾与佩雷斯之间至少有一个人能够获奖，不过由谁获此殊荣，一时还难有定论。拉宾的助手和发言人埃坦·哈伯坚持说拉宾是最终下决心与巴勒斯坦人签约的决策人，所以应由拉宾赢得此奖；而佩雷斯的门徒贝林和萨维尔却反驳说，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他力谏拉宾与巴解达成协议，因此应被提名为候选人。以色列《晚报》以《诺贝尔和平奖大战》为标题报道说，一位内阁部长称：“两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力争获得和平奖，其他一切事情都退居次要地位……他们都已 70 多岁，政治生涯已近黄昏。两人现在的最大动机就是赢得荣誉，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不过，报道也引述了持有不同看法的官员的看法：“最好是两人同时获奖。如果拉宾获奖，而佩雷斯落选，那将是个悲剧。”

聪明的挪威人既然有办法把互视为“世仇”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拉到一起，自然也不难解决谁应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1994 年 10 月 14 日，设在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阿拉法特、佩雷斯和拉宾将共同分享 1994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金。三人的位次排列是按姓氏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阿拉法特以 A 打头，自然排在首位；佩雷斯以 P 为第一个字母，排在第二，拉宾的头一个字母为 R，因此也就排在最后。字母排列，自然而然，无位次高低，可见委员会的成员们用心良苦……

1994 年 12 月 10 日，挪威奥斯陆市政厅内聚集了身穿庄重与艳丽服装的绅男淑女。主持人敲响钟声，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几秒钟后，乐队奏起迎宾曲，阿拉法特、佩雷斯和拉宾排成一排，在礼宾官的引导下并排走上舞台。在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负责人致辞后，雄壮的乐曲又响起来，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把奖章和证书送到了阿拉法特、佩雷斯和拉宾手中，场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阿拉法特致辞后，佩雷斯走到讲台边，以喜悦又力图保持深沉的语调发表自己的演讲：

我很高兴与伊扎克·拉宾一道获得此奖。过去我与他曾为捍卫我们的国家一起辛勤工作了许多年，现在我与他又在为我们地区的和平而一起辛勤地工作。这是对他果敢的领导才能的敬意。

我们正把敌对时代抛之脑后，我们正携手大步迈向和平。

这一进程是在挪威人民明智的支持和良好的祝愿下从奥斯陆起步的。我很荣幸有此机会向挪威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予的巨大支持。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踏上征途时，必须仔细计划每一个行程，但同时也有权幻想，不断地在梦境中描绘自己的目的地。一个人可能感到自己老了，但在梦境中永远年轻。生物规律约束不了乐天的追求。

我出生在白俄罗斯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在那里，一切犹太人的痕迹已不复存在了。从我年幼时起，我只把我的这一出生地称为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小站。我的家人以及我本人的梦想就是要生活在以色列。我们乘船驶向雅法港的梦想得以实现了。我要是没有这样的梦想和这次海上航行，我一定像我的同胞一样已葬身火海，那些死去的人中有我家的许多人。

我在以色列中部的一个青年农庄中的一所学校上学。村庄和田野四周布满了铁丝网，田野的郁郁葱葱和周边的冷酷敌意亦被铁丝网截然分开。上午，我们背着长柄大镰刀下地收割庄稼，晚上，我们背着步枪走出家门保卫我们的生命。安息日，我们总要去拜访我们的阿拉伯邻居。这一天，我们总是和他们在一起谈论和平，虽然在一周的其他几天，我们会在夜幕中相互交火。

我和我的同伴从本谢曼青年村庄来到加利利海附近的阿鲁莫特基布兹。我们没有房子、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但我们目光远大，理想崇高，我们要建立一个每一个人都享有尊严的崭新的平等社会。

并不是一切梦想都已成真，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已付之东流。成真的梦想变成了崭新的景观。未实现的梦想迄今仍留在我们的心间。

过去，我们进行战争是因为别无选择。今天，和平是我们“不容选择的”选择。其理由是深刻而无可辩驳的。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源泉已经改变。打胜仗扩大领土不再能扩大财富和政治权力。今天，加强教育、开发智慧潜能才是富国之途。

以色列虽然基本上是一个沙漠之国，但农业收成令世人瞩目，它靠的是科学种田，而不是靠扩大领土或增加水源。

科学、技术、信息，无论导致何种结果，都属于全世界，而不属于哪个民族。全世界的人民，不论肤色或出生地，都能掌握科学、技术和信息。过去存在的东与西、南与北的差异在新的差异面前已失去其重要性，这就是抓住新的契机勇往直前的人与自甘落后的人之间的差异。

各个国家过去总把世界分为朋友和敌人。情况已不再如此。现在的世界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贫困、饥饿、宗教激进化、土地沙漠化、吸毒、核武器扩散和生态破坏等。这一切威胁着每一个国家，科学和信息则是每个国家的潜在朋友。

传统的外交路线和战略旨在识别敌人并与之对抗，现在则必须识别全球的和地区的危险，以便在酿成大祸之前排除之。

当我们离开一个相互敌视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走进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的时候，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很可能并不是强国征服弱国的战争，而是弱国抗议强国的战争。

和青年时代一样，我今天的梦想依旧。我想提及其中两个梦想：犹太民族的未来和中

东地区的未来。

在历史上，犹太教获得的成功要比犹太人取得的成功多得多。犹太民族人数仍然少寡，但耶路撒冷（犹太人生活的都市，一切宗教都尊为神圣并向一切宗教开放的城市）的精神却日益发扬光大。《圣经》已为数以亿计的家庭所拥有。《圣经》的道德威严从不会被历史的沉浮所战胜。

犹太人的历史给人类以启迪和鼓舞。在过去近 4000 年里，这个小小的民族传递着一个伟大的信息。最初，这个民族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后来四处漂泊，流亡他乡。这个小小的民族在逆境中拼搏，无数次遭到迫害、放逐和践踏。这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中，从庞大的帝国至其殖民地和附庸国的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在经历漫长的悲剧和厄运的折磨之后重新站了起来，挣脱身上的枷锁，将流落天涯的人民重新聚集在一起，踏上了吉凶难卜的民族发展之路。他们要战胜内部的怀疑论者和外部的敌人，给土地和语言重新注入新的生命，重振民族特性，不遗余力使该民族达到新的卓越的巅峰。

犹太人给世人的启示是：信仰与道德的理想是能战胜一切逆境的。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出现的冲突，是关于文明内涵的冲突，而不是领土冲突。犹太文化已经有了许多世纪的历史，现在深深地扎根于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之中。在我们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大约 500 万人把希伯来语用作母语。这个数字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小。说它很大，是因为说希伯来语的人从不曾如此众多；说它小，是因为以 500 万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化难以抵御全球电视文化无所不及的侵蚀性影响。

以色列国已存在 50 年，我们在这一段历史中，一直致力于重建领土。以后，我们将努力加强精神建设。犹太文明——或犹太人之精髓——是信仰、历史、土地和语言的融合。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和无处不在的民族。我最大的希望是，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不图一时之荣，不尚虚伪之事，在人类精神的田野上继续历史性的民族性的耕耘；以色列将成为我们精神遗产的中心，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家园；犹太民族将从别的民族中获取灵感，而且同时成为其他民族灵感的源泉。

## 尾 声 任重道远

世界进入了 1995 年，中东和平进程仍在跌跌撞撞中向前发展。9 月 24 日，佩雷斯在埃及塔巴与阿拉法特经过九天的艰苦谈判，草签了“扩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的协议”，一般称为塔巴协议。根据这项厚达 400 多页纸的协议，以色列军队将分阶段撤出杰宁、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卡勒基利耶、拉姆安拉、伯利恒等 6 座城市、450 个村镇和希伯伦市的部分地区，把这些地区交由巴解及不久后选出的一个委员会进行管理。以军将进行“重新部署”，以保卫在希伯伦市和其他地区 148 个定居点内的犹太居民的安全。到 1997 年 7 月以军全部完成“重新部署”后，巴勒斯坦人将能控制西岸 90% 的领土。9 月 28 日，拉宾与阿拉法特再次来到华盛顿白宫的南草坪上，正式签署了塔巴协议。

塔巴协议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一股不小的反对浪潮，2 万多人在议会外示威，抨击拉宾和佩雷斯“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尽管协议在议会以 61 票对 59 票的微弱多数获得批准，但正如新闻评论员所说：“这一比例已到了国内政治所能容忍的极限。”

当然，在以色列，希望实现阿以和平的人占多数。就在右翼势力煽动示威攻击拉宾和佩雷斯的同时，左翼人士也组织了支持和平进程的集会。

1995 年 11 月 4 日晚 8 时，10 万以色列群众聚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拉宾、佩雷斯与内阁其他成员，埃及和约旦驻以色列大使，都出席了集会。

8 点半，拉宾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发表讲话。他说：“我当了 27 年的军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机会——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于广大以色列人来说，佩雷斯是和平的设计师，但却不是和平的决策者。和平的决策者是拉宾——他是领兵冲锋陷阵的统帅，知道什么样的和平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他过去只讲和平的可能性，却从来没讲要主动抓住机会去实现和平，这一点使了解拉宾的人觉得他今天与往日有所不同……

“总会有和平的敌人，”拉宾继续说，“他们正拼命地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中东和平。但是，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和平伙伴，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敌人，现在它已停止恐怖活动。没有和平伙伴就没有和平。为了解决以阿冲突中最复杂、最持久、最敏感的部分——以巴冲突，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巴解也要作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愿意为和平去冒任何危险。”

如果这些话出自佩雷斯之口，人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一个“鸽派人物”。然而，此话出自被称作“鸽派中的鹰”的拉宾之口，人们便多少感到这位演讲者今天好像是换了一个人……

发言到了最后：“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

讲演的话语一落，整个市政广场响起一片掌声。拉宾转过身去，同站在身边的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自从两人踏上以色列的政治舞台，这两位政治上的对手还从来没有拥抱过。掌声夹杂着欢呼声，整个广场一下子沸腾起

来……

当掌声渐落时，拉宾、佩雷斯和全体集会者唱起了过去被斥为失败主义而今天成为和平运动象征的《和平之歌》：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  
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  
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  
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  
无论是胜利的欢乐，  
还是光荣的赞歌，  
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  
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  
引吭高歌和平之歌，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9时30分，按照程序，人们应退场了。佩雷斯先走下主席台，拉宾则与外国使节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一一道别。就这样，佩雷斯先拉宾2至3分钟登车离去。

9时40分左右，拉宾来到了自己的专车旁。正待要打开车门时，突然一个男青年从怀里掏出一支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先向拉宾腹部开了一枪，又在拉宾捂住腹部弯下腰去时两次扣动扳机，其中一枪打到拉宾背上。

行凶的男子是27岁的犹太大学生伊加尔·阿米尔，曾是特工机构的成员，所以能持通行证越过几道警戒线接近拉宾。阿米尔和制造希伯伦惨案的戈尔斯坦一样，都是已故的种族主义犹太教士梅厄·卡亨的信徒，反对以色列同阿拉伯人实现和平。在一伙同类型的极端分子密谋下，阿米尔终于向拉宾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据凶手后来交待，如果当时佩雷斯也在场，同样会遭到罪恶子弹的袭击。

中东历史上充满了阿犹之间的仇杀，但一个犹太人因政见而杀害另一个犹太人的事件真可谓绝无仅有。待到保安人员如梦方醒，冲上前去制伏凶手时，拉宾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拉宾立即被送往伊希洛夫医院。开始抢救时，已量不到他的血压，摸不到他的脉搏，凶手使用的是违禁的、杀伤力极大的达姆弹，一枪击中脾脏，一枪打在脊椎上。11时10分，拉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拉宾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人们在表达他们的悲痛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以色列政局和中东和平进程的担忧：1996年11月以色列又将举行大选，佩雷斯能在“拉宾之后”保持工党的团结吗？拉宾死于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它是否说明以色列将会发生内战？拉宾遇害会否导致“可供选择的方案和重大政治决策出现冻结”，从而使中东和平进程受阻或出现倒退？

拉宾去世的当晚，佩雷斯受命代行总理职务，所有人们对工党、对以色



列、对中东和平进程提出的疑问都摆在了他的面前。一位中东地区的以色列问题专家评论道：“行伍出身的拉宾被认为是一个更值得信赖的和平谈判人，而佩雷斯则不会得到那么多的公众支持……谁也不要期望佩雷斯会带来进展……拉宾都做不到的话，佩雷斯又能怎么样呢？”一句话，有人对佩雷斯稳定内部、推进和平进程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政治上几经沉浮，和平努力方面的多次失败，练就了佩雷斯屡仆屡起的坚韧性格和静观大事、坦然处之的政治家风范，在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请看看他是如何处置的——

为了稳定工党内部——特别是稳定拉宾派的成员，佩雷斯迅速任命被视为“拉宾精神继承人”的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拉克为代理国防部长，随后又在新组建的内阁中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一决定，无疑对保持工党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稳定国内政局，佩雷斯一方面下令严查凶手并缉拿其同谋，取缔宣扬种族主义的极右组织，一方面也与反对派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话，寻求对政府的支持。利库德集团的议员在议会批准新内阁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说明对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面对国际社会的担忧与猜测，佩雷斯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同意和已经承诺过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将不折不扣地执行。”至于1996年大选与推动和平进程的关系，佩雷斯更是坚定地指出：“在我们看来，当务之急是推动和平进程，赢得和平比赢得大选更重要！”

1995年11月6日，在肃穆的拉宾葬礼上，佩雷斯面对死者的家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自己悼辞中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话：“亚卫告诉大家，不要失声地呜咽，不要让泪水遮住视线，所做之工必有回报，未来充满希望。”接着，他面对拉宾的灵柩，沉痛而又坚定地说：“永别了，我亲爱的兄长，和平的英雄。从今天直至将来，我们要像你生前所求索的那样，也像你的离去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样，继续承担起伟大的和平使命。”

